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3
第3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3年9月 第3期(总第99期) 第25卷
Sept.2023 No.3 Sum.99 Vol.25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三年九月第三期(总第九十九期) 第二十五卷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讨会 在昆明召开

6月29日，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举办此次研讨会，旨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对全省统战系统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理解掌握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内涵、推动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同频共振、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并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对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为巩固壮大云南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

更多学理支撑和政策参考。

统一战线作为人民民主的推动力量，既能以各方面成员的政治参与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扩展广度，又能以各方面代表人士的建言献策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拓展深度。要深入领会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意义，把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宝贵历史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不断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会议聚焦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等内容，围绕坚定不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经验、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关系、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优势和作用、多党合作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边疆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据介绍，举办本次会议是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后的首场学术活动，也是落实双方合作协议的一项重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省人大、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省委党校、省社会主义学院、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和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省工商联理论研究室负责人共50余人参会。

(云报客户端记者：沈艳 李辉)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3 年第 3 期(总第 99 期)

本刊顾问

于千千 徐 彬 苏 莉 李玛琳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高 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岳 宁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 波 杨松禄 罗建生 钟瑞华

诸 芳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杨松禄

副 主 任:罗 雷 李亚强

责任编辑:念兴昌 刘林华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尹学朋, 秦晓明 (5)
- 香港青年国家现实教育的现实意义、现状与路径 盛渤乘, 陈卓武 (11)
-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软件和 CSSCI 文献的分析 杨松禄, 张 泽 (18)
-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研究述评: 基于系统化的思路 袁竞闻 (34)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民族互嵌式社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
..... 马国芳, 叶 浩 (45)
- 交往交流交融: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文化动力
——云南鹤庆县新华村银匠个案 谷家荣, 孙雨彤 (55)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 薛 昊 (63)
-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现实困囿与纾解路径
..... 王俊玮, 蒙 莉 (70)

● 历史与文化

- 清朝石屏罗凤彩文学家族考说 陈友康 (75)

[期刊基本参数: 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3*2023-03]

保甲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在民国时期的重建 杨明辉 (87)

● 发展问题研究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困难挑战及其解决场域研究

——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谈起 刘大程 (95)

再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基于“民主”的视角 王付欣, 郭笑笑 (103)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

..... 陈毓铝, 赖昕铖 (1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3, 2023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The Triplet Logic Behind the United Front's Assistance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 Yin Xuepeng, Qin Xiaoming (5)
-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for Hong Kong Youth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ntemporary Condition and Approaches Sheng Bocheng, Chen Zhuowu (10)
- Review on and Prospects of Studies on the United Front sinc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and CSSCI Documentary Data Yang Songlu, Zhang Ze (18)
- Review on Studies of Whole-Process Democracy: Through Systematic Thinking
..... Yuan Jingwen (34)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 Ethnic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A Micro-sociological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Ma Guofang, Ye Hao (45)
- Exchang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Cultural Power for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A Silversmith's Case in Xinhua Village in Heqing County of Yunnan Gu Jiarong, Sun Yutong (55)
- An Important Way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Telling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Intercommunication Xue Hao (63)
- Guangxi Province's Dilemmas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and Relevant Relief Measures Wang Junwei, Meng Li (70)

History and Culture

- A Survey on the History of Luo Fengcai's Family of Literature in Shiping in the Qing Dynasty
..... Chen Youkang (75)
-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Tithing System and Its Re-establish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 Yang Minghui (87)

Issues of Development

- Challenges to Global Advancement of Eco-civilization and Solution Dimensions: Motivated by Japanese Ocean Discharge of Nuclear Wastewater Liu Dacheng (95)
- A New Debate on the Prevailingness of the Shared Community's Values over the West's "Universal Values": A Democracy Perspective Wang Fuxin, Gou Xiaoxiao (103)
- New Fellow Elites' Assistance to Countryside Prosper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s Village Organizations from Inter-embedment Perspective Chen Yülü, Lai Xincheng (112)

统战理论与实践

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尹学朋, 秦晓明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两者相辅相成。厘清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有助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广泛凝聚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智慧和力量。具体而言,从历史逻辑来看,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从理论逻辑来看,统一战线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之道,以马克思统一战线思想为本质内核,科学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其价值追求。从实践逻辑来看,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局势,要从政治引领、民主协商、社会整合、包容和合四方面,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3-0005-06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世界进程,而是由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的现代化变迁”^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心聚力统筹发展,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法宝,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发展也推动着统一战线的时代更新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支撑。从历史、理论、实践的三重逻辑入手,可以更全面和系统地阐明两者之间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探究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统一战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有助于为新时代统一战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全面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战智慧和力量。

一、历史逻辑:统一战线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②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

基金项目:四川省南充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统战理论研究”(NC22TZA01)。

作者简介:尹学朋,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秦晓明,西华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① 任剑涛:《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1—11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1版。

践中发展起来的，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总结。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根本条件

统一战线促成社会力量的整合，这既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源泉，也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①纵观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的农民和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未能积聚力量和以人民为中心，均以失败告终，这就迫切需要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且具有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政党来改变现状，于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其力量比较薄弱，仍处于政党建立的萌芽阶段，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与其他党派和阶级力量合作的重要性。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初步提出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中共三大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形成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后，中国共产党联合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起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亡关头，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在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组织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纵向的组织建设和横向的统一战线，在壮大政党力量的同时，将组织力量扎根到祖国大地、人民需要的地方，凝聚人心，使得全民团结一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

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理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于现代化的推进是必不可少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仍需继续加强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以凝聚人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②我们党运用统一战线进行制度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自此，统一战线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形式，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集中组织各种力量来巩固新生政权。经济上，面对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调动基层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稳定商品贸易，奠定经济基础。政治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和反革命运动，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内部环境。军事外交上，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支持并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中国领土安全。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物质基础

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鉴于统一战线内部及我国阶级状况的变化，统一战线的性质也由“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革命统一战线”改为“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已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联盟”^①。这极大凸显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及其爱国性质。从中共八大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到中共十二大确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入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的经济成分、经营方式、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等日益多元化、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快速发展，国家支持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明确列入新世纪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使其发挥优势并带动所在领域的经济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调动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等爱国同胞，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力量支撑

新时代统一战线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一致性、多样性，广泛凝聚人心，增进共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把统一战线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②总的来说，就是继续完善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③，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力量指引。其一，对于政党关系，发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系统的制度机制，用制度汇聚推动发展的最大合力。其二，对于民族关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其三，对于宗教关系，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努力使宗教教义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其四，对于阶层关系，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其五，对于海内外同胞关系，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点，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精神。通过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二、理论逻辑：统一战线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之道

统一战线理论是在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它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精髓作为本质内核，切实运用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作为其科学遵循和策略支撑，广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滋养作为精神价值追求，极大地丰富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内涵。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5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页。

（一）本质内核：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克思的统战思想与中国的统战实际工作相结合，探索出了符合自己的统战理念，在不断演化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自身解放，首先必须实现自身的团结与统一，同时还要争取和团结最广泛的同盟军。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赢得革命胜利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战略，恩格斯在《唯理论和虔诚主义》中第一次提出并使用“统一战线”概念。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之后的理论和实践斗争中，逐步将统一战线理论深化，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趋于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政党要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①这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纵观中国的社会实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身政党的独立性，善于团结其他政党和社会力量来扩大自身优势，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实现各个时期的阶段性胜利，这正是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精髓，不断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理想。

（二）科学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所谓民主政治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活动的理性认识，其植根于中国国情且具有民主政治的共同价值。统一战线所蕴含协商民主和人民民主理念，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将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统一战线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特色形态和实践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嵌于中国式民主的实践运转中。^②一方面，统一战线强调“大团结大联合”，民主具有团结的功能，而团结具有民主的效能，这是统一战线成为法宝的重要作用机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强大的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加强沟通协商与团结。人民政协已成为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指挥的“重要阵地”，在共同的思想政治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内含团结民主的因素，同时，它也在遵循着民主理论的指导，寻求新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导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天然的人民民主基因。统一战线是由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成员所构成的，充分体现了“人民统治”的根本性质，实现了人民为主体的根本要求，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策略支撑：国家治理理论

统一战线处于国家上层建筑中，是国家治理的内在构成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服务于国家建设又服务于国家奋斗目标，而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统一战线服务国家建设必定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国家治理规律，回答了夺取国家政权、改造国家性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追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统一战线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构成优势，促成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发挥自治与共治功能，既扩大了民主的广度，也保证了公民平等参与的权利。统一战线通过团结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代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稳定和谐。统一战线具备的协商功能，在政策层面表现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协商沟通使政策制定过程更加高效、政策实施更具可操作性，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科学性。由此可见，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其本身就蕴含着国家治理理论，从而架构起统一战线的理念与方式的系统体系。

（四）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统一战线的思想内涵，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这与中国式现代化内部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不谋而合。这种同根同源的文化遗产，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62页。

② 宋雄伟：《统一战线中蕴含的民主功能》，《学习时报》2022年7月27日，第3版。

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统一战线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精髓。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要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不宜丢掉原则而苟同对方。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本质上与“和而不同”是相通的。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统一战线作为不同阶级阶层的联盟，旨在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本身就内含着和谐、合作、融合、联合的实践途径与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和创造性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统一战线的根基和渊源。

三、实践逻辑：统一战线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法宝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得统一战线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难题，如何正确调动和发挥统一战线的潜在优势，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当务之急。统一战线要始终围绕人心和力量，从政治引领、民主协商、社会整合、包容和合等方面聚集起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参与和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中，形成同频共振的不竭动力，持续推动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政治引领：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是统一战线必须遵循的首要政治原则，通过党的正确领导，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有效汇聚起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力量，形成真正的、广泛的、紧密的大团结。^②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一方面，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推进，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挑战，统一战线关系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港澳台侨等敏感领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端口，保持这些关系的稳定运行关系到中国人民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集团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全方位打压，对涉及新疆、西藏、港台、南海及宗教领域的问题进行干预和操弄，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波波反华浪潮。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霸权主义抬头，为中国贴上负标签，挑起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造成国际公众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为此，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和拓展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深化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对内汇聚起大团结大联合的力量，对外弘扬中华民族的和平理念，创造和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抵御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使我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二）民主协商：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强调人在其中的主体作用，摆脱了西方以资本为主体，人是附属物的非人逻辑。统一战线是党的一项特殊政治工作与群众工作，有着极好的群众基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动力。总的来说，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使得民主协商不得不进一步优化升级，以应对新时代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范围群体不断扩展，构成更加复杂，这就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要求，以不断满足和适应新变化。人民政协中不同阶层的代表人士，代表着不同的集团或个人的利益，虽然基于共同利益而维系在一起，但在具体利益上仍存在价值上的分歧。为此，通过民主协商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广聚共识，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更加普遍地认同党的主张，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9页。

^② 孙信、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思想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62—74页。

系群众制度,充分保障公民建言献策、依法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有效化解社会风险与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统一战线蕴含着民主动员、民主表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民主功能,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 社会整合: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各个方面有其自身的张力,需要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实现整合。统一战线资源丰富、联系广泛,广大统战成员分布在不同社会阶层,在调动基层力量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与思想团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为巩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就目前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战文化在不同领域的价值观和引领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形成普遍遵守的准则,部分统战成员存在“上层论”“务虚论”等错误认识,映射到社会层面,使得大部分人对统战缺乏了解,甚至产生误解,因此统战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认可度还处于低水平状态。在经济发展领域,区域间发展的差距仍存在,解决贫富差距和促进乡村振兴仍是经济领域发展的重中之重,获取利益信息的渠道的局限以及基层能力的弱化,阻碍着社会资源的整合,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为此,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整合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经济发展上,充分发挥人才的力量和智慧,将其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积极引导和支持新的社会阶层这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有生力量,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文化上,发挥统一战线成员在文化交流中的优势,加强思想政治上的指导、强化政治认同等,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整合各类资源,奠定稳定牢固的社会基础。

(四) 包容和合: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同心圆半径

统一战线以“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孕育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力量的强大理念,实现国家政治生态的和谐发展。一个国家政治的有序运作与和谐稳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①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构建新时代统一战线联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谐并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同心圆半径。随着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在凝聚国内人心的基础上也更加关注“世界视角”,双轨并行不断扩展统一战线的同心圆半径。宗教、民族、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领域的统一战线相关领域已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进行干扰破坏的重点和焦点,统战工作越来越成为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②此外,还有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破坏、网络和生物安全、公共卫生等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难题。为此,要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二重同心圆,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共进。^③一是要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坚守“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特别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加强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和改进侨务工作,把更多统战成员团结在党的周围,对于敌视、污名、破坏中国统一战线和现代化建设的力量予以反击。二是要拓宽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覆盖面,延伸涵盖范围,把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到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对话与协调,增加彼此共性,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伙伴关系,深化统一战线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想目标。

总之,统一战线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的逻辑关联,造就了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辅相成,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大势所趋,二者的有机统一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必定会迎来新的突破。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李俊:《统一战线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及其优势》,《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8—124页。

^②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奋力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中国新闻》2021年1月18日,第A02版。

^③ 曾向红、田嘉乐:《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9—137页。

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现实意义、现状与路径

盛渤乘, 陈卓武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 香港青年的国家安全教育被纳入特区政府的宪制性责任, 成为香港国家安全执行机制的重要一环。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彰显于总体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香港“由治及兴”之刚性保障与香港青年群体内在诉求的辩证统一中。然而, 目前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的施教环境、课程载体与受教客体尚未呈现三位一体宜教学、可实操、易接受的良性生态。基于此, 应从全面植根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中央治港新方略、协同整合教育资源、激活社会力量、切实解决青年生活困境等方面, 实现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的全过程、全方位优化。

关键词: 香港青年;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教育; 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3-0011-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①香港在我国国家安全中具有特殊性与重要性。2020年6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及时生效, 填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长期的“立法真空”, 为香港“由乱到治”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法治保障。其中, 《香港国安法》明确了特区政府应加强“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宪制责任, 预示着香港国民教育政策与执行力度的重大调整转向, 为筑牢香港全社会的国家安全意识, 乃至构建香港青年健康成长成才的环境提供了明晰指向。可以说, 中央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落实新选制等一系列动向, 使“爱国者治港”掷地有声, 使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成为中央意志传达香港青年领域的重要接洽。

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现有研究可以《香港国安法》颁布前后为界线划分。《香港国安法》颁布前的研究多以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为主题进行学理探讨, 较为系统地界定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香港国安法》颁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的路径研究”(21YJA880006); 广东工业大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文化共同体视域下大湾区港澳青年文化认同建构路径研究”(2022ZXYB10)。

作者简介: 盛渤乘,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香港青年国民教育; 陈卓武, 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高校治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第1版。

布后,相关研究则集中于对《香港国安法》的合理性论证,聚焦国家安全教育提出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形塑的学术展望。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三周年之际,有必要对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进行符合中央要求、香港实际和青年需求的价值解析、现状研讨,以利作出优化调整,并充盈有关新时代下“一国两制”香港治理问题的研究范畴。

一、香港青年国家安全的现实意义

(一) 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指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①其中,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与原生要素,^②在整体国家安全中具有极端重要性。香港作为中西经济沟通的前沿与意识形态碰撞的前线,其政治安全是关涉我国“一国两制”基本国策行稳致远的重大问题。同时,青年作为最活跃的社会有生力量,是稳固国家安全、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变量。进言之,国家安全教育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固本之策和长久之计,^③应是植根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意识,改善国家认同现状的重要寄托。

10年来,香港社会经历了多次社运风波,激进青年对西式民主的极端理解与盲目追随衍生了公共安全危机,冲击了“一国两制”下的法治秩序。这也暴露了香港存在危及国家整体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的巨大隐患。不言而喻,香港青年的国家安全意识存在缺位,这是影响总体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与实施表明,要坚定推行以人民至上为理念,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教育,达到培育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意识、养成防范重大安全危机能力素养之目的。

(二) 实现香港长治久安的必要举措

香港回归25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治理港澳的根本遵循,更是香港稳定与发展的根基所在。为保障“一国两制”事业在香港的行稳致远,硬件上,新选举制度与《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及其执行机制成了中央治港策略的最新抓手;软件上则是推行国家安全教育,将国家安全教育作为新时代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实现青年“人心回归”的重要实践。因此,加强国家安全教育不仅是维护“一国两制”宪制共识的实践方案,更是匡正青年群体价值观,赓续香港稳定繁荣的重要动能。

国家安全教育可以赋能社会安全氛围,为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奠定基础。^④尽管香港已经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但扰乱人心、阻挠发展、危及整体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在转折期中仍然存在。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曾在公开场合提道:香港的根本问题,集中表现于反对势力与中央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上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这已经成为影响“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与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主要障碍,且激化了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⑤目前,香港的“青年问题不只是‘青年问题’”已经成为学界共识,^⑥青年就业入学难、上升途径断裂等多方面问题都是香港社会矛盾的激化在青年领域的显著表征。防止青年领域的矛盾激化需要“疏”“堵”结合,国家安全教育推广与实施理应发挥“润物细无声”的疏通作用。

①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6年4月16日,第1版。

② 刘跃进:《政治安全的内容及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第3—21页。

③ 董新良、李丹妮、刘宇:《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基本遵循与实现路径》,《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3期,第1—5页。

④ 张建:《香港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成效与政策思考》,《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44—52页。

⑤ 人民网:《张晓明:国家安全底线愈牢固“一国两制”空间愈大》,2020年6月8日, <http://hm.people.com.cn/n1/2020/0609/c42272-31740311.html>, 2023年5月9日。

⑥ 陈晓锋:《香港本土派青年运动的观察、实践以及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5期,第19—24页。

（三）厚植香港青年国家情怀的内在诉求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更是青年群体参与社会、践行法治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异状导致以“国家本位”为出发点的教育难以落到实处。甚至，巨大的经济压力、互联网时代“本土意识”的极速蔓延也促使部分青年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变量。

如此一来，系统的、长期的国家安全教育成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破局之处。以维护个体安全为出发点的国家安全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触碰青年群体“政治灌输”的敏感神经，有利于渐进式养成青年个体对国家的正面情感。另言之，培养国家安全意识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目标导向。国家安全意识是涵盖行为个体对国家安全的认知、情感与态度的集成概念。^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教育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和家国情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齐抓共管，倡导家、校、社会多体联动，^②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实践与体验单元，更应是提升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培育香港青年爱国情怀的有力抓手。

二、香港青年国家安全的现状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机遇。2021年7月香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解散，标志着殖民主义与本土主义负面因素在教育界的消退，为《香港国安法》在教育界的实施奠定了现实基础。^③尽管如此，从教育环境、施教载体、受教客体的整体现状来看，香港青年国家安全的现状仍待改善。

（一）教育环境：香港社会整体国家安全意识有待提高

香港社会存在长期的国家安全认知赤字已是学界共识。^④深入剖析来看，香港社会国家安全意识空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对于“国家安全”概念普遍陌生。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上决定了其社会意识与内地的差异化，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千丝万缕，加之自由港的开放传统，使得香港社会成员更趋向于个体本位叙事。对于天然带有“国家本位”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不加强引导，将难以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从2013年的反国民教育事件到2014年的“非法占中”，再到2019年的“修例风波”，无一不显现出香港社会对于国家本位叙事的抗拒与非议。从现状来看，香港社会对于国家安全意识大都停留于政府保障下片面的国防安全，对于有关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拓展领域则更为陌生。

二是国家安全意识未能有效与法治精神结合，这是长期国家安全立法空缺的惯性使然。法治精神也是香港公民所共同维护的核心价值，更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市民与政府均需守法”“任何人除非有法律根据，否则不可以作出构成法律过失或影响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⑤等概念，被长期纳入到香港的普法教育章程之中，成为香港公民恪守的文明信条。然而，在2020年6月前，香港还是世界上鲜有的无国家安全相关立法的地区之一。法律的空缺，导致了香港国家安全意识的先天不足，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安全意识的社会面空白。尽管特

① 卢红、赵越：《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演进、特征与展望》，《教育科学》2022年第5期，第16—22页。

② 董新良、李丹妮、刘宇：《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基本遵循与实现路径》，《中国教育学报》2023年第3期，第1—5页。

③ 田飞龙：《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青年探索》2022年第4期，第101—112页。

④ 张建：《香港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成效与政策思考》，《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44—52页。

⑤ 香港教育局：《人权与法治》，2021年2月5日，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cble_wallcharts/wallchart2.pdf，2023年5月9日。

区政府近年来已经用策展、比赛和有奖问答等方式尝试强化国家安全的公众认知，但是公众的参与度、积极性都有待进一步引导和提升。相形之下，澳门特区2009年完成国家安全立法，在2018年已经在拥护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维护机制，社会公众支持、拥戴国安法已蔚然成风。

综上所述，在《香港国家安全法》颁布三年之际，香港社会还未能完成从“守法”到“护法”的自发性转变。因此，唯有将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置于法律制度的硬性保障下，才能有效改善香港社会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这也提醒我们，国家安全教育肩负国家安全意识嵌入香港法治精神的重要面向，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根本准则，将全面的总体安全观念根植于香港社会，才能实现对香港社会重大安全风险的精准防范。

（二）课程载体：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操性待加强

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起步较晚，仅作为一个模糊概念长期置于培养国家认同的国民教育中，并伴随着其课程载体“公民教育科”（现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改革与社运浪潮几经波折。目前来看，《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的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摒弃了以往弱化监管、流于形式的“概念化”教育，形成了“法律定基调，政府来牵头，课堂为主场，社会多方共同参与，国家认同为导向”的模式化流程，增强了可控性。然而，从目前的考评体系与施教概念来看，香港地区安全教育的实操性尚待加强。

其一，考评体系有待科学化。总体来说，作为承接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载体，“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被纳入中学文凭考试的核心科目已经使香港国民教育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对于该课程的评核目标来看，并无细化、可执行的“国家安全”相关评核体系，仅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香港国安法》与促进香港长远发展，以及与平衡法治和人权的关系”纳入“‘一国两制’的内涵和实践”课题中；从网站给出的2024年样卷来看，学生只需摘录资料中关于《香港国安法》的正向论述即能得分。^①在个人考核方面，为了达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目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只设置“达标”与“不达标”两种结果。如此一来，在缺乏应试难度与考评严谨性的情况下，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的施教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其二，施教理念偏理想化。现阶段，香港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遵循2021年5月发布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其课程体系设定贯穿于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在该份指引性文件中，教育局对每一门学科提出了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重点与引导方向，且几乎涵盖了“小一至中六”学段的大部分课程，乃至针对高学段“中四至中六”的专门选修课程（咨询及通信科技科和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科等）均提出植入国家安全教育理念的指引。例如，对化学学科提出“通过学习‘金属’‘化石燃料’‘工业化学’和‘绿色化学’相关课题，增强学生对善用资源及环境保护的关注及意识，让他们明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认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必要性”。诚然，诸如化学、物理等知识是组成国家安全素养的重要来源，但在高度竞争的应试环境中，学生难以将所学基础知识转化的“国家安全素养”。同时，在强调博雅教育，以应试、核评为导向的香港中小学课堂中，施教者是否符合时宜、根据所教科目传授国家安全知识的过程、效果与经验等一系列问题也无法测算与跟踪。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板块，可实操化与普遍适应性是检测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尺度。就目前来说，单一提高应试难度、复杂化考评体系的方式并不可取，唯有打破以学校为核心的单一维度教学方式，倡导多场域、多频次的体验式教学，国家安全教育才能切实行至青年身边。

^①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公民与社会发展（样本试卷）评卷参考》，2021年7月23日，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cs/CS-MG2021-C.pdf，2023年5月9日。

（三）受教客体：香港青年群体国家认同异状

毋须讳言，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状况低下，这是影响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大障碍。国家认同作为一种个体行为的意义来源，特别指对特定形式的政府、政体或政治组织起来的社会模式的认可，业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教育受用性的重要指标。香港民意调查网站2022年12月的调查数据显示，18—29岁青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占比仅为4.7%，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占比为57.2%，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的占比为8.2%，认为自己是“香港的中国人”的占比为3.5%，认为自己是“中国的香港人”的占比34.7%。^①香港青年对于个人身份认同显现出复杂趋势，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堪忧，身份认同多重化的趋势也愈发明显。

究其原因，本时代的香港青年群体（15—35岁）相比其长辈已经出现价值观念的“断代”，这一群体普遍经历、见证了互联网革命与就业压力日益见增的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质疑权威、去中心化的表达方式成了这一青年群体中显著的认同表征。“社会情绪”指的是个体生活情绪的综合反映，是目前香港青年认同研究的新增长点。社会情绪论认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受“社会情绪”的影响显著：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情绪获得感越强，其认同属性延伸至更广泛群体层面的可能性就越大。^②进一步说，引导青年“社会情绪”也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作用。有实证研究表明，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大量的虚假网络信息起到了巨大的情感动员作用。“香港警察”“中央政府”被众多虚假信息源塑造成负面情绪的集中攻击点，导致了多次公共安全危机的激化。^③

《香港国安法》颁布与国家安全教育实施至今，其对于国家认同的积极效用尚处于磨合期，直接的表现是不同年龄段、不同阶级的香港青年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大致显现出接纳、沉默和逃避（移民）等情感反应。对于学龄段的香港青少年而言，接受国家安全教育仅是学业刚需中的一环，其主动性、参与性仍有待考察。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如何才能肩负引导正面的“社会情绪”并培养“国家归属感”的双重使命，这固然是新时代下治港工作的现实问题。

三、香港青年国家现实教育的优化途径

基于上述对香港青年国家现实教育的分析与研判，香港青年国家现实教育实际作为香港国家安全执行机制在青年领域的衍生，在施教环境、课程载体与受教客体考验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之下仍然备受挑战。新时代，香港青年国家现实教育要以新思维、新方式巩固现今香港国家安全态势，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良性的环境构建、精准化资源投放、有效的体系建构与“情”“理”共济的实际作为等方面的合力，才能实现香港青年国家现实教育破局开篇的新景象。

（一）科学的理论指导：坚定不移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指导方针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是解决香港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更是实行香港青年国家现实教育的根本指向。特区政府作为维护香港国家安全与推行青年国家现实教育的责任主体，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基准，担负起香港国家安全意识的引领作用。引领国家安全意识，最重要的是全面引导普及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的正确认识。

首先，在中央治港政策新调校背景下，对公众重申对“一国两制”的正确认识应作为香港国家安全工作的前提，特别要加大“爱国者治港”与“中央全面管治权”等治港原则的普及力度。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根基，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故提升香港公民对于“国家安全”的整体认识水平，应强调人民在国家安

^① 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研发放市民身份认同感最新成果》，2023年1月10日，<https://www.pori.hk/press-release/2023-01-10-pm.html>，2023年5月9日。

^② 郑婉卿：《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身份认同》，《青年探索》2019年第1期，第15—32页。

^③ 汤景泰、陈秋怡、徐铭亮：《情感共同体与协同行动：香港“修例风波”中虚假信息的动员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8期，第58—76页。

全中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以此鼓励并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学习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营造维护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最后,特区政府应全力扩充大众对国家安全的认知渠道,让公众意识到当代国家安全的丰富性。全面提升香港社会的国家安全认知素养,将其作为社会认知的有效补充。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政治、国土、军事方面的传统安全,也重视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唯有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香港大众,才能有效规避香港作为中西荟萃、金融都市与贸易自由港等多重地位纷繁交叉所衍生出的国家安全风险。

(二) 良性的环境构建:用好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平台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无论是“人文湾区”“休闲湾区”这一类软性环境的营造,还是“粤港澳高校联盟”等一类与青年群体高度相关的官方平台的组建,以文教融合为趋势的粤港澳青年融合为香港青年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带来了破局的新思维与新方向。由此来说,应当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场域,挖掘、利用好其中蕴藏的文教资源,搭建高质量平台促进青年融合交流,同时彰显其教育价值与聚合作用。

一是要挖掘、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资源。优质的文化作品不仅是唤醒粤港澳青年文化记忆的介质,更是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教化演绎方式,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作用。以2012年上映的香港电影《寒战》为例,该片讲述了香港警队高层与港英遗留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凭借高度的时代背景还原与细腻严谨的谍战悬疑剧情一举拿下2013年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其续集亦受到观众的追捧与喜爱。《寒战》系列电影带来了诸多良好的社会效应,如还原了港英遗留势力老谋深算、心怀鬼胎的真实样貌;用视听艺术展现了政治危机、信息危机以及恐怖主义对于香港社会的严重危害;普及、宣传了香港保安局以及香港警队的职能架构。以此举一反三来论,大湾区文化创作应当加强国家与本土的叙事并置,以良好的社会效应作为创作的驱动力。此外,用好、用活诸如“东江纵队港九分队”等历史素材,向青少年受众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

二是要重视高质量平台促进青年交流融合的作用。香港青年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本质上关涉“国家认同”,多方位、高聚集度的青年交流融合既是促进青年向心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心手相连的重要渠道。基于此,以政府资源支撑的“粤港澳高教共同体”“粤港澳青年联盟”等跨境平台应发挥引领作用,为青年大众提供知识与咨询交流、创业创新辅导、粤港澳实地考察等受教育与分享学习的机会。同时,要积极鼓励、引导大湾区多种形态的非官方青年组织(包括虚拟网络社群)健康发展,改善这一类组织发展不充分、聚合性不强的现状,为跨境青年流动提供更多可能性。

(三) 优化资源投放:细化课程改革,精准化教学资源分配

精准化教学资源分配,首先应当在保证特区政府主导权的前提下,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节《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中的“国家安全”相关内容植入的具体细则,改变国家安全教育实操性较低的现状。

第一,可以通过对相关的科目设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门课时,精准化课堂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地理科目为例,每学期设立2至3课时对涉及国家安全知识的部分进行单独教学,如在学习中国地理后,利用专门课时来组织学生讨论我国地缘政治安全相关问题。对于化学、物理等理科科目则可以适当减少课时,甚至保持原有的以“引导为主”。

第二,投放更多资源,鼓励跨境校际间的主题交流,作为“内地考察环节”的有效补充。例如,可以在4月15日国家安全教育日,在广州、深圳等内地城市组织展览、交流会等跨境交流活动,同时建立线上互动平台,更大规模地实现香港与内地学校的国家安全教育参与。

第三,教师的国情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培训与考核应做到常态化。定时组织针对教师群体的国家安全学习讲座,帮助教师群体熟悉国家安全方面的最新动向,使其在进行相关教学时可以

“言之有物，言之有趣”。

第四，以学校为单位，建立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制度。特区政府应出台相应指引，规范化中小学在4月15日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流程，例如举行升国旗等仪式，开展国家安全主题演讲、观看国家安全相关教育影片等，以此保障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正式性与丰富性。

（四）调动社会广泛参与：倡导联动共教

青年国家安全教育不应该单一寄托于学校教育这一场所，要保证青年国家安全教育日常化与常态化，需要更广泛的主体参与。其中，家庭、媒体、青年社会团体与青年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应发挥各自的特点与优势，实现涵盖家庭、学校与社会的联动化教育。

首先，家庭应参与到国家安全教育氛围建构中去，与学校教育进行联动。各个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应当主动担负起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中间责任主体，以学校开放日、家校沟通日、国民教育日等时机为切入点，通过组织亲子互动、国民教育课体验等形式，让学生和家长尽可能了解到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次，应在根除本土媒体毒瘤的基础上，运用市场化机制争取网络社交媒体这一传播阵地。如今无孔不入的网络社交媒体打破了青年获取信息的时空限制，甚至催生了一批以网络社交媒体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网络原住民”。故应以全媒体、融媒体思维，鼓励短视频、Plog等流行创作形式，适时发挥社交名人（Influencer）、KOL和明星的流量效应，填充话语简洁、值得玩味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迎合流媒体时代下青年人短、频、快的信息获取偏好。最后，要整合利用好香港社会团体这一重要资源。香港的社会团体数量多、规模大，是众多青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形式。在号召现有社团担负起社区安全教育宣传社会责任的同时，要资助、催化一批国家安全教育专门社会团体，通过义工、义教、普法等专门形式来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以填补微观领域的国家安全宣传空白。

（五）“理”“情”并施的实际作为：聚焦青年领域，解决青年生活实际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归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指出：“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①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涉及青年民生，探求香港青年个体与国家集体“最大公约数”的社会性系统工程，在晓之以“理”的同时更应用实际的“真情”来帮助青年解决实际问题。

一方面，应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最大化香港青年的上升渠道，切实增加青年的获得感。“社会情绪论”认为，生活满意度是青年社会情绪的建构性元素，是个体安全感知的客观反映。^②因此，要在最大程度上打破行政等方面的制度藩篱，推行惠及香港青年的照顾政策，以最大诚意鼓励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创业、就学。只要是愿意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香港青年人，都应得到实惠与便利。要优先照顾在大湾区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香港青年人，激发高精尖技术青年的创新潜能，以人才效应为香港经济提供新增长点，助推人才赋能香港的产业健康化。另一方面，要建立青年心理关心机制，回应香港青年的情绪诉求。香港青年面临的实际问题错综复杂，无论是中央、特区政府、学校都无法面面俱到，因此需建立涵盖社区、学校的心理与情绪引导机构，缓解高压力、快节奏的学习工作生活对青年“社会情绪”的负面效应，引导青年正向的心理感知。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7月2日，第2版。

^② 郑婉卿：《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身份认同》，《青年探索》2019年第1期，第15—32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软件和 CSSCI 文献的分析

杨松禄¹，张 泽²

(1.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2.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主题的 CSSCI 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计量分析，梳理新时代统一战线研究的脉络、讨论的核心议题，把握研究的趋势、不足和前瞻。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统一战线研究主要聚焦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统战思想、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国际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各领域热点问题等议题，虽然成果丰硕，但仍然存在研究的系统性不强、研究队伍建设不足、研究方法创新不够、回应现实需求不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构建统一战线研究体系、聚焦统一战线研究主题、创新统一战线研究方法，推动构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体系。

关键词：统一战线；CiteSpace；CSSCI 文献；新时代；学术史梳理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3)03-0018-16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法宝作用，现在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统一战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实践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优势。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这样的变化迫切需要理论界进行理论回应，以适应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回顾，全面分析统一战线研究的发展脉络、核心议题与研究前瞻，并从统一战线学科构建和实践发展诉求反思统战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基于这样的目的，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发表的 CSSCI 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求全面掌握当前统一战线研究的发展脉络、理论热点，揭示研究演进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把握研究前瞻。

一、文献来源与数据分析方法

CiteSpace（引文空间）是一款着眼于分析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的软件。本文通过可视化的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研究”（YB202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松禄，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副教授，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制度、边疆治理等；张泽，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与国际传播。

手段，呈现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分析主要作者和机构等，同时帮助预测某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走向。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用 CiteSpace 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生成相关图谱，显示统一战线研究这一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

（一）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CNKI）是国内公认的学术资源平台，而 CSSCI 是国内公认的权威文献数据库。利用 CNKI 平台进行检索，对检索到的 CSSCI 文献进行分析，可以更可靠地掌握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因此，本文选择 CNKI 平台作为文献数据来源，以高级检索的方式，将检索主题词设置为“统一战线”，将检索时间跨度设置为 2013 年 1 月至 2023 年 7 月，将期刊来源类别设置为 CSSCI，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31 日，经筛选最终获得 1615 篇文献作为本文所呈现可视化图谱的分析样本。需要说明的是，在阐述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核心理论时，因为部分重要议题呈现的 CSSCI 文献较少，本文还查阅了部分 CSSCI 之外的相关文章。

（二）文献分析方法

将 1615 篇文献以“Refworks”格式从数据库中导入到 CiteSpace5.7.R5 中，与“data”和“project”数据文件夹建立连接，以便后续数据的分析和保存。CiteSpace 软件可对文献中的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数据来源等作出共现网络分析，建立分析数据库，通过分析制作出我国“统一战线”研究的研究者关系图、研究机构关系图、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聚类图、时间线图、时区图和突变图。这些简明的数据图谱，能够帮助我们清晰把握我国“统一战线”研究的动态。图 1 直观地反映出各时间段内的发文数量。



图 1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研究 CSSCI 文献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二、统一战线研究核心作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统一战线研究中的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统一战线研究中贡献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和机构名称。另外，分析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能够进一步了解我国统一战线研究中目前形成的合作研究网络和研究团队。在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分析图谱中，节点（标签）的大小代表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的多少，各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研究者与研究者或机构与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的宽度代表合作的强度。

（一）核心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对我国统一战线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者及其合作关系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及进程。由 CiteSpace 中的研究者图谱分析方法可知，当研究者的发文数量越多，其在分析图谱上所显示的节点就越大。简单来说，就是发文数量越多的研究者将更加清晰地呈现在研究者分析图谱上。在某一研究领域内发文超过一定数量的作者称之为这一领域的核心作者，其计算公式为

$N_{min} = 0.749 (N_{max})^{1/2}$ ，其中 N_{min} 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 N_{max} 为作者群体中最高发文量。^① 根据数据统计，在我国统一战线研究领域，何虎生（11篇）为领域内发文量最高作者，故 $N_{min} \approx 2.484$ ，即发文量3篇及以上作者为核心作者。依据公式计算结果，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核心作者共28人（见表1）。在我国统一战线研究的领域，何虎生、董树彬、丁俊萍、刘世华、双传学、夏清、桑兵等是发文数量比较多的研究者，他们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为统一战线研究作出了贡献。

表1 核心作者发文情况表

| 序号 | 研究者 | 发文数量/篇 | 文献首发年份 | 序号 | 研究者 | 发文数量/篇 | 文献首发年份 |
|----|-----|--------|--------|----|-----|--------|--------|
| 1 | 何虎生 | 11 | 2013 | 15 | 蒋锐 | 4 | 2016 |
| 2 | 董树彬 | 6 | 2014 | 16 | 陈建樾 | 4 | 2019 |
| 3 | 丁俊萍 | 5 | 2017 | 17 | 乔国存 | 3 | 2020 |
| 4 | 刘世华 | 5 | 2013 | 18 | 何建娥 | 3 | 2017 |
| 5 | 双传学 | 5 | 2019 | 19 | 刘新庚 | 3 | 2013 |
| 6 | 夏清 | 5 | 2017 | 20 | 刘本森 | 3 | 2019 |
| 7 | 桑兵 | 5 | 2021 | 21 | 周勇 | 3 | 2015 |
| 8 | 于化民 | 4 | 2013 | 22 | 夏燕月 | 3 | 2013 |
| 9 | 刘会军 | 4 | 2017 | 23 | 梁柱 | 3 | 2015 |
| 10 | 刘信君 | 4 | 2014 | 24 | 胡为雄 | 3 | 2013 |
| 11 | 曹天禄 | 4 | 2017 | 25 | 蔡宇宏 | 3 | 2013 |
| 12 | 李景治 | 4 | 2014 | 26 | 郝铁川 | 3 | 2022 |
| 13 | 石仲泉 | 4 | 2015 | 27 | 金冲及 | 3 | 2015 |
| 14 | 罗平汉 | 4 | 2021 | 28 | 齐卫平 | 3 | 20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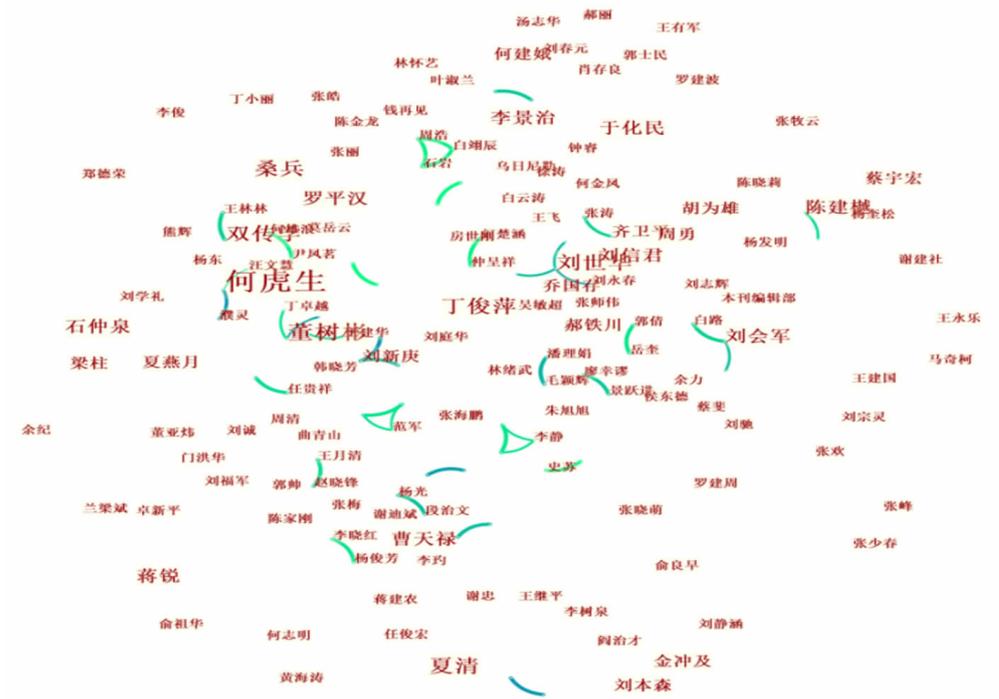


图2 统一战线研究者关系图谱

① 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209页。

统一战线研究中受关注较多。为进一步了解我国统一战线研究中各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及其中心性，将 CiteSpace 软件中的数据经过表格化处理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各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的中心性及出现频次（见表2）。由主要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性表可知，2013年至2023年我国统一战线研究领域的热点关键词出现的年份分布以及这一关键词的重要性。

通过表2可见，我国统一战线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按照其出现频次由高到低排序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毛泽东、抗日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协商民主、人民政协、国民党、统战工作、延安时期，这12个关键词代表着统一战线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了统一战线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和内容，构建了统一战线研究的基本架构与知识网络。

表2 主要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性表（节选）

| 关键词 | 频次 | 中心性 | 首次出现年份 | 关键词 | 频次 | 中心性 | 首次出现年份 |
|----------|-----|------|--------|----------|----|------|--------|
| 中国共产党 | 338 | 0.52 | 2013 | 延安时期 | 30 | 0.02 | 2013 |
| 统一战线 | 212 | 0.42 | 2013 | 周恩来 | 29 | 0.06 | 2013 |
| 毛泽东 | 142 | 0.22 | 2013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29 | 0.02 | 2014 |
| 抗日战争 | 131 | 0.08 | 2013 | 新时代 | 27 | 0.01 | 2018 |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81 | 0.13 | 2013 | 马克思主义 | 26 | 0.04 | 2013 |
| 抗战时期 | 56 | 0.08 | 2013 | 中华民族 | 25 | 0.04 | 2015 |
| 共产国际 | 43 | 0.05 | 2013 | 习近平 | 23 | 0.03 | 2014 |
| 协商民主 | 42 | 0.02 | 2013 | 国共合作 | 21 | 0.02 | 2013 |
| 人民政协 | 41 | 0.02 | 2014 | 共产党 | 20 | 0.04 | 2014 |
| 国民党 | 33 | 0.03 | 2013 | 政治协商 | 18 | 0.01 | 2013 |
| 统战工作 | 32 | 0.09 | 2013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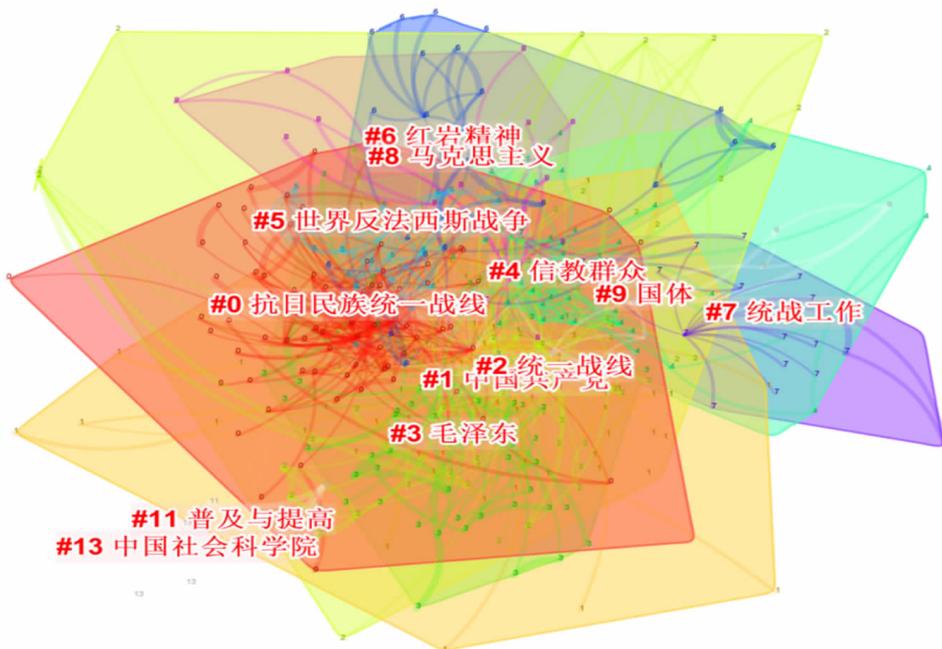


图4 关键词聚类图谱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由 CiteSpace 数据分析可知，在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图 4）中，Modularity Q 的值为 0.5099，大于临界值 0.3，说明本组数据分析所得的关键词聚类结构显著，因此得到的聚类效果较好；图谱中 Mean Silhouette 值为 0.7855，大于临界值 0.5，表明聚类结果是合理的。通过对我国统一战线研究中的关键词聚类进行分析，得到 10 组聚类标签，分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毛泽东”“信教群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红岩精神”“统战工作”“马克思主义”“国体”。大致可以将 10 个模块分为三类。一是统一战线历史研究，#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 红岩精神，集中于研究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的统战工作等；二是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1 中国共产党、#3 毛泽东、#2 统一战线、#8 马克思主义、#9 国体，集中于研究统一战线思想、性质、功能、规律等；三是统一战线领域具体工作的研究，#4 信教群众、#7 统战工作，集中于对统一战线特定工作对象的研究。

四、统一战线研究的脉络

由 CiteSpace 分析得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研究形成的聚类群，这些聚类群包含了统一战线研究中的各个主题；为明晰我国统一战线研究中各个主题的出现时间，制作了研究主题的时间线图谱。从研究主题时间线图谱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统一战线研究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教群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体、#红岩精神这 10 个聚类群一直是热点研究领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毛泽东、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主题词一直是统一战线研究中的热点主题。但在 2016—2019 年出现转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信教群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 6 个聚类群的研究热度逐渐降低，其他 4 个聚类群的研究热度则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其中，以新时代、民族复兴、民族团结、百年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为代表的主题词是目前最新热点研究主题，处于统一战线研究的前沿议题。

为从不同角度观察统一战线研究的脉络，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制作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谱，了解我国统一战线研究的纵向变化。CiteSpace 软件的时区图谱功能是通过图表形式展现收录数据的时间段内关键词的演变，通过关键词落点确定其所属时间段。时区图谱可帮助研究者进一步厘清统一战线研究的发展脉络。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谱中节点的时间跨度与密集程度全方位地呈现了统一战线研究的发展方向与议题变迁。结合统一战线研究的发文数量年度统计和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等节点相对较大，说明研究者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统战思想、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研究、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国际统一战线等多方面对统一战线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

关键词突变图（图 5）呈现出 2013—2023 年相关研究的重点关键词以及突发性强度较高的时间段，可以深化对于统一战线各个理论层面的理解，并且直观展现学界研究侧重点。因此，制作了相应的研究关键词突发性图谱。整体来看，关键词突发性强度明显较高的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53）、统一战线（3.67）、新民主主义革命（3.49）、百年历程（3.49）等。从突现时间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主题词是些近年来的热点突发词，持续时间不断增强，这说明我国统一战线研究领域的聚焦研究越来越时代化，不断与时俱进。

基于我国统一战线研究的发文数量分布趋势（见图 1），并结合我国统一战线研究主题的产生与分布趋势以及我国统一战线研究关键词时区分布趋势和突变趋势（见图 5），可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研究的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3—2014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到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前。这一阶段，统

Top 22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

| Keywords | Year | Strength | Begin | End | 2013 - 2023 |
|-----------|------|----------|-------|------|-------------|
| 协商民主 | 2013 | 3.06 | 2013 | 2014 | |
| 全民族抗战 | 2013 | 3.18 | 2014 | 2015 | |
| 国共合作 | 2013 | 2.81 | 2015 | 2016 | |
| 中流砥柱 | 2013 | 2.78 | 2015 | 2016 | |
| 陕甘宁边区 | 2013 | 3.01 | 2016 | 2017 | |
| 统战工作 | 2013 | 2.93 | 2016 | 2019 | |
| 日本共产党 | 2013 | 2.81 | 2016 | 2020 | |
| 统一战线 | 2013 | 3.67 | 2017 | 2018 | |
| 新时代 | 2013 | 7.14 | 2018 | 2020 | |
| 宗教工作 | 2013 | 3.76 | 2018 | 2020 | |
| 民族团结 | 2013 | 2.91 | 2018 | 2019 | |
| 改革开放 | 2013 | 2.77 | 2018 | 2019 | |
| 人民政协 | 2013 | 3.01 | 2019 | 2020 | |
| 高校 | 2013 | 2.65 | 2019 | 2020 | |
| 习近平总书记 | 2013 | 2.71 | 2020 | 2023 | |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2013 | 2.62 | 2020 | 2023 | |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2013 | 4.53 | 2021 | 2023 | |
| 新民主主义革命 | 2013 | 3.49 | 2021 | 2023 | |
| 百年历程 | 2013 | 3.49 | 2021 | 2023 | |
| 红岩精神 | 2013 | 2.88 | 2021 | 2023 | |
| 经验启示 | 2013 | 2.72 | 2021 | 2023 | |
| 人民民主 | 2013 | 2.7 | 2021 | 2023 | |

图 5 关键词突变图

一战线研究主要聚焦统一战线的历史以及群众路线、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学科建设等议题。由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的研究也得到较大关注。关于统一战线的历史研究，这一阶段主要关注抗战期间的统战工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蒋建农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12 期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被下载 2779 次、被引 36 次，为该阶段被下载最多的文章；王建华发表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兼析新民主主义理论生成的实践逻辑》，被下载 1881 次、被引 45 次，为该阶段被引用最多的文章。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对统一战线的研究更多也聚焦在统一战线在某个历史阶段特别是抗战期间所起的作用方面，把统一战线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不多。虽然这一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出现高潮，但在统一战线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2013 年、2014 年发文量都在 110 篇左右。

第二阶段（2015—2021 年）：第一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这一阶段的统一战线研究出现两个拐点，一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后，关于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年发文量达到 213 篇，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高水平；二是 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后，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涌现出大量研究阐释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文章，当年总发文量达到 289 篇，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在这期间，发文量总体也呈上升趋势，每年都在 110 篇以上。这一阶段的统一战线研究范围较广，涉及统一战线各个领域，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国家安全等前沿话题以及涉及新时代、习近平、大统战等关键词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研究的深度、广度都得到较大拓展，统一战线已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研究已经触及统一战线的本质、概念、哲学底蕴、话语构建等深层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的深入研究，已经初步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为下一阶段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阶段（2022—202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大以后。2022年，党中央先后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党的二十大，前者系统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后者将统一战线定位为“强大法宝”并纳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范畴进行战略部署，两者都为进一步深化统一战线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022年主要延续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研究，也是发文量最多的主题，但从2022年7月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到2023年7月，全过程人民民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中国化、国家安全等重要议题不断涌现，表明理论界已经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已经越来越得到认可。

五、统一战线研究的核心议题

综合检索到的 CSSCI 文献以及统一战线专业期刊相关文献的分析，同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对其议题进行梳理。经过内容分析，归来起来看，其涉及的核心议题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统战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周恩来、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统战思想方面。如杜淳、陈云云对毛泽东、习仲勋、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①②}，李雅兴、孙雨对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的研究^③，陈建樾、雷兴鹤对邓小平、习仲勋的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④⑤}，肖光荣、谭拓对邓小平协商民主思想的研究^⑥，佘咏梅、任贵祥的《周恩来对新中国侨务工作的奠基性贡献》^⑦等。以上这些文章主要着眼统一战线的某个领域，缺乏对领导人统战思想的全面把握。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以后，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统战思想的研究日益增多，表述越来越规范、研究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如莫岳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⑧，包心鉴《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根本纲领——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⑨，周述杰、朱小宝《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向度》^⑩，王冉《论习近平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⑪等。但从2022年7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至今，系统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文章在 CSSCI 文献中还未出现。

① 杜淳：《统一战线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侨务思想的理论传承与创新——以毛泽东、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为中心的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24—31页。

② 陈云云：《习仲勋侨务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49—160页。

③ 李雅兴、孙雨：《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和治理意义》，《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9，28页。

④ 陈建樾：《“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邓小平、习仲勋的民族团结思想》，《兰州学刊》2019年第1期，第22—32页。

⑤ 雷兴鹤：《习仲勋对西北地区民族工作的贡献》，《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第24—37、139—140页。

⑥ 肖光荣、谭拓：《邓小平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湖湘论坛》2016年第5期，第19—26页。

⑦ 佘咏梅、任贵祥：《周恩来对新中国侨务工作的奠基性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1期，第4—12页。

⑧ 莫岳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第45—53页。

⑨ 包心鉴：《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根本纲领——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第3—11页。

⑩ 周述杰、朱小宝：《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向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4期，第14—24页。

⑪ 王冉：《论习近平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6期，第33—35页。

(二) 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研究

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历史经验,一直是理论界开展统战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一主题的文献也是最多的。一是关于统战一线地位、作用、概念等的历史演变研究。张江汀把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置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进行考察^①;李俊、李明等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同盟者主体的变化^②;张献生提出凝心聚力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功能和价值所在的结论^③;张超等人分析了党的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内在逻辑^④;路珧从政党、国家、民族三个维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题演进与逻辑启示^⑤;肖存良从政党、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视角,得出统一战线是社会革命的战略武器、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现代化的推动力量的结论^⑥;路璐则认为统一战线实现从阶级联盟逐渐转变为非阶级联盟,从划分敌友逐渐转变为大团结、大联合,从革命策略逐渐转变为治国方略的转变^⑦。二是关于不同历史阶段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研究。夏清借用语言学中“词汇竞争”的概念框架考察了1936年至1937年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表述的生成^⑧;李均、吴文杰、闻丽等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地位的变化和作用的发挥;廖幸谔、张峰等学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郝丽认为统一战线体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历史逻辑^⑨;张峰、杨荣国、林绪武、蒋光贵、陈家刚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三是关于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历史经验的研究。黄卫平等学者分析了人民政协理论的发展^⑩;吴珍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友党同行的历史经验^⑪;王志国、刘宝明、王延中、金炳镐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总结了我们党民族工作的历程和经验;任杰、汪文慧等学者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百年历程和经验启示;李春玲分析了中国阶级阶层论述的百年演进^⑫;张梅回顾了海外华侨统一战线的百年历程^⑬。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贡献。

(三)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研究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统一战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及制度化的议政建言平台和政治参与渠道,

① 张江汀:《传承弘扬“坚持统一战线”宝贵历史经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伟力》,《党建》2022年第2期,第7—9页。

② 李俊、李明:《党的统一战线同盟者主体视角的历史演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4期,第70—75页。

③ 张献生:《凝心聚力:统一战线的根本功能和价值所在——新中国70年统一战线的经验和启示》,《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5—18页。

④ 张超、曹文宏:《中共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内在逻辑》,《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5—24页。

⑤ 路珧:《政党—国家—民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题演进与逻辑启示》,《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43—50页。

⑥ 肖存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0页。

⑦ 路璐:《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内涵及其演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2期,第63—74页。

⑧ 夏清:《“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9—59页。

⑨ 郝丽:《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回顾:从历史逻辑到现实定位》,《学海》2021年第3期,第22—28页。

⑩ 黄卫平、汪洋:《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人民政协理论发展及实践探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81—87页。

⑪ 吴珍美:《论中国共产党引领友党同行的历史经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40—53页。

⑫ 李春玲:《中国阶级阶层论述的百年演进:理论取向与研究模式》,《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32—39页。

⑬ 张梅:《中国共产党海外华侨统一战线的百年历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第10—20页。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的问题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一是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李俊认为，统一战线工作本质与国家治理目标具有价值上的一致性^①；孙冲亚等认为，统一战线以其内蕴的协商民主逻辑、价值整合机制、合法性资源吸纳功能，为党领导革命斗争、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蕴积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力和价值引导力^②；林华山、罗振建认为，当代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国家建构道路，确立了新型国家形态，新型国家形态的独特道路在于与统一战线内源互构^③。二是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功能。陈明明指出，随着形势变化，统一战线显现出输赢博弈的政治斗争策略、建立全面支配优势的结构优化战略、现代国家建设杠杆的国家治理之道三重面相^④；蒋德海认为，统一战线契合社会治理主体的广泛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态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民主法治相结合原则，能够助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与封建的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和习惯进行比较彻底的决裂，广泛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治理^⑤；林华山等认为，融合多维团结形态的统一战线，凸显联盟之术、凝聚之制与强国之道、团结之学的高度统一^⑥；鲁法芹把统一战线作为“国体”进行论述，认为有着顽强生命力和内生性的统一战线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大方向之一^⑦。三是国家治理对统一战线的要求。林华山认为，以共同体思维谋划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趋向，要求实现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从利益驱动型统一战线到价值驱动型统一战线、从外在服务中心统一战线到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统一战线、从传统分散统战工作格局到现代整体统战工作格局的发展^⑧；王斌元等人认为，统一战线必然要使自身在指导思想、制度体系、主体范围、方式方法等方面有机地融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进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⑨；张伟军指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驱动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主要表现为人民共和、社会团结、软性治理等三个方面理念及话语的融合建立和协同发展^⑩。

（四）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统一战线天然具有民主基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与统一战线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是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所以一直以来，关于统一战线与中国式民主的研究非常多。一是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陈明明等分析了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认为未来中国党政体制的实践与研究议题要重点关注这些方面——长期执政、反腐败、国家治理效能、协商民主、统一战线^⑪；杨君武从国家治理视角中国国家治理主体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等视点出发，研究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基本特性、实际作用、综合

① 李俊：《统一战线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及其优势》，《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8—124页。

② 孙冲亚、何祥林：《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统一战线：功能、挑战及其进路》，《理论月刊》2021年第7期，第51—58页。

③ 林华山、罗振建：《新型国家形态的独特道路——以统一战线为视角》，《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6期，第14—28页。

④ 陈明明：《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5—14页。

⑤ 蒋德海：《统一战线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使命、优势与路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1—36页。

⑥ 林华山、龚静阳、刘泖菡：《多维团结：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12—25页。

⑦ 鲁法芹、赵彩燕：《论作为国体的统一战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1期，第34—43页。

⑧ 林华山：《共同体视角下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与发展趋向》，《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26—38页。

⑨ 王斌元、颜旭、黄长勇、廖新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统一战线现代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24—132页。

⑩ 张伟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及其实践路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9—19页。

⑪ 陈明明、李松：《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路径与逻辑》，《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7页。

能力培育、保障机制建设等热点问题^①；钱再见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必须在政党协商中始终坚持协商为民，凸显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责任^②；钟德涛等分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然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③；李景平等人分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历程与基本经验；杜俊奇等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政党制度类型、新的执政和参政方式、新的政党关系、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和新的现代治理方式^④；林怀艺别出心裁，从历史文献中比喻、比拟、借代等修辞话语的角度考察新型政党制度，深入阐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性、本土性，得出这项制度“植根于我国土壤”具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⑤。二是关于政治协商的研究。齐惠探讨了协商建国与创立人民政协的政治意蕴^⑥；董树彬等人指出，人民政协由界别组成，并通过界别实现政治吸纳功能，认为政治吸纳是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优化的内在逻辑^⑦；陈家刚认为，我国政党协商的基本特征是组织性、政治性、平等性和直接性，深入推进政党协商，有助于实现政治吸纳、政治沟通、政治支持、政治整合和政治平衡^⑧；张峰直接指出，人民政协制度是国家实体性制度，而不是具体履职制度以及支撑履职的工作制度^⑨；佟德志认为，人民政协制度以其特有的治理效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等各个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当代中国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式^⑩。三是系统阐述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张艳娥分析了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认为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在发生机制上的共生性、在发展逻辑上的同构性，生成二者功能上的互进性^⑪；王平等人认为，统一战线内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进程，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⑫；束赟梳理了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认为统一战线通过对“整体性人民”的凝聚和对多属性的“现实的人”的整合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性”，因此，统一战线是处理党与人民关系的关键抓手之一^⑬；李俊认为，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⑭；蔡宇宏则认为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生性要素^⑮。

① 杨君武：《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若干问题探讨》，《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5—10页。

② 钱再见：《为人民谋幸福：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02—110页。

③ 钟德涛、孔海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然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13—20页。

④ 杜俊奇、张献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创制》，《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5—12页。

⑤ 林怀艺：《“植根于我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基于历史文献中修辞话语的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10期，第68—76页。

⑥ 齐惠：《协商建国与创立人民政协的政治意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43—53页。

⑦ 董树彬、董鹏林：《政治吸纳视阈下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优化》，《中州学刊》2019年第8期，第1—8页。

⑧ 陈家刚：《政党协商：内涵、特征与价值》，《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6期，第50—56页。

⑨ 张峰：《论人民政协制度的国家制度性质》，《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71—78页。

⑩ 佟德志：《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期，第60—64页。

⑪ 张艳娥：《共生、同构、互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与发展的统一战线机理》，《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38—50页。

⑫ 王平、张佳敏、周旭霞：《统一战线的民主功能分析：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8—77页。

⑬ 束赟：《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位置与作用》，《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1期，第89—98页。

⑭ 李俊：《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学海》2017年第5期，第15—19页。

⑮ 蔡宇宏：《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生性要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3期，第41—51页。

（五）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研究

统一战线涉及民族、宗教、西藏、新疆、港澳台、海外等诸多工作领域，而这些领域都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学界在讨论国家安全时，很少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这方面的成果较少。林华山认为，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大统战与大安全的关联逻辑，统一战线是国家政治共同体安全的存在形态，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枢纽机制；^①毛欣娟认为，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既表现为营造有利国家安全的总体环境，也体现为在民主政治、民族宗教、港澳台和海外等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发挥作用^②；汪守军提出，维护统一战线政治安全必须解决对统一战线正确认识的问题、统一战线制度以及相关制度的位阶问题、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的问题^③；石文龙对统一战线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④；许焯则根据风险衍生“事前—事中—事后”的衍生逻辑和系统论，对建立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⑤；王祯军还认为，统一战线汇集民意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众参与，集中民智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重大决策的民主性，凝聚人心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沟通的效果^⑥。

（六）国际统一战线研究

近年来，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研究逐渐增多，成为统一战线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杜俊华讨论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中国化问题^⑦；汪谦干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⑧；门洪华等人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国际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长期秉持的一种联合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理在国际工作中的拓展，堪称中国争取自身发展的有利环境、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战略依托^⑨；曾向红等人认为，基于旧式国际统一战线的局限性、国际统一战线构建基础从单一向多元的演变等诸多因素，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不能单纯以“主体划线”来确定团结对象，而应实施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逻辑；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坚持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逻辑，将推动形成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新领域布局^⑩；还有学者从元宇宙的视角讨论国际统一战线，分析了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机理与实践图景，认为元宇宙时代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能够在化解原子化风险、丰富个体联结、强化国家交往、密切全球联结等方面发挥作用^⑪。

① 林华山、龚静阳：《大安全与大统战：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74—92页。

② 毛欣娟：《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基本面向》，《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39—44页。

③ 汪守军：《略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安全》，《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52—57页。

④ 石文龙：《统一战线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中的作用问题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35—40页。

⑤ 许焯：《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机制研究》，《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47—57页。

⑥ 王祯军：《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指导下统一战线在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23年第3期，第44—50页。

⑦ 杜俊华：《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中国化——简论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9期，第42—47页。

⑧ 汪谦干：《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安徽史学》2021年第3期，第26—36、117页。

⑨ 门洪华、俞钦文：《中国共产党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百年探索（1921—2021年）》，《国际观察》2022年第1期，第31—53页。

⑩ 曾向红、田嘉乐：《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129—137页。

⑪ 吕鹏、毕斯鹏：《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机理与实践图景》，《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21页。

(七) 统一战线各领域热点问题研究

统一战线研究点多面广、学科交叉,很多学科的热点问题都可以折射到统一战线身上,导致研究热点多,呈现出多维面向。一是开辟统战理论研究新领域。高晓霞等人从领导、合作与合力三个方面对统一战线进行动力学研究^①;阿力木·沙塔尔等人从宪法文本的角度来研究统一战线,提出了统一战线的规范意义及规范体系构建^②;丁忠毅等人阐述了统战治边方略^③;方盛举等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讨论统战工作^④;还有学者提出圈层统战^⑤、全域统战^⑥、数字统战^⑦、新时代民族统一战线^⑧等新概念。这些独特的视角、崭新的表述,进一步丰富了统一战线研究。二是聚焦统一战线新对象。郝丽分析了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策略^⑨。张梓琪等人认为,青年网络政治人的无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时代挑战,统战工作具有整合社会力量、推动政治参与有序运行的重要功能,因而是解决青年网络政治人无序政治参与的优势路径^⑩。王建国认为,网络统战不能再拘泥于“工具论”,应放到网络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形态中去研究,重新审视网络统战的策略和方法,在互动与共识中凝聚人心、汇集力量,构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⑪。三是构建统战理论研究新体系。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学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⑫就已经开始了。近年来,随着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讨论逐渐热烈,构建统一战线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刘新庚等人对统战学学科界定进行了研究,认为就其学科研究对象而言,统战学应是研究统战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专门学科;就其理论属性而言,统战学应是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就其实践属性而言,统战学应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人类和平的应用型学科^⑬。理论体系建设方面,路璐依据马克思主义原文典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来龙去脉做了梳理和考证^⑭;李金河等人认为统一战线是

① 高晓霞、钱再见:《领导、合作与合力——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动力学研究》,《学习论坛》2022年第1期,第85—92页。

② 阿力木·沙塔尔、胡弘弘:《“爱国统一战线”的规范意义及规范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第69—75页。

③ 丁忠毅、黄一鑫:《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统战治边方略》,《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09—118,188—189页。

④ 方盛举、杨睿哲:《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研究》,《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3年第4期,第109—121页。

⑤ 林华山:《圈层统战: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理论视角与升级路径》,《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9—36页。

⑥ 杨卫敏:《全域统战:新时代大统战的总驱动》,《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93—101页。

⑦ 谢静:《数字统战前瞻: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新型建构路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8页。

⑧ 晏晓娟:《新时代民族统一战线建设的新路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31—36页。

⑨ 郝丽:《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策略重构》,《中州学刊》2021年第6期,第21—25页。

⑩ 张梓琪、丁三青:《青年网络政治人的政治参与失范与统战策略》,《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5期,第16—22页。

⑪ 王建国、李济时:《新时代的网络统战:挑战、策略和方法》,《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68—73页。

⑫ 陈奇文:《试论统一战线科学的研究对象》,《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第109—112页。

⑬ 刘新庚、傅建平、李佳晔:《关于统战学学科界定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68—172页。

⑭ 路璐:《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新探》,《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92—99页。

一门凝心聚力的学问^①；范柏乃从提升统战理论研究课题的经费投入、加强统战理论研究的队伍建设、强化统战理论研究的社会调查、提高统战理论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加快统战学科建设和统战科学发展等方面，提出加强统战理论研究的对策^②；也有学者从政党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学术史梳理，认为应该从党建学和政治学两个面来构建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③。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罗振建等人认为，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建设高度关联，统一战线服务中国话语权建设，要推进统一战线领域的话语“供给侧改革”^④；陈奕平等人提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外话语传播要坚持通约性、共通性、互动性三大理路，完善理论、历史以及实践层次的话语建构路径^⑤；丁俊萍等人认为，新形势下，应从增强统战话语主体的统战意识、创新统战话语内容、提升统战话语传播效力、营造良好的统战话语环境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权建构^⑥；也有学者从当代中国民族团结话语^⑦、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⑧、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⑩等角度对统一战线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六、统一战线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我国统一战线研究 CSSCI 文献，结合核心议题梳理与重要文献述评，可以发现理论界在对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中，统一战线从来没有缺席。但也应该看到，统一战线研究还处于“碎片化”阶段，对统一战线进行系统化理论建构还不足，未来必须增强统一战线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一）统一战线研究存在的不足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分析并结合核心议题综述，我国统一战线研究至少还存在以下不足：

1. 研究体系没有形成。从核心作者发文情况来看，长期关注统一战线研究（文献首发年份为 2013、2014 年）的核心作者仅占 35.7%，可以看出理论界对统一战线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应景性，缺乏长期跟踪。从研究机构来看，发文量在 30 篇以上的都是国内文史学科实力较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但合作机构图谱中的网络密度为 $E=0$ ，这说明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合作关系。从发文情况来看，主题不够聚焦、内容庞杂。可以看出，当前统一战线研究的学科归属并不明确，在全国范围内缺乏一个机构或平台对统一战线研究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统筹，研究者们开展统一战线研究更多的是出于兴趣爱好或现实政治所需，缺乏系统性。

2. 研究队伍建设不足。从核心作者来看，发文量在 4 篇以上的作者都是该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年轻作者不多。从发文最多的中国人民大学来看，涉及 19 位作者，这些作者来自多个学院、

① 李金河、高国升：《统一战线是一门凝心聚力的学问》，《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41—46 页。

② 范柏乃：《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加强统战理论研究》，《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01—103 页。

③ 黄天柱：《中国参政党理论研究：学术史考察及体系构建》，《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25—39 页。

④ 罗振建、林华山：《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32—40 页。

⑤ 陈奕平、关亦佳：《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外话语建构：逻辑与路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1—9 页。

⑥ 丁俊萍、颜苗苗：《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第 1—14、181 页。

⑦ 王军、刘毅：《当代中国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及其理论源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7—14 页。

⑧ 董树彬：《论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理论与改革》2014 年第 4 期，第 5—9 页。

⑨ 郭道久：《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研究》，《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59—65 页。

⑩ 梁杰皓、丁俊萍：《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原则和价值》，《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100—106、123 页。

跨多个学科,研究力量较为分散。作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的社会主义学院,在CSSCI文献中的贡献度并不高。在高级检索中,以发文单位为“社会主义学院”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CSSCI文献419篇,但以主题为“统一战线”、发文机构为“社会主义学院”进行检索,只能检索到文章34篇,仅占CSSCI文献的8%,这说明即便是社会主义学院的研究者,聚焦统一战线研究的仍然不多。

3. 研究方法创新不够。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统一战线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主要采用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近年来也有学者尝试从管理学、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统一战线领域的问题,但运用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不多,主流还是以政治学、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等为主。受学科视角和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影响,目前能检索到的CSSCI文献主要以规范性研究为主,主要讨论统一战线的概念、范畴、属性、功能、关系等主题,缺乏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或对某一现象的跟踪研究。总体而言,中国统一战线研究缺乏定量、实证研究。

4. 回应现实需求不够。统一战线工作政策性很强、现实针对性也很强,这就要求统一战线研究不仅要解决为什么、是什么的问题,更要解决怎么干的问题。现在统一战线研究有一个倾向,就是重历史研究、轻现实研究,重政策解读、轻政策落实,导致理论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从关键词出现频次看,出现频次最高的12个关键词中,与历史紧密相关的占到58%。进入新时代,虽然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没有变,但无论形势任务、还是内部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迫切需要统一战线研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适应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学界进行积极回应,提出了一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方法,如“全域统战”“圈层统战”“数字统战”等,但缺乏后续的深入研究。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但在已发表的文献中相关研究占比并不大,仅分别占4%和0.7%,可见当前的统一战线研究回应现实需求是不够的。

(二) 统一战线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统一战线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系统性不强、专业化不够、针对性不足,未来的统一战线研究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

1. 加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当前统一战线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在于没有学科来进行统领,导致出现“小、散、弱”的问题。统一战线学是一门科学,有它的理论和规律。时至今日,党的“三大法宝”中的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都已经成为专门学科——军事学和党建学,唯有统一战线的学科建设之路还在探索中。目前有了一些进展,比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与山东大学已经联合培养统一战线学研究生,河南、湖南、江苏、四川等省也在尝试,但统一战线学科建设不仅仅是纳入国民教育系列这么简单,而是要形成一整套关于统一战线的成熟定型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很明显,这样的系统构建还没有完成。统一战线学科建设,单靠理论界呼吁和推动是很难完成的,需要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国家部委从国家层面进行论证和规划,进一步明确统一战线学科的属性,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问题,各分支研究领域的内涵和边界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只有有了学科的引领,才能形成稳定的研究力量和高层次的研究成果。

2. 构建统一战线研究体系。目前,对全国统一战线研究力量进行整合的机构只有一个,即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本层级的理论研究会对本地的研究力量进行整合。目前,从国家到地方的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的运作来看,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高校、科研机构、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部门等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之间进行合作交流并不多,这就造成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很“高大上”,但统战部门“用不上”,社会主义学院的研究创新性不强,统战部门“瞧不上”,最后变成统战部门自己研究自己,但精力“顾不上”。这就需要统战部门以“统战理论研究会”这个平台,或者通过成立统一战线学会,来统筹全国的统一战线研究,

推动形成统一战线研究学术共同体。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独立的研究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机构都比较健全，有一支相对专业的研究队伍，应该强化协同合作，按照地域相近、研究领域相近的原则，构建统一战线研究创新联合体，形成统战研究合力。

3. 聚焦统一战线研究主题。研究主题分散也是统一战线研究不成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一段时间，统一战线研究要聚焦以下主题：一是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研究阐释。要深入研究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核心要义，重点研究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关于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关于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关于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作用、关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关于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关于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等重要论述。二是加强对统一战线重要制度的研究。比如，在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方面，要围绕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健全完善符合民主党派特点、系统规范的参政党建设制度机制、增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等方面加强研究；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更好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共同性和差异性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有效增进各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奋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民族事务法制体系等进行研究；在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从理论上厘清民营经济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推动保护民营企业的权益，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面，要正确处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全面管制权、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做好广泛争取人心工作。三是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各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比如，统战工作范围正在扩大，如何扩大覆盖面、增加包容性，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如何做好青年统战工作，争取年青一代的人心；如何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研究；如何把握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如何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效组织起来；如何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如何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重大风险；如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等等。

4. 创新统一战线研究方法。从研究视角看，要结合研究重点，注重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统一战线置于多学科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审视。比如，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统一战线思想史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方法，统一战线历史时间、重要任务、历史演变等可以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新型政党制度可以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中国化等可以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统一战线研究的是政治问题，研究对象都具有政治属性，所以从本质上讲统一战线学，就是研究政治系统中具有政治联盟关系的人群的学问，也可以说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归属是政治学，所以应尽可能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进行研究。要探索采用定量、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统一战线各领域问题，比如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等，用定量或实证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会比较客观和具有说服力。当然，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实用性很强，开展研究要紧紧密结合统战工作实际，不能盲目套用一些流行的概念或理论范式，让统一战线变得更加“神秘”，而是要让统一战线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责任编辑：念兴昌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研究述评： 基于系统化的思路

袁竞闻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华市政协理论研究基地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政协智库, 上海 201418)

摘要: 目前, 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研究既有理论与价值层面, 也有实践与经验层面。其中, 概念建构方面着重于内涵与结构要素等研究; 发展价值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权利监督、国家治理、政治信任等方面; 发展比较优势方面, 学界主要从应用、功能、程序、理念等方面进行探讨; 发展逻辑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制度逻辑等方面; 学界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治理、广泛多层民主政治、结合网络发展等方面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发展途径研究成果涵盖了政党领导、制度规范、法治保障、监督机制、动力认知、数字智能、话语体系构建、民主素养培育等广泛领域。可见,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研究成果涉及多个维度, 呈现系统化研究趋势, 勾勒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基本轮廓, 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宏观思路。然而, 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尚存不少研究空间, 如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该如何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在实践领域如何拓展、如何系统性培育民主素养、协商民主如何深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与提升政府信任的研究、如何进一步建设与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发展; 述评; 系统化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3) 03-0034-12

一、引言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顶层设计并结合基层实践而发展起来的, 经历了一个多主体互动、渐进式的民主发展过程。2022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上的重要现实意义。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民主)为主题词检索, 从2019年11月2日至今(检索截至2023

基金项目: 2023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2023EKS00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青年科技人才发展基金“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ZQ2023-7)。

作者简介: 袁竞闻,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金华市政协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年8月25日),在中国知网(北大中文核心、CSSCI期刊与报纸数据库,其中目标报纸为《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法治日报》《人民政协报》《新华每日电讯》《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主流权威报纸)共找到样本文献577篇,剔除书评时评、新闻报道、专栏导语和会议综述等文献,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100多篇,并搜集有关著作10余本,分别为:佟德志《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民民主研究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桑玉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程竹汝《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人大履职实践的研究》,汪仲启《民心政治:生活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林建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任仲文《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王灵桂《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研究》,陈毅《中国民主:基于国家的民主吸纳与治理考察》,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中国式民主:协商贯穿于人民民主全过程》,上海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研习实践基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基地《虹桥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录》。笔者发现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关键议题进行研究,呈现了“内涵与结构要素—价值—比较优势—逻辑—空间—途径”系统化研究的思路,体现了其发展的学理性、必要性、重要性、规律性、现实性、科学性等特点。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研究现状

(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概念:内涵与结构要素

1.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从学界目前研究来看,普遍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民主的表现形式,将其纳入到人民民主的范畴,总的来说有两种研究方向:

一是从“全”“过程”“人民”上解析内涵。如刘建军对“全”的内涵进行了总结,从全部阶段、全体人民、全部领域、全部层级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①谈火生等学者也阐述了“全”的含义,一是民主的主体“全”,二是参与的内容“全”,三是覆盖的范围“全”,四是民主的流程“全”。^②佟德志等阐述了“过程”的含义,认为人民可以在选举期间对相关事务进行投票,还可以在日常的公共生活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到民主整个过程中。^③曹典顺认为,“过程”是以制度的形式规范民主政治的建立和运行过程,对实现民主过程的次序、步骤和方式等作出规定。^④樊鹏从“人民”的含义入手,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实践成果,是对我国实行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制度本质特征的概括。^⑤

二是从民主新形态之“新”的角度阐释内涵。具体体现在形式与内容、权利、程序与参与、创新等几个方面。民主形式与内容角度,有研究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在形式上构建人民民主的程序和模式,也在实质上体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成果。^⑥强调民主权利的角度,张明军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人民在纵向时间和多维空间中享有完整行使民主的权利,以对人民多数人意志尊重为目的的新形态民主”。^⑦民主程序与参与的角度,虞崇胜提出,全过程

① 刘建军、张远:《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政策研究》2021年第4期,第95—106页。

② 谈火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人民政协报》2021年9月29日,第8版。

③ 佟德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4期,第4—11页。

④ 曹典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唯物史观本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9页。

⑤ 樊鹏:《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3—10页。

⑥ 涂成林:《习近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建构》,《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2—19页。

⑦ 张明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9期,第31—37页。

人民民主包括全部民主主体、民主程序和民主过程，是一种全主体、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全环节、全链条的人民民主。^① 从民主政治创新的角度，肖立辉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新探索。^②

综合当前研究，笔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持续发展完善，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整，充分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和政治实践过程的新形态民主。

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要素。结构要素指能够完整反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特征并支撑其运作的关键要素和环节。王江伟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治理实践中呈现出民意征集、民主协商、民主表决、民主监督等关键的结构要素。^③ 李小雨对城市社区治理进行分析，认为共同体的理念、完整的制度程序以及可操作的民主行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结构要素。^④ 李璎珞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结构，包括以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核心的纵向要素，以不同的协同民主制度形式为核心的横向要素。^⑤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价值研究

学术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权利监督、国家治理、政治信任、民主理论等方面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

1. 对加强权力监督的价值。民主形态与民主监督形态的变化是内在的，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新形态会促进权力监督理念的更新。如任剑涛围绕权力监督体系，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建构起由监督的诸环节、监督的全领域、监督的总布局和监督的好结果构成的无缝隙监督体系。^⑥ 朱庆跃从主体、客体、方式、流程、机制等五个方面，进一步对权力的运行进行规范，避免了权力所有者监督缺位，避免了权力的“漏监与空监”，避免了不愿监、不敢监，避免了监督的脱节和中断，避免了监督“走过场”等问题。^⑦

2. 对深化国家治理的价值。治理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某种程度上民主政治的发展能够带来治理绩效的显著改善。^⑧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国家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具有正向功能，这些研究使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讨范畴从民主理论拓展到国家治理实践。如汪仲启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有助于在超大规模的现代国家中构建起纵横贯通的立体式意见沟通机制，塑造一种整体、贯通、协调的国家治理新格局。^⑨ 任中平关注村民自治领域，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有助于指引我们按照民主的逻辑进程、实际内容和实现形式审视当前我国基层民

① 虞崇胜：《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7期，第42—45页。

② 肖立辉：《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新探索》，《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7期，第19—23页。

③ 王江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结构要素与生成机制》，《求实》2021年第5期，第17—30，109—110页。

④ 李小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探索——以上海社区基金会为例》，《党政研究》2022年第3期，第47—58页。

⑤ 李璎珞：《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析：结构、流程与功能》，《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10—17页。

⑥ 任剑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权力无缝隙监督》，《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6—10页。

⑦ 朱庆跃：《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构建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价值》，《学术界》2022年第11期，第43—50页。

⑧ Richard Kohl. Failure of Governa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3, no. 50, 2008, pp. 4—74.

⑨ 汪仲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上海虹桥街道为对象》，《社会政策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7—123页。

主与基层治理的实践状况及发展走向。^① 房亚明认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了居民自治理论，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②

3. 对提升政治信任的价值。信任本质上是各主体之间相互认可和依靠的关系，政治信任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有多种因素可以促使形成这种关系，达成共识就是形成该关系的基础，同时这种共识须建立在民主参与环节之上，^③ 即参与是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信任的必要环节和路径。如王维国等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能起到“向人民承诺”的作用，承诺主体通过承诺获取政治信任并得到授权，获得发挥权力效能所需的依据和空间；另外，承诺主体需要在授权主体的监督下如约践诺，实现既定目标，能够有效防止权力的不当使用。^④ 付宇程认为，腐败感知与公民的政治信任呈显著负相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有针对性地在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中削弱公众的腐败感知。^⑤

4. 对丰富民主理论的价值。方歆然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过程哲学嵌入民主理论，强调完整的政治制度结构与体系，实现了民主环节配合发展、实践发展、层次发展，全面拓宽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内涵。^⑥ 李翔宇认为，理念上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代表理论，并进一步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⑦

5. 对民主形象认同的价值。张爱军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影响着公众的信息选择、感性认知、理性认知、身份认同、心理偏好等方面，通过价值、制度、权利塑造国家的民主价值形象、制度形象和权利形象，其动态性促使国家民主形象的建构具有鲜明的活动特征。^⑧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比较优势研究

自熊彼特始，西方建构了精英民主模式，该模式在与实践互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与悖论，它既没有对国家与社会治理产生相应的实际效果，也没有在其他方面释放出更多的民主红利。这一现象引发了西方民主的范式危机，但仍旧未能使西方民主模式在制度、程序上发生重大改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垄断了民主的定义权，从而遮蔽了对自身民主发展的审视，失去了民主发展的动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截然不同，它始终坚持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主，因而在多方面都呈现出显著优势。

1. 民主应用上的超越。西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化约为竞争性选举的单一形式，但民主发展应用不局限于此。韩震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选举民主”的神话，使“中国的民主不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还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⑨。林毅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为

① 任中平：《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第1—15、147页。

② 房亚明：《“全过程民主”视域下城市社区自治治理的机制建构》，《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31—39页。

③ 袁竞闻：《中国共产党基层协商民主效能发挥的三个环节》，《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1期，第50—55、74页。

④ 王维国、陈雯雯：《“向人民承诺”嵌入人大代表监督机制的理论构建——基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21—29页。

⑤ 付宇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基层腐败防治难题的有效路径》，《探索》2022年第4期，第39—48页。

⑥ 方歆然：《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湖湘论坛》2022年第4期，第18—30页。

⑦ 李翔宇：《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第12—24、5页。

⑧ 张爱军、雷艳妮：《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民主形象建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8—44页。

⑨ 韩震：《全过程民主制度保证了中国道路的成功》，《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12期，第12—13页。

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重塑了被西方民主所破坏的民主与治理的关系,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选主”取代民主的问题,重塑实质性的民主内容体系。^①

2. 民主功能上的优势。相关研究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着动员人民、科学决策、民主表达和制约监督等民主功能优势,如强调民主的真实性,关心决策过程而不仅是表决的形式^②,注重政治过程的民主化,通过完整的制度框架保证,实现了民意有效表达在各个环节中能够动员各种积极力量加入到社会治理行列中,^③做到了以全过程的民主机制落实人民当家作主。

3. 民主程序上的优势。桑玉成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构成对西方“非全过程民主”的超越,改变了那种“一次性消费行为”般的民主游戏。^④王炳权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遵从程序完整理念,将民主程序各环节贯通,形成了民主链条的完整闭环,使得民主实践能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中,有效防止了西式民主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⑤

4. 民主理念上的超越。包大为提出,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机制的民主政治实践不断趋势于身份政治和集体暴力,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超越了其虚伪的、抽象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规范。^⑥元光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不同于以“普选”“政党”“个人意志”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它始终将“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统一于治国理政的各环节。^⑦林修能进一步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强调人民政治主体、全过程运行评价与“实质自主”的价值追求,呈现出对西式公民民主、选举民主与形式自由民主的三重超越。^⑧

(四)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逻辑研究

1.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源自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百年奋斗的伟大成果,源自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如包心鉴认为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主不懈奋斗,经历了争得民主、建构民主、发展民主、升华民主的百年辉煌历程,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崭新局面。^⑨

2.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理论逻辑。不少学者研究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逻辑联系。刘洪刚提出,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的人民民主概念,实现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向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的转变。人民本位使人民在民主运转的整个环节中始终“在场”,决定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⑩

有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入手进行论述。孙应帅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能够使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经由“争得民主”的途径,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目标,从而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⑪田鹏颖从过程论视角分析,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整个

① 林毅:《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探索》2022年第2期,第51—63页。

② 陈周旺:《全方位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体系与制度选择》,《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第68—75页。

③ 宫笠俐、郭艺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质与显著优势》,《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1—10页。

④ 桑玉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基础性问题》,《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第5—8页。

⑤ 王炳权、张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第7版。

⑥ 包大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哲学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4期,第94—101页。

⑦ 元光、刘娇:《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基于“历史—理论—现实”的解释》,《探索》2022年第4期,第27—38、2页。

⑧ 林修能:《政治主体、运行评价与价值追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超越》,《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22—31页。

⑨ 包心鉴:《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和时代价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第4—12页。

⑩ 刘洪刚:《理解马克思人民民主概念的四重维度》,《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第56—64页。

⑪ 孙应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人民论坛》2021年第30期,第62—65页。

过程都是对事物总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的坚决遵从，是对马克思主义“过程集合体”思想的继承发展。^①尹奎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权概念在政治权利与民主权利方面的最新表达，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光辉。^②

3.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逻辑。关于实践逻辑的研究，学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权力和权利的逻辑。张君认为，从权力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为政治层面的民主形态，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全方位地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从权利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为社会层面的民主形态，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在基层社会事务各环节中直接行使各种法定权利，由此决定了其在实践逻辑上可概分为两大基本实现层次。^③二是政党领导的逻辑。陈冬冬、齐卫平等认为，中国共产党依照“政党在场”逻辑，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完整的制度程序和践行现实的民主实践等举措积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④三是治理绩效的逻辑。杨渊浩、程竹汝提出，把民生绩效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评价标准，要以民主的治理推动民生的保障。^⑤李笑宇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不仅追求公共权力建构与运行的合法性，还具有鲜明的治理绩效导向，侧重于描述实践操作与运行机制。^⑥

4.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制度逻辑。陈家刚、曲政等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到制度结构再到程序安排，都贯彻并彰显用制度体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价值追求。^⑦何建春认为，找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党—国家—人民”等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实现权衡的方式是关键，此举有助于有效地将整个社会的民主发展成果和实际效益维持在合理的发展阈值内。^⑧

（五）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空间研究

民主发展应具体而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 结合国家治理的实践空间。作为全方位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的价值原则和运行机制贯彻到国家治理各方面。如孔繁斌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资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则重新配置的行动，其本质是国家再构建的实践，其预期目标则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国家再构建行动。^⑨如上官酒瑞提出，要在既有制度框架中全过程嵌人民主机制，并与法治财政原则结合起来，建立参与式预算民主制度，实现有效财政开支。^⑩焦洪昌等提出，政府参事制度主要包含聘任制度、知情制度、建言制度、调研制度以及培训制度，让参事能以个人身份参与到政府工作当

① 田鹏颖：《全过程人民民主标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新高度》，《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21—28页。

② 尹奎杰：《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权意蕴》，《人权》2022年第1期，第71—79页。

③ 张君：《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17页。

④ 陈冬冬、齐卫平：《政党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演展逻辑》，《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37—43页。

⑤ 杨渊浩、程竹汝：《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民生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23—31页。

⑥ 李笑宇：《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维度：关系结构、实现机制与发展逻辑》，《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5期，第56—63页。

⑦ 陈家刚、曲政：《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1期，第3—12页。

⑧ 何建春：《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价值、阻梗与路径》，《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4—23页。

⑨ 孔繁斌：《全过程民主：政策参与过程优化的新情景》，《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第20—23页。

⑩ 上官酒瑞：《参与式预算是全过程民主的实践形式》，《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第27—29页。

中,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提供空间。^①孙照红以基层治理场域为对象,认为接诉即办治理通过全渠道接诉、全领域响应、全主体参与、全时空覆盖等民主治理机制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②

2. 广泛多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发展。有学者认为要注重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和推进,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和精神落实到实际的政治实践之中,才能不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空间。^③

第一,人大民主政治实践。程竹汝从渠道提供视角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正式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通道,能够直接和真切地体现全过程的民主实践,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主渠道。^④孙剑纲研究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大探索和实践,包括发挥立法联系点作用、探索民生实事票决制、推进代表联络站建设、完善代表述职制度、加强议案建议办理工作等。^⑤王逸帅以超大城市民意采集与人大立法输出为例,着重探讨上海等超大城市以民意为中心、在人大立法权的行使中如何不断吸纳和回应民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⑥

第二,人民政协民主政治实践。周淑真提出,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过程中,给予各民主党派中央与各专门委员会围绕全国政协重点协商议题,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合作开展调研,进行交流的机会,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施展的空间。^⑦蒯正明提出,许多地区在乡镇成立了政协委员之家、政协委员委员会客厅等机构,通过这种方式为基层民主实践提供规范和保障,同时,此类经验也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⑧

第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基层民主发展的伟大探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渊源。谢晓通、章荣君等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凭借政治介入、公意回应与主体互动等独特价值得以应用于农村基层民主这一具体政治实践,实现基层政治参与的“理性重建”,解决农村基层民主困境。^⑨

第四,协商民主政治实践。从协商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李锋、尹俊等提出,协商民主的制度体系以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为主要载体,以专门协商机构为重要渠道,以科学的程序机制为必要保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提供制度支撑。^⑩从探讨两者间互促发展的关系来看,董树彬、丁卓越等提出,协商民主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参照价值和镜鉴坐标,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协商民主在新时代的拓展与升华。^⑪

3. 结合网络空间发展。身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技术推动民主建设也成为一种前沿途径,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覆盖实践提供了发展平台。郎友兴强调民主政治,尤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需

① 焦洪昌、杜浩鹏:《政府参事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侧面》,《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2期,第26—34页。

② 孙照红:《接诉即办治理场域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35—42页。

③ 桑玉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④ 程竹汝:《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人大履职实践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页。

⑤ 孙剑纲:《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大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第36—41页。

⑥ 王逸帅:《民意采集与立法输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超大城市的实践》,《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第30—33页。

⑦ 周淑真:《人民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历史逻辑、方位体现与职能机制考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第20—28页。

⑧ 蒯正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第71—78页。

⑨ 谢晓通、章荣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界定、价值阐释与现实进路——基于农村基层民主视角的考察》,《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2期,第35—46页。

⑩ 李锋、尹俊:《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长白学刊》2022年第5期,第34—42页。

⑪ 董树彬、丁卓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拓展与升华》,《理论探讨》2022年第3期,第72—78页。

要网络空间载体建设。^① 张爱军提出，网络舆论救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救济过程与目的体现了被救济主体生命安全的人民利益至上性，通过网络舆论救济上的参与，民众产生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获得感。^② 宋菁菁、王金红等认为，数字人大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其主要依托数字化建设、数字基础底座建设、数据应用能力建设等方法。^③

（六）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途径

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途径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涉及民主发展保障、民主发展价值和民主运行方式等维度，包括政党领导、制度规范、法治保障、监督机制、动力认知、话语体系、民主素养、数字技术赋能等方面，呈现系统化的趋势，为营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转的政治生态环境提供有利条件。

1. 政党领导方面。祝灵君探讨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内在联系，指出人民通过党的领导凝聚为有机整体，党的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的价值体系、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最终确保代表、实现、维护好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④

2. 制度规范方面。江必新认为，要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多数原则，关注少数权利的保护，以系统思维和法治思维推进民主协商，遵循公平原则合理施行差异化政策，并通过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将之落实。^⑤ 阙天舒等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手段与目标的增量赋权，发展与治理的双轮驱动以及价值与工具的弹性整合，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的决策纠偏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⑥

3. 法治保障方面。民主发展是有序推进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科学地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纳入法治轨道，有助于规范和保障其发展。林彦认为法治保障涉及两个维度，从方式上看，保障包括对法定民主制度的实施，以及适时将成熟的民主制度通过立法加以确认；从保障的具体领域而言，要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保障、职权保障及程序保障作为未来立法的重点，从而取得更好的民主绩效、更高的民主兑现率。^⑦

4. 监督机制方面。关于该方面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民主监督能够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环节？比如庄德水从监督范围、主体及方式等方面提出，要实现监督“人”与监督“事”的统一、要突出监察监督的主体、要推动监察监督具体化并实现监察监督的法治化，让监督触角在纵向上延伸到基层，在横向上覆盖到所有公共领域，在过程上贯穿于公权力行使的各个环节。^⑧ 王阳亮认为要从监督主体和监督力量上入手，认为党内监督、行政监察以及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监督是权力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民监督权力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行的重要机制，利于形成全覆盖、多元化和常态化的监督格局。^⑨

5. 动力认知方面。胡洪彬从互促性角度阐释，认为党的领导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主

① 郎友兴：《拓展空间载体，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第26—29页。

② 张爱军、雷艳妮：《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网络舆论救济的人民至上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42—48页。

③ 宋菁菁、王金红：《数字人大建设何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创新路径与前景展望》，《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第67—74页。

④ 祝灵君：《推进全过程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第5—8页。

⑤ 江必新：《论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环球法律评论》2023年第2期，第5—17页。

⑥ 阙天舒、方彪：《国家治理场域中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基于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第80—87页。

⑦ 林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保障》，《东方法学》2021年第5期，第21—31页。

⑧ 庄德水：《监察监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构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30—35页。

⑨ 王阳亮：《人民监督权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价值与保障机制》，《探索》2022年第3期，第50—60页。

导驱动力,人民参与构成了其发展的主体驱动力,而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则构成了其发展的协同驱动力。^①齐惠强调群众路线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内生动力,群众路线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理念、民主集中制原则、协商民主形式等三大要素统一并形成结构性关联。^②

6. 数字智能层面。民主实现程度与人类自身的社会结构、物质条件等紧密关联,数字智能技术能优化这种结构并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推动民主更好实现。赵勇从民意数据搜集与转化角度进行阐释,即数字化能更大范围了解和获取民意,将民意数据转变为大数据,再通过构建算法模型,将数据分析情况可视化,进而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更好实现。为此,在实现过程中,既要嵌入原有的数字化渠道和方式,也要拓展和延伸新渠道和方式,形塑新的数字化赋能路径。^③高奇琦、杜欢等认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对社会中复杂的决策因素和变量进行更好的捕捉和判断,从而更大程度地优化整体性的民主架构和决策模式,解决如何在增加过多决策和协商成本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地拓展民众参与的民主程序的问题。^④

7. 话语体系构建。一是影响因素认知。张爱军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受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民本主义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认知都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差异性影响。^⑤二是构建维度,侯金亮认为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话语主体、话语媒介、话语内容、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作用与配合。^⑥赵春丽从四个维度系统地提出,建构话语权应在价值取向上明确“人民民主”话语,在民主程序上围绕“全过程”话语,在民主建设上以“国家治理”话语为依据,在民主评价上以“多样性”为特点。^⑦三是构建途径,李锋提出,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必须处理好民主话语创新与民主话语借鉴的关系,统筹好话语权争夺,把握好议题主题设置权,分层次处理好民主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⑧张爱军等从话语传播入手,认为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传播与构建过程中,自媒体平台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意义诠释的对话场域、政治影响的放大器和扩音器等重要角色。^⑨

8. 民主素养培育。章羽围绕填补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教育的内容提出两个步骤,即首先让人民具有普遍的现代民主意识,再营造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⑩孙莹围绕提高党员民主素养的议题,提出通过健康的党内民主淬炼有助于昭示出民主价值在政治生活的根本导向作用,调动全党践行民主规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党员民主素养。^⑪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研究评价与展望

从近四年的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主题材料看,学界研究的侧重点在发生变化。从理论

① 胡洪彬:《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及其超越性优势》,《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5期,第49—59页。

② 齐惠:《群众路线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内生动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3期,第113—121页。

③ 赵勇:《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分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第23—25页。

④ 高奇琦、杜欢:《智能文明与全过程民主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25—35页。

⑤ 张爱军:《理性与非理性: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差异与差序》,《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第16—25页。

⑥ 侯金亮:《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探索》2022年第6期,第73—84页。

⑦ 赵春丽:《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第35—45页。

⑧ 李锋:《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构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第29—36页。

⑨ 张爱军、吉璇:《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传播与自媒体角色、过程及功能定位》,《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22—32页。

⑩ 章羽:《民主教育: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奠基工程》,《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第34—36页。

⑪ 孙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与治理优势》,《探索》2022年第4期,第49—58页。

层面看，2019—2021年的文献主要讨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结构与发展价值等问题。从实践层面看，主要从人大制度、社会（城市）治理角度来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具体实践。2021年之后，学界相关研究迎来了快速增长，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全面。从理论层面看，主要涉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逻辑、比较优势、哲学意义等。从实践层面看，主要涉及具体实现路径、发展空间等。这些研究回答了很多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问题，但通过对文献分析，笔者认为还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空间。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明确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目前学界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侧重于两者之间关系的阐释，^①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如何发展的、发展经验有哪些、如何进一步优化等方面研究较少。同时，在如何进一步挖掘全过程人民民主系统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做法，更好发挥其制度优势以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并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实践领域拓展的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在实践领域的体现，立足于实践领域展开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分析探究，更符合这一概念本身的属性。目前，学界在人大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参与式预算、立法听证会、基层信访治理、社区协商治理、权力巡视监督等不同领域展开了研究。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一是实践领域研究的覆盖面上还有待提升。比如除了经济民主、立法民主、政治民主外，对于生态民主、文化民主的应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再如除了在人大、政协、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中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外，对于民族区域自治中的应用体现的研究还有待提升；还有在协商民主、基层民主领域研究较多，但专门研究统一战线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较少。二是需要对各种实践形式进行总结、分类与分层。这有助于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不同实践领域中民主内容和形式交织互动与支撑的完整运作过程谱系。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民主素养系统性培育的研究

杜威曾指出：“除非民主的思想与行为的习惯变成了人民素质的一部分，否则，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靠的。”^②因此，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的民主素养培育尤其必要，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素养培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如何嵌入相关教育、补充公民民主知识以提升民主素养等方面。然而，民主素养是指在民主体制下，公民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和民主生活需要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能力的综合体现，由此看来其培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素养培育同样涉及对象、内容与方法多个维度，涉及知识、态度和行为多个方面，培育方式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培育过程既有理论性也有实践性。一是从培育对象看，除了上述文献提到的党员、中学生外，还可以对大学生、职工、居民、村民等不同阶层和群体民主素养培育进行研究。二是从培育内容看，除了转化传统政治文化、补充民主知识外，还包括民主观念（认知、意识、情感）、民主实践、民主作风等方面的培育。三是从培育方法看，有不少学者提到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来提升民主素养，也有一些学者提到理论教育。其中，理论教育主要是面对学生，关于该方面还有不少研究空间。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知识体系是否需要进入中小学课程教材中；大中小不同学段差异应当采用何种不同的叙述和教育方式，设置怎样的侧重目标要点，并探索实现目标要点的路径方法；如何通过理论概念结合案例分析，讲清楚选举投票

① 庞金友、高秀楠：《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探索》2023年第3期，第1—14页。

② [美]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页。

并非是民主的全部内容与价值意义，讲清楚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民主在人自由发展上的作用、民主发展的多样性等。

（四）如何进一步建设与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民主新形态而产生，其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应当转化为相应的话语表达，形成一定的话语体系，并具备显著的话语权。目前，学界的共识是构建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需要立足本土民主实践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兼顾各话语要素相互配合，注意各层级、各领域话语的形成构建。

总的来说，建构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涉及核心与外围两个问题。核心问题：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基础，即话语本身的分量与魅力该如何提升？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理论中全过程性相关论述的研究，以及民主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理论逻辑，应当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深入阐释。据此，提出包含哪些内容的、更优越的民主高质量发展指标，突破西方定夺的民主发展指标，尤其要明晰民主不仅要关注选举投票、言论自由等内容，还要把应用各领域后的实际效果作为判断标准，包括能否产生治理绩效，能否给人民提供进入治理、决策和组织的渠道与机会等。外围问题：如何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配套？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与价值观塑造是否具有共进关系，如何通过价值观塑造促进思想引导和行为示范功能，提升人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认同等方面。再如，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与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之间存在的不同文化解释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与中国精神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为寻找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独特性提供精神与文化支撑。还有，如何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经验打造自己的民主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话语传播力度，扩大话语传播范围，尤其是国际传播的有效性等问题。

（五）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视域下的协商民主深度发展研究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其发展能够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同时，学界可以更多关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如何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对协商民主内涵与外延深化拓展有何影响？比如对协商民主概念深化理解；探寻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如何强化精准协商，增进包容性协商，凸显协商民主的共享机制作用，全面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深度、效度；如何将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构建相应的话语体系提供更好的现实支撑。

（六）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对推进和提升政府信任的研究

政府信任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至关重要却极其脆弱的资产，尤其在当今数字信息时代，政府需要更加谨慎地维护并提升这种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民主制度固然能够提升不同主体之间的信任，但是能否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提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还有待证实。因此，要进一步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政府信任的逻辑与方法。比如需要探究影响政府信任的民主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能否找到；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的反复政治互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参与）能否提供有效公共约束力，倒逼政府更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权；政府信任提升过程中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是否有必要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罗 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互嵌式社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

马国芳，叶浩

(云南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覆盖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的宏大叙事，具体表现为各民族在日常生活、居住格局、交往实践等构成的社会网络。民族互嵌式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是新形势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但我们在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多方面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仍存在共治意识不深、文化互融欠佳等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搬迁互嵌、城市互嵌、边疆互嵌三种民族互嵌社区类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要创新和诠释现代社会治理理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逐步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要求，深化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路径：激发经济互嵌活力，完善社区居民保障；加大文化互嵌交流，提高社区凝聚力；构建多元化社会互嵌格局，发挥共商共治作用的具体举措。

关键词：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微观社会基础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3)03-0045-1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 问题的提出

时代进步给社会各领域带来深刻变化，社会建设亟须以先进的现代治理理念来引领发展，其中在民族领域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迁徙浪潮对社会治理的多重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逐步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要求，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中的最新拓展。这种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新共识。^①只有

基金项目：2023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云南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研究”(YB2023031)。

作者简介：马国芳，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与行政学；叶浩，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① 李伟、李资源：《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与现实启示》，《理论视野》2021年第12期，第17—22页。

将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当前关注的重点,探寻现代化社会基层治理的实践解法,才能助力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现阶段我国基层治理和民族工作提出:“完善网格化治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①这把社区治理与民族团结事业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刚好满足了两者的需要,它作为区域内调和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既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塑造了实践空间,又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打造起巩固机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为1.25亿人,占人口总数的8.89%。^②中国民政部2022年第3季度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共有48.9万个村委会,11.7万个社区(居委会),总计60.6万个社区、村级单位。^③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社区数量来看,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才能取得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团结凝聚的实效。

为此,我国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密集发布一系列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的政策。2023年《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指出,“鼓励在‘自选动作’上创新出彩,有形有感有效地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④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⑤2022年9月,中央统战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的意见》,“提出要把推动东西部双向就业创业作为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关键举措,促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嵌入”。^⑥

民族互嵌式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只有深化内在层面的心理情感与民族文化认同、外延层面的物质经济与空间环境互嵌,激活多元主体共治力量^⑦,才能激发各族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中国广袤的居住地域内,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广泛分布于兼城市与农村、边疆与内陆的多个辖区范围,产生了由城乡异地嵌入形成的搬迁互嵌^⑧、少数民族迁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htm>, 2023年4月26日。

②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2021年5月11日, 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2.html, 2023年8月10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2022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2年11月25日, <https://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22/202203qgsj.html>, 2023年4月26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2023年1月11日, <https://www.neac.gov.cn/seac/xxgk/202301/1160268.shtml>, 2023年4月26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2019年10月23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0/23/content_5444047.htm, 2023年4月27日。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关于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的意见》,2022年9月8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9/08/content_5708809.htm, 2023年4月27日。

⑦ 李伟、李资源:《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与现实启示》,《理论视野》2021年第12期,第17—22页。

⑧ 李乔杨、王政星、王洁:《易地扶贫搬迁中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实践研究——以黔东南州L县为个案》,《民族论坛》2021年第3期,第87—93页。

到城市并定居形成的城市互嵌^①和边疆地区人口流动形成的边疆互嵌^②三种互嵌形式。三者既有多民族共生共存的互嵌共性特征，又有因地地理环境等差异而产生的治理问题。因此，为更好贯彻“逐步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要求，有必要对搬迁互嵌、城市互嵌和边疆互嵌三种民族互嵌式社区形式进行综合研究，在遵循党的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下，力图破解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困境，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层实践解法，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识共享、共建共乐。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界对民族互嵌式社区展开了诸多研究，最新研究动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核心概念的阐述，包括对民族互嵌内涵的把握以及基础理论的构建。杨鹏飞认为，理解民族互嵌社区需从“空间关系”与“精神关系”来把握其本质特征。^③宋晓明将民族互嵌式社区定义为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各民族居民在居住空间、社区文化、心理情感等五个层面的互嵌。^④高永久^⑤、袁年兴^⑥等人提出要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社区的民族性与社会性以及民族的特质性和共生性来把握民族互嵌式社区。针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所呈现的不同形式，徐俊六将边疆的民族互嵌式社区解释为由跨境民族长期交往所形成的多民族混居社区。^⑦马晓玲认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主体是多民族的，包括少数民族嵌入汉族、汉族嵌入少数民族和各民族相互嵌入。^⑧李乔杨等人从黔东南州的个案引出，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社区是由“村民”到“市民”的转变，是一种组织和秩序的重构。^⑨二是从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互嵌对民族融合的效用及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张鹏从社区治理角度指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要从“四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出发。^⑩李瑞华^⑪、黄蔓雯^⑫、梁静^⑬以民族互嵌式社区为聚焦点，分别从互嵌式教育环境建

① 马晓玲：《关于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内涵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5—19页。

② 徐俊六：《边疆民族地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16—24页。

③ 杨鹏飞：《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第17—24页。

④ 宋晓明：《互嵌式社区治理：宁夏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有效选择》，《回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99—103页。

⑤ 高永久、朱军：《试析民族社区的内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5—11页。

⑥ 袁年兴：《试论民族关系的概念及内涵——对民族关系理论框架的共生学考察》，《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4期，第24—30页。

⑦ 徐俊六：《边疆民族地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16—24页。

⑧ 马晓玲：《关于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内涵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5—19页。

⑨ 李乔杨、王政星、王洁：《易地扶贫搬迁中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实践研究——以黔东南州L县为个案》，《民族论坛》2021年第3期，第87—93页。

⑩ 张鹏、张为波：《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17页。

⑪ 李瑞华、陈婷丽、海路：《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互嵌式教育环境建构研究——基于社会融合理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7—13页。

⑫ 黄蔓雯、蒋明：《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公共服务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民族学刊》2021年第12期，第71—80页。

⑬ 梁静、杨伊生：《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下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本土化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205—212页。

构、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跨民族友谊三方面开展对民族融合的研究。魏冰指出,要注重多民族社区内成员的聚居方式、交流障碍和文化壁垒等问题的破解。^①对此,高文勇提出以精准化治理来规范社区组织管理架构。^②三是通过对嵌入方式的实证剖析,总结社区发展经验,探究互嵌式治理的未来走向。艾丽菲热·莫明以新疆塔城哈尔墩社区为个案研究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发展。^③李朝辉以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为个案,阐述了“双向五级”的社区治理模式。^④张鹏等人对比全国各地典型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模式,总结多民族互嵌治理的方法经验。^⑤刘春呈引入“宾弄赛嗨”族际互助关系探讨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走向。^⑥倪佳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对无锡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群众行动检视展开研究。^⑦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探讨,学术界已经形成初步的研究框架体系,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理解为是在同一空间区域内,由不同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生活,产生文化、语言交流和社会接触的共同体,这种多民族共居可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汇集而成,也有可能是本地区多种少数民族的融合,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发展正是促进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的重要形式。

对比已有研究,既有侧重于对民族互嵌式社区理论层面的探讨,又有关注于嵌入方式的实证剖析和治理研究,而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出发,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形成的特点,分门别类对不同的民族互嵌式社区进行研究还存在一定缺失。同时,既有研究较少从各民族人口流动的方向、原因和嵌入存在的问题等展开总体性分析,对不同情境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的关注度还不够。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地域空间内各民族流动所形成的不同民族互嵌式社区类型为基础,试图厘清各民族迁徙互嵌的原因及互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基于搬迁互嵌、城市互嵌、边疆互嵌三种民族互嵌社区类型的问题分析

(一) 搬迁互嵌:经济收入与社会保障有待提高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广泛,比较多的以民族自治地方的形式呈现,大到民族自治区,小到民族自治乡。从人口迁移呈现的大流动、大融合来看,民族地区的互嵌式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原本各民族居住点分散,加上自然灾害或受到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使得不同地区的民族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的形式汇聚到一起,组合形成新型城镇化社区;另一方面是结合亲情关系或择业就业等考虑,自发地从单一民族地区搬迁进入其他多民族地区,与当地原住民共居形成组合型社区。因此,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就在于促进两种组合型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形成“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局面。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强调“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① 魏冰:《互嵌式治理:新疆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有效选择》,《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40—144页。

^② 高文勇、尹奎杰:《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理论内涵·构成要素·保障条件》,《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第64—72页。

^③ 艾丽菲热·莫明、罗意:《空间嵌入视角下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新疆塔城哈尔墩社区的个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1期,第19—26页。

^④ 李朝辉、黎倩雯:《多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安置社区治理研究——以怒江州兰坪县为例》,《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5期,第154—163页。

^⑤ 张鹏、张为波:《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17页。

^⑥ 刘春呈:《从“宾弄赛嗨”到“共同体”: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66—75页。

^⑦ 倪佳瑜、姚静芳:《民族互嵌型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民族学论丛》2022年第2期,第31—36页。

调发展，推动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①。可见，建设好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民族地区互嵌式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

由于自身的民族性、所处地区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和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搬迁群众的专业技能水平不足，在搬迁前多以耕地劳作作为生活来源，在移入城镇社区后，由于耕地缺失且技能单一，有的搬迁群众难以从事其他专业性工作。从少数民族自发地由高山地带搬迁入城镇社区的后期嵌入发展来看，大多数家庭缺少耕地和菜园，搬迁群众只能通过打零工或做小商品买卖谋出路。虽然相比山区的偏远落后，他们更愿意留在生活便利的城镇社区，但是由于不具备专业技能，在进入社区后的谋生方式十分受限。以玉溪市新平县漠沙镇小坝多村为例，当地拉祜族从哀牢山迁出进入县城附近的傣族河谷地区^②，没有了耕地作为基本保障，只能靠打零工谋生。这种远离乡土的城镇化社区生活虽然给他们带来了信息、交通和就医等便利条件，但也造成迁出地的土地闲置化，且在跨区域流动之后容易产生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欠缺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地域广阔，但总体城镇化水平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从民族地区群众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新型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来看，国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意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问题，通过搬迁政策的实施，使得少数民族群众能够脱离贫困，建立起居住环境更加优越的易地扶贫安置社区。加之，近年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不断推进，安置社区的各民族居民在多重政策作用下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是，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逐渐打造成型的时，也面临着就业生计的经济互嵌难题，即搬迁互嵌人口量大，就业需求量多而就业岗位供给量少，且较低的经济收入也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让当地各族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得到了落实，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由于就近就业岗位不足，就业增收成为当地社区发展的新难题。全州 220 个 200 人以上的集中安置点中，虽然已有 15 个农业产业园区、11 个扶贫车间配套项目建成落地^③，但依然不能满足当地的就业需求，加上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当地居民的生活收入来源受限。

少数民族群众搬迁后形成的互嵌式社区多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差、产业体系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比较突出，当地的就业市场难以应对大体量的人口流入，这给县城和少数民族群众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阻碍，参与社区建设的动力不足。因此，经济收入不稳定、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不足的经济难题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中需要持续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城市互嵌：文化认同与沟通互动存在障碍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区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中，不同民族群众越来越多的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向城市等多民族聚居地聚拢，形成多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在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发达的今天，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在随之转变，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2022 年 3 月 1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22/content_5680416.htm?eqid=ef41b92300094438000000036464de69, 2023 年 8 月 15 日。

^② 李永祥、曹津永：《从当代云南“山坝结构”民族分布的新变化看民族互嵌交融——基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三个案例》，《民族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53—62 页。

^③ 四川省人民政府网：《我省列出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增收“任务清单”18 万劳动力，就业增收难点何在？》，2021 年 7 月 29 日，<https://www.sc.gov.cn/10462/12771/2021/7/29/a4e9c1dbb48749eda1cb4d90b9417783.shtml>, 2023 年 5 月 4 日。

少数民族逐渐走出山区,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多民族文化在城市交融并存。但是,少数民族群众从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需要一个漫长的缓冲期。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谈及社会排斥时讲道:“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成对其他群体的疏远和背离。”^① 出于民族文化同源和地缘相亲的特征,少数民族更容易在他乡与本民族群体产生天然的归属感和亲情联系,与当地居民形成相互排斥的现象,出现文化隔阂和心理距离。

各少数民族居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城市,城市已然是多民族、多文化碰撞融合的空间场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阵地。然而,不同身份、背景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相同的社会环境里要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困难的。从文化融合上来看,各民族文化虽然各有其美,但就如何处理同一社区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各民族文化在各放光彩的同时得以兼收并蓄并包容差异,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上海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2021年上海市少数民族人口为39.98万人,比2010年增长12.36万人,增长率为44.8%。^② 可见,发达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是非常高的。但是,由于语言文化不通或风俗习惯的差异,各民族成员在城市社区中交往不畅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社区居民接触交往中,部分少数民族住户个性特征比较明显,习惯穿着本民族服装出行;再加上有些住户本身性格比较急躁,普通话交流又不顺畅,在与当地物业、居民发生冲突时,会让一些社区居民产生一种少数民族同胞性格都比较急躁的偏见。此外,少数民族成员由于习俗文化的需要,会在社区中开展一些本民族的节日庆典,但是城市其他居民对相关文化了解不多,认为这些活动造成了噪音扰民和环境污染。长此以往,类似的情况会不断加深城市社区其他居民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偏见和误解,这非但不利于多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还给社区治理增加了难题。

另外,从心理认同上来看,各民族间的心理嵌入是影响居民铸牢共同体意识的隐性要素。当前,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交往中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心理距离,各民族之间在城市生活中形成抱团效应,与其他居民有距离感,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高。在城市中,社区工作一直以来都是较难开展的,尤其是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居民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中带有一定的心理戒备,他们更愿意同本民族居民交流,这也造成在社区工作者开展入户交流、调研走访等工作时,一些居民的排斥心理明显,不愿意融入社区活动当中。另外,由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差,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汉语交流不畅成为融入城市社区的一大困难。地方文化的差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成为少数民族与城市之间的鸿沟^③。这种“族群边界”极易造成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心理隔阂,难以真正形成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血脉认同的“一体”意识,也就无法真正融入社区生活中。

(三) 边疆互嵌:参与主体与戍边力量亟须强化

民族互嵌式社区主要存在城市和农村,既有内地民族互嵌式社区,又有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我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尤其是云南、广西、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分布众多、疆域广阔,大部分民族互嵌式社区紧邻国境线分布。因此,维护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繁荣稳定,就是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指出,“边境城市等是我国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

^① [印度]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② 上海市统计局网:《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2021年5月19日, <https://tjj.sh.gov.cn/7rp-pecyw/20210519/38de049ac5504904b9e77cb987ecb58a.html>, 2023年5月4日。

^③ 袁波澜:《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调查与研究》,《三峡论坛》2020年第6期,第23—26页。

确保边境和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①。这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当前，我国已经建立广西东兴、云南瑞丽、新疆塔城等九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在长达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上，有众多的边境开放口岸，较好地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边民生活水平改善。自2000年正式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我国从稳边固防、发展社会经济、优化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全力开拓，为边疆民族地区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互嵌”最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民族互嵌以发展边疆为目的，不仅关注少数民族迁徙入城，更重要的是对于边疆地区的多民族互嵌发展。当前，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还是在于政府和社区居（村）民委员会，边民参与的自主性意识不够强烈，社会组织及高校等企事业单位发挥的作用也不够明显。首先，过度依赖政府扶持，会造成单方面力量过强，使得其他治理主体仅作依附甚至是不参与，这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所要求的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背道而驰。云南省沧源县永和社区边合新村是一个佤族、汉族等民族混居的抵边村，由于地区发展受限，在产业发展上引入企业力度还不够，所续存的社会组织也较少，以政府为主的社区治理依赖性太强，给政府增加了额外的行政负担。抵边群众多以边民补贴和自家茶叶、核桃等农作物收入为主，部分居民年收入依然较低，只能选择前往外地打工弥补收入来源的不足，这也就造成抵边力量被抽离。经济发展的不足削减了抵边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其次，社区村委会在引领社区治理中，虽然能够汇集各族儿女形成稳边护国共识，但是由于指导和帮助在现实中更多的是一种直接干预，没有更多考虑居民的感受和外部力量的引入。在实际中，一方面由于居民参与度有限，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不足；另一方面，在与外界力量的合作中，社区自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主体面有限，难以整合到优质的社会资源。当前较为出色的横向合作治理社区仅有发达地区大中型城市，通过与高校等企事业单位交流合作来发现社区治理的薄弱面。对于边疆地区的民族互嵌社区而言，由于少数民族居民受教育水平受限，参与贡献度低；外界企业和社会组织帮扶力度不足，既缺乏产业就业上的帮扶，也缺少社区治理上的参与，更多的是村委会领头的单兵作战；再加上居民考虑家庭收入的需要，顾此失彼，更加削弱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这种单主体的强力治理模式难以持续，社会互嵌还有待完善。

汉代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边议》一书中言：“救边乃无患，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②边疆地区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注重边疆的稳定。“民族互嵌”与“兴边富民”是有内在逻辑的，兴边富民是目标，民族互嵌是手段。通过我国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民族互嵌融合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经济均衡，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避免“城边差异化”、民族割裂化，将稳边固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统一。从具体实践路径而言，民族互嵌的平衡应该既有内地少数民族向边疆的迁入，也有边疆群众向内地流入的互嵌，其出发点是为了能够在技术、经济和文化等资源上得到互补，实现内地与边疆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在实际行进过程中，却发现由于边疆地区人口向内地发达地区转移多于内地人口流向边疆地区，造成了边疆人力资源的过度流失。如在内蒙古沿边口岸，边境数百公里也见不到一家一户的驻边牧民，除边防哨所外，大部分边疆牧民已经迁徙入城^③。边疆地区人口的剥离化虽然助推了内地城市社区民族互嵌的发展，但人口大量流失的边疆也会对边境安全、边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15年12月24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033854.htm，2023年7月20日。

^② 王符：《潜夫论·边议》，马世年译，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3页。

^③ 何生海：《“民族互嵌”与边疆治理》，《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81—88页。

三、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路径探析

(一) 激发经济互嵌活力, 完善社区居民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多民族互动和谐关系是以生产力和经济收入为基础的。尤其是对于搬迁群众而言, 从农村迁入城市或依托政府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进入新的社区环境的少数民族居民既需要调整适应, 又急需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 “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 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①。就此, 政府要具体把握地方产业发展优势, 立足资源特点, 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式协同企业与居民共同发展。

首先, 针对各族群众就业难的实际情况, 地方政府应瞄准群众急就业稳就业的目标, 通过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的方式, 根据就业市场缺口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为社区居民提供就近就业通道。其次, 就当地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的情况, 政府要打通额外就业渠道。一是充分利用招商引资会和对外考察等机会,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和区位优势, 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方式引进优质企业进行合作, 为居民提供工作岗位就地就近就业。二是政企协商, 为当地群众提供外出务工的流出就业方式, 分批将有就业需求且符合企业需要的劳动力输送至工作地, 打通异地安置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统筹好集技能培训、就近就业、自主创业、劳务输出为一体的就业机制, 不落下任何一个互嵌社区居民, 在提升群众生活质量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就业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当地政府还要做好社会服务保障工作。既要解决好弱势群体生活问题, 搭建起社区爱心桥; 又要完善好社区居民保障服务,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标准化。2022年, 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指出放宽落户限制,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挂钩机制等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政策举措^②。立足工作实际, 社区要充分考虑外来嵌入民族住户的子女入学、流动人口登记、医保社保等实际办理需求, 避免少数民族居民在社区互嵌中面临“处处遇难题、处处难解决”的困境。

(二) 加大文化互嵌交流, 提高社区凝聚力

对于多民族社区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与心理距离阻碍, 需要各民族同胞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传承对中华文化的血脉认同, 将认同感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纽带”。

要做到这一点, 不仅要从物理空间上搭建起文化互动的平台, 更要思考如何让各民族居民愿意融入交流平台当中, 在内心深处形成“我要做、我想做”的积极态度。首先, 居民委员会要利用在社区的号召力, 通过居民投票、上门走访、信箱留言等方式听取居民意见, 了解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引导居民相互理解、共同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指出,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多民族居住地区的居民委员会, 应当教育居民互相帮助, 互相尊重, 加强民族团结”^③。因此, 居委会要架起社区各族群众沟通的桥梁, 以开展互动交流, 增加彼此间的信任感, 让各少数民族由摩擦碰撞的个体转变为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021年8月28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28/content_5633940.htm, 2023年8月15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2022年7月28日, https://www.ndrc.gov.cn/fggz/fzllgh/gjjzxgh/202207/t20220728_1332050_ext.html, 2023年7月30日。

^③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2019年1月7日,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9-01/07/content_2070251.htm, 2023年7月20日。

谐睦邻的团体，不断提高社区向心力和凝聚力。其次，社区各族居民要正确看待各民族关系，尊重文化差异，敞开心扉与居委会联合起来举办好民族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春节、傣历泼水节、藏历新年、彝族火把节等大型民族节庆日把社区居民组织起来，让居民体会到自己作为社区一分子的温暖和责任感，更愿意参与文化分享、民俗互动、经典共赏的百家盛宴。通过举办民族文艺汇演，打造出优秀的社区文化品牌，将“邻里共聚百家宴，齐家同筑民族情”的民族团结魅力刻画到社区品牌发展当中。再次，社区线下公共区域和线上网络空间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交流的公共平台，居民既要借助此平台去充分交流，消除心理距离；又要依托政府和社区帮扶少数民族流动群体，为群众生活排忧解难。多民族一家亲的社区环境需要多方共同营造，只有将各民族文化嵌入到社区发展中，融入各族群众心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才能够实现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有效治理。

（三）构建多元化社会互嵌格局，发挥共商共治作用

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发展是一个共同参与治理的过程，既强调外联，又注重内合，同整体性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柯克·艾默森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种跨域治理，其超越了政府各层级、各部门的界限乃至公私部门的界限^①，是多元治理主体为实现共同愿景所形成的跨界合作模式。当前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合作效果不佳的现状，是中国大部分民族互嵌式社区普遍存在的情况。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核心在于“互嵌”，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力量互补且平衡，才能保证互嵌的效度与质量^②。因此，要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开展整体性治理。

首先，针对治理主体力量悬殊，共治作用不深的问题。一方面要树立起良好的参与合作理念，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发展不是政府和“两委”埋头干，居民坐享其成的事情，而是包括居民、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共同嵌入，在遵循党的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立体化逻辑下，实现政社、企社和社社的联动治理。另一方面，在社区经济、文化、空间等互嵌逐渐得到政府兜底的情况下，居民要拥有更多自主参与的意识。对于少数民族居民比例较大的社区，要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决策的制度机制，给予少数民族居民更多的话语权，以发现微观层面社区治理的不足，从而在与外界合作中，能够清晰阐述社区的实际问题，让社会工作专家能够更全面地抓住治理的痛难点，提供对点帮扶。其次，针对人口外流剥离社区，尤其是边疆多民族社区人口空心化的情况，要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就地宜居。学者彭庆军认为：“如果在新疆等地区的游牧民全部都选择进城定居，边疆安全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可能的。”^③要留住边疆社区居民，就要依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社会力量完善好居民所在地的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支撑条件，让当地居民幼有所养、老有所依。另外，可以参考国内社区出现的“二八定律”^④，即汉族和少数民族保持2:8或者8:2的居住比例，则该社区就较为稳定，很少出现民族纠纷。邻里关系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社区人口迁离的现象。

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特殊，可能遭受民族分裂势力、国际边界摩擦、宗教渗透等因素

^① Emerson, K. Nabatchi, T. Balogh, 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22, No. 19 (January 2012), pp. 1—29.

^② 张鹏、张为波：《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17页。

^③ 彭庆军：《以公共服务促国家认同：后游牧时代少数民族牧民国家认同构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5—166页。

^④ 杨鹏飞：《边疆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新疆乌鲁木齐、和田和喀什等地的调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34—39页。

的影响，这更加凸显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稳边固边的重要性。多民族聚居的边民社区要把守边稳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通过党委、政府统筹领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商共治的治理原则，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兴边固防贯穿起来，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实现民族互嵌的大融合和大团结。

四、结论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旨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加强党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协同治理，切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当前全国各地民族互嵌式社区已经逐渐形成的基础上，针对后期少数民族居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心理等全方位嵌入如何调整优化，搭建起各民族同胞共同富裕、大团结大联合的桥梁是新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研究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嵌入社区后形成的三种互嵌式社区类型所存在的问题，认为社区发展需要按地域属性规划发展经济，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各民族居民互信认同，开展富有特色的交流活动；树立整体性治理意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路线出发，坚持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至上，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通过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打造一种情感共融和利益共联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模式，激发各族人民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各族同胞互嵌融合，最终形成集亲和力、团结力和包容力于一体的合力系统，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杨松禄

交往交流交融：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文化动力

——云南鹤庆县新华村银匠个案

谷家荣，孙雨彤

(云南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历史上看，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充分彰显出中国各民族交融发展的社会生命态，多元文化互嵌互生使各民族“相互离不开”，最终形成“一体”的共同体格局。云南鹤庆新华村以银器技艺文化为内生资源动力，有效促进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长久的技艺生命过程中，白族银匠在“藏彝走廊”空间与多种民族紧密互动，充分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创制出引领行业时代的银器技艺文明，为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以“文化”为动力的成功案例，实证调查研究新华村银器匠人群体交往交流交融行为及其技艺文明，可助益新时代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交往交流交融；乡村现代化；文化动力；鹤庆县新华村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3)03-0055-08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中国各民族更好地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实体具有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意识，是一体又多元的民族实体，^①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内核，^②需要各民族更加友好地携手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③这是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要求，更加凸显交往交流交融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以何种态度看待他族文化差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新时代，各民族应该以交往交流交融淡化族际差异，强化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纽带，为中国式现代化打好民族基石。^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及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21&ZD212)。

作者简介：谷家荣，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学、历史人类学；孙雨彤，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3—21页。

② 马成明、崔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健康发展的“五位一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学刊》2022年第11期，第9—17页。

③ 新华社：《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民族》2014年第10期，第4—6页。

④ 郝亚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淡化族际差异抑或强化族际纽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56—65页。

当然,中华各民族的交融之势并非一蹴而就。任何时候,技艺文明的识探,我们都需要将文化与文化主体放在情境社会中考虑,找寻文化之根。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将集体记忆归属于大众群体,认为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实现的,它是社会性的记忆,因而不易被遗忘。因此,集体记忆可以通过“社会事件”不断得到加强。^①经验层面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存在形式、内容和本质的递进关系,由交往到深层次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多元一体格局”。^②我们应充分关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过程,聚焦各民族的日常生活,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在”智慧。^③调查发现,云南鹤庆县新华村银器技艺的发展得益于“藏彝走廊”以及白族聚居区域独特的民族文化,银器匠人在“走他乡”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他族文化,从而创造出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底色,其他各民族文化为重要参考元素的优秀技艺文明。因此,以新华村白族银匠技艺的社会生命为切入点,结合匠人群体的艰苦创业实践及其器物文明,可以识探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核心文化动力。

一、白族银匠技艺的文化之“根”

金沙江中下游南岸的鹤庆县历来是滇西茶马古道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当地人素以银器制作而闻名,而新华村白族银匠的银器技艺更是名扬四方。久远的过去,鹤庆新华村众多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形成了人多地少的局面,村民不得不“出门”谋生路。白族银匠走出生地,在外吃苦耐劳,接触不同文化并与之交往交流交融,了解到其他手艺人的高超技艺,并自觉习学技艺。比如涉藏地区独特文化,藏族精湛的手艺享有较高声誉,白族银匠在接触到这些文化后能保留着白族文化的本体性,吸收借鉴并创作出受当地人喜欢的器物。匠人寸秀刚初到云南香格里拉涉藏地区,以为自己的手艺和涉藏地区匠人差不多,但在做手艺时才发现差距。他说:“藏银匠做活细致,各种勾边描花看得我眼花缭乱,从西藏学手艺回来的人,手艺炉火纯青。”^④寸树伟说:“那些细的花丝他们一天只做几公分,工艺认真,他们今天做出来的东西可以跟唐宋元明这些时代的工艺媲美。”^⑤藏族做事很有原则,东西必须做好,而且要做到极致。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做自己都不能复制的作品,慢工出细活。匠人段六一说:“藏族做的东西都很精致,每一件都做得很好,只是可能时间长,短时间内等不到。”^⑥匠人李金柱说:“藏族老人画画功底特别好。我们的优势是做得快,技术上我们是超过不了他们的,现在也超越不过。”^⑦新华村匠人能在涉藏地区立足,就是因为藏族匠人与白族匠人工艺的不同,藏族匠人凭兴趣做工,白族匠人则是为了谋生活。匠人寸树伟与西藏昌都地区的一家藏族人相处融洽。这家人到云南做手艺,在新华村寸树伟家老房子里住了六年时间,寸树伟不仅没收房租,而且由于藏族匠人严谨但做工慢,寸树伟还会在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忙做些活计。白族银匠不断提升技艺并向藏族匠人学习。匠人李金柱认为,“跟藏族讨学到东西,自己做出来的产品比之前的工艺技术有更大提高,这时候心情是最舒畅的。”^⑧

白族银匠是一个极具内部凝聚力的团体。出门在外,白族银匠之间互帮互助,一起克服困难。老匠人张建先说:“鹤庆人在涉藏地区相互照应,虽然相互之间有竞争,但我们老乡之间很团结,

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

② 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6—69页。

③ 孙九霞:《旅游流动影响下的民族交融与认同凝聚: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75—86页。

④ 访谈对象:寸秀刚;访谈时间:2021年7月28日。

⑤ 访谈对象:寸树伟;访谈时间:2021年7月29日。

⑥ 访谈对象:段六一;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⑦ 访谈对象:李金柱;访谈时间:2021年7月24日。

⑧ 访谈对象:李金柱;访谈时间:2021年7月24日。

顾人情。出门在外，靠着老乡才能走得远。”^①过去路途遥远，交通不发达，只能靠双腿走路，随身还带着工具、厨具、被子，仿若一个流动的小家。天气热的时候，背在身上的食用猪油都融化了，于是大家轮流端着一口缸猪油，小心翼翼地赶路。猪油一旦泼洒，大家都得饿肚子。在外做活工，遇到没见过的工艺，互相交流，不断尝试。匠人寸镜云在外做活时会写信给家人，遇到一起出门又不会写字的老乡，他就帮着写。匠人寸发标说：“新华村这么多手艺人背井离乡，男人都是手艺人。我们必须走这条路，不赚钱，也要为后人、为明天做些服务。”^②新华村匠人不仅互帮互助，还很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把家乡发展的责任扛在自己肩头”。通常，在外努力打拼多年，磨练技艺之后，他们都喜欢回来建设家乡，尽量让后人少走自己走过的辛苦路。

二、自在：白族银匠技艺与生存伦理

技艺创新。民族文化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原有轨迹发展，如果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丝毫改变，其中不适应现代化的因素便会阻碍其发展，甚至令其走向灭亡。这意味着白族银匠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需要顺应时代要求发生改变，在原有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这些变化首先体现在产品上，与其说银器上的花纹、工艺对于白族银匠来说是一种不同的记忆文化符号，倒不如说银匠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活态传承的文化符号。新华村现有1144户5117人，98.5%都是白族，其银器产品本身就融合着民族独特文化。匠人对自身文化引以为豪。老匠人董中豪发明出银器工具“豪剪”“豪钳”，这两种工具不仅是董中豪老人的记忆，更凝聚着银匠的文化与记忆。于匠人而言，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更要拥有自己的创意。因此，匠人们在外积极学习，打磨技艺，促使自己获得独特想法与风格。董中豪老人说：“银饰种类奇多，我们的技艺都是在走村串寨时磨炼、提升起来的。”^③匠人寸彦同虽然受过学校正规的教育，但是在他身上也能看到银匠对于提高自己技艺的积极性，他说：“我的创作灵感是不断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的。很多设计上的理念都来自学习经历，我从学校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为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④匠人洪卫说：“手艺人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创意，你可以模仿我的产品样式，但模仿不了我脑子里的想法。模仿的人总归是走不长远的。”^⑤匠人杨利筠说：“我想法比较多，学手艺时什么东西都想尝试做一下，做坏我不怕，喜欢做些有点古怪的东西。”^⑥通过创新，新想法不断在银匠心中萌生，锻造出属于新时代的技艺与文化。想法来源于实践经验的积累，匠人们通过不断历练，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匠人段六一说：“出门见识些我就自己琢磨创作了，学手艺跟读书一样，完全是靠你个人的经验慢慢琢磨出来的。有些人悟性好，会比较有特色。智慧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慢慢磨出来、学出来的。”^⑦匠人根据经历琢磨出的风格，既需要自己不断试验，也需要接受市场检验。匠人李金柱说：“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把风格区分出来设计，关键看个人设计的产品受不受欢迎，是否被社会认可。只有每隔几天攻破一个工艺，心情才会好，等于是一种享受。”^⑧匠人学到手艺后，一生都在不断修炼精进，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积累，而支撑着他们不断探索的正是早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对银器技艺的感恩与热爱，直到形成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再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使技艺生命绵延不绝。

① 访谈对象：张建先；访谈时间：2021年7月28日。

② 访谈对象：寸发标；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③ 访谈对象：董中豪；访谈时间：2021年8月3日。

④ 访谈对象：寸彦同；访谈时间：2021年8月2日。

⑤ 访谈对象：洪卫；访谈时间：2021年8月3日。

⑥ 访谈对象：杨利筠；访谈时间：2021年8月10日。

⑦ 访谈对象：段六一；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⑧ 访谈对象：李金柱；访谈时间：2021年7月29日。

文化是创造出来的，文化即在场。文化通过传承不断重构着人类社会，在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看来，历史就是记忆，社会通过文化不断被记忆，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历史传承性。^① 传承发生在不同水平的文化主体间，是经验的传递，更是不同时代记忆的传递。通过代代交流，各时代文化主体共享着一套文化体系，文化之根得到保护，文化得以生生不息。文化富有动态且具生命力，民族文化作为一定地域内人们生产生活的产物，在社会发展中传承。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传承使文化作为内在动因维系着民族共同体。在过去，银匠收徒弟也有讲究。手艺大多是家传或经认识的人介绍习得。匠人董福山说自己的手艺主要还是家传，他的父亲董中豪老人说：“收徒弟大多数情况都是收亲戚或者朋友的小孩。”^② 段六一也说：“我的手艺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③ 学手艺也需要漫长打磨，过去学手艺投师三年，谢师一年，师傅传授技艺，剩下的都要靠自己琢磨。现在的教学模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学手艺。还有创办工作坊、与高校合作等模式，并且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使技艺的传承得到助力，新华村匠人的精湛技艺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银匠那时学手艺只有一个念头，即“赚钱养家”。当地人的普遍说法是“穷死不家里”，“出外面才有闯劲”，这些就是生动诠释。在旧社会，“出门”也被称为“走夷方”。当地有一首民谣专门描写“走夷方”白族银匠的艰苦生活：“挑起担子走四方，拼着老命走夷方，只要找着两文钱，回家买田置地来盖房。白族银匠泪汪汪，挑起风箱走夷方，这样日子怎么过，餐风露宿好凄凉。”一般情况下，新华村白族银匠逢三、六、九的日子才出门。出门之前，他们要拜祭太上老君，即备猪头、公鸡、鸭蛋，跪拜磕头，烧金银纸钱，祷告“出门平安，挣到大钱”。白族银匠能取得如今的成就也离不开自身的坚持，过去交通不便，他们仅凭借着双腿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过去条件艰苦，他们就睡在牛羊圈里，一边走一边做手艺。出门一般有两条路线：往南去往西双版纳，甚至缅甸，往北去往涉藏地区。匠人洪卫说：“青海、西藏的每个县乃至每个镇都有鹤庆匠人。”^④ 但无论去到哪里，匠人都能靠自己的本事生存。董中豪老人说：“匠人进山随山、进寨随俗，生活这样，技艺也如此。”^⑤ 匠人们出门不断积累生活经验，不断提高技艺，做出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产品。为了生存，小锤在新华村一代代的银匠手中传递。当地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干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这更能体现出技艺对于生存的重要性。

三、自觉：白族银匠技艺生成的地理枢纽

银匠本是一个自在群体，艰难的生活条件激发出他们的上进意识，使其普遍形成“出门找活路”这一生活习惯。从“在地”“出门”到“即使出门再艰辛也要坚持，不赚到钱不回家”的念头，不仅体现银匠生活的变化，也能看出他们心态的转变，即由“自在”的在地生活向“自觉”出门讨生活的变化，更体现出白族银匠想要努力改变生活的决心。从技艺的生成空间来看，新华村白族银匠的技艺文明集中源于“藏彝走廊”地区的多民族文明。这一概念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民族学界由单一民族研究开始转向研究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其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基石。“藏彝走廊”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⑥ 其涵盖范围之广，不仅是我国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区域，也是中华民族之间交往交

① [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页。

② 访谈对象：董中豪；访谈时间：2021年8月3日。

③ 访谈对象：段六一；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④ 访谈对象：洪卫；访谈时间：2021年8月3日。

⑤ 访谈对象：董中豪；访谈时间：2021年8月3日。

⑥ 石硕：《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我国的民族研究》，《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22页。

流交融的缩影，为认识各民族形成、接触、融合、变化提供了独特价值。^①白族银匠往南走到缅甸，往北走到涉藏地区，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藏彝走廊”。白族银匠在与涉藏地区人民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实现文化自信，又在多元文化的不断助力下，最终形成与时俱进的技艺文化。

“走他乡”与技艺文明。新华村银匠“走他乡”往北所到的四川和西藏涉藏地区，文化有差异，生活需要也有所不同。涉藏地区需要大量铜水瓢，新华村白族匠人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点，于是利用地区优势将铜水瓢加工运往涉藏地区，由此打开涉藏地区市场。随着对涉藏地区了解的不断深入，涉藏地区逐渐成为新华村银铜器销售的最大市场。一开始，新华村匠人主要是在涉藏地区自产自销，后来生产销售方式不断演变，匠人在涉藏地区形成了自己的销售网络。藏族地区市场的开拓，不仅促进了藏族与白族文化的交往与融合，更体现出银匠的善良勤劳与精湛的手艺。刚去到一个地方，匠人会根据当地人的态度判断留在这能否赚到钱。匠人寸光伟说：“当地民族很淳朴，我们跟他们一家人似的，没活干要搬到下个村，他们还有些舍不得，有些小孩还哭着，舍不得我们走。”^②匠人李金辉说：“藏族一开始对我们也会担心，这么五六个男人，老婆没来，又是外地人，力气又大，人家怕。处熟了，吃的不用愁，到家了最简单也要烧壶开水，弄点糌粑吃。”^③匠人张建先认为：“藏族人友好善良。不论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你求助，他们都会热情去帮。”^④白族匠人在藏族人的盛情款待下不仅积累了技艺与生存资本，也收获了与藏族人的友谊。

“出门”不易。向南走去往缅甸方向，老匠人寸镜云说：“保山腾冲这一边的汉族人很善良，玉溪、普洱、西双版纳这些地方也挺好的。昭通有的地方艰苦，一开始和当地人不好相处，时间久了还是好相处的。”^⑤匠人李六八说：“找不到地方睡，那些人家很善良的，拿出铺盖，好客友好。”^⑥银匠在外做工提高了自身技艺，同时进行文化交流，文化也在不断从自在到自觉转化。当然，过去出门需要证明，没有大队证明，哪里都走不了。匠人李双富到缅甸做手艺，在麻嘎区需要证明，派出所警官将钱收走，只能饿肚子。后来遇见贵人，拿到证明。证明原用来回家，但李双富和同行商量干脆不回去，在接近缅甸的小海江做一年，从小海江从思茅的西山后面绕出来，绕到思茅又转回来。匠人冒着回不了家的风险在外做手艺，凭借“赚钱养家”的信念，在外想尽办法打拼，只为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长途跋涉的手艺人非常辛苦，背着十几斤的工具，有时十天半月找不到一户人家，沿途未知的风险大，常有野兽出没。有些比较封闭的少数民族村寨，见到生人就闭门，只有跟他们解释是做银的，才出来接待。在人群中要找村长之类有影响力的人物帮忙解释。匠人寸发标说：“我们只占一间房子用来做火炉房，睡觉自己挤挤，免费帮他们修补东西。”“住别人家我们很勤快，帮助人家打扫卫生，挑水洗菜，劈柴烧火。”^⑦

四、自为：白族银匠的技艺生命

出门在外的银匠能够接触到不同文化，鉴赏性地吸收他族文化要义，从而制作出符合当地民族审美价值的技艺产品。白族银匠原有的技艺是在家里学手艺时习得的，他们共享着在鹤庆土地上生发出来的文化体系，后在出门过程中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文化体系随之丰富充实。银匠勤劳吃苦的心性使他们在涉藏地区从被接纳到受欢迎。他们走一路学一路，书写着属于小银匠的

① 石硕：《多民族相处之道：藏彝走廊民族交往的经验与智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57—64页。

② 访谈对象：寸光伟；访谈时间：2021年8月5日。

③ 访谈对象：李金辉；访谈时间：2021年8月7日。

④ 访谈对象：张建先；访谈时间：2021年7月28日。

⑤ 访谈对象：寸镜云；访谈时间：2021年8月5日。

⑥ 访谈对象：李六八；访谈时间：2021年8月8日。

⑦ 访谈对象：寸发标；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心性记忆。匠人寸秀刚说：“必须了解其文化让别人接受你的设计。”^① 出门途中，银匠对各个地方的生活习俗都会主动了解。匠人寸光伟说：“按照当地风俗做，不固定你是彝族就必须做你彝族的的东西，做成傣族款式也行。”^② 当地人民对于融合不同文化元素的作品也很喜欢。匠人洪卫说：“壶不是藏式，但它有藏族符号，那么壶就可以被藏族使用。在壶口沿上做苗族花式，壶可以被苗族人使用。”^③ 匠人段六一15岁在家学成手艺后就去涉藏地区谋生了，涉藏地区海拔高，条件艰苦，但段六一一行人为了生存坚持了下来。涉藏地区的宗教文化与新华村有较大差异，他们一贯喜欢金银珠宝，所用之物也有属于自己的款式，段六一在涉藏地区待了20年，对于涉藏地区也慢慢了解。他说：“我们刚跟这帮匠人打交道，还有一个过程。刚开始进藏时，这些藏族的文化跟我们的有些不同，我们就慢慢磨合。”^④ 他认为既然涉藏地区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那就要去学习。藏族对价格不敏感，只要能做出想要的东西，他们会认同产品的价格，做出的东西被藏族认可后具有价值，同时也会拥有一定的地位。新华村银匠在涉藏地区不仅生产藏族需要的生活用品，也和藏族学手艺，有的人甚至在涉藏地区组建起家庭，与当地入深度融合在一起。

白族银匠与新华村在象征意义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银匠出门，脱离了新华村这一地理空间范围，也会凭借其文化之根在象征意义上的神圣地位不断重建记忆来坚守这一共同体。白族银匠通过出门得以接触不同的文化，他们在外一刻不敢放松，为了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时刻琢磨、对比自己与当地的手艺，并不断学习、吸收，从而精进自己的技艺，同时也为各地区人民带去了自己的作品。这种族际间的互惠的关系使得交流更加紧密。交往交流是交融的前提，交融是心灵的认同，不是要求同化、千篇一律，而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白族银匠拥有独特的技艺生命，他们在外接触不同文化，学习语言，打造当地需要的产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通过学习，将他文化与我文化不断融会贯通，二者相辅相成，形成自己的技艺文化特色。匠人洪卫说：“以前的作品，壶体纹路少，现在复杂，添加的元素有白族、苗族、藏族、纳西族等。我觉得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村的匠人走南闯北，接触到很少数民族。”^⑤ 银匠以自己的作品叙述着走南闯北的经历，不断将他族文化融入自己的作品。匠人张建先说：“出门做手艺的这帮人，从前的白族银匠到处走，到后面聚集下来，定点做小手艺，各种文化都接触过，各种文化都吸收上来，这群人的人格精神不同，很有特点。”^⑥ 匠人寸发标说：“新华村手艺人是集各个民族记忆之精华的手艺人，学到百家之长，形成特有的记忆。”^⑦ 早期出门，寸发标在西藏做手艺，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给他一种神秘又新奇的感受，他将这些感受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结合当地的唐卡绘画，再加上自己的想法，此后寸发标创作出来的唐卡受到了当地藏族的喜爱。

通过交流交融，匠人精神也在每个银匠心中发芽。何谓“匠人精神”？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认为，匠人精神是从思想层面由内至外而萌发产生的，匠人作为主体，精神是其衍生物，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厄尔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其内在本质，不仅表现在生活行为的各方面，同时被民族成员不断内化，而其中的外显部分即是文化。^⑧ 白族银匠作为其原生文化的承载主体，在出门的过程中接

① 访谈对象：寸秀刚；访谈时间：2021年7月28日。

② 访谈对象：寸光伟；访谈时间：2021年8月5日。

③ 访谈对象：洪卫；访谈时间：2021年8月3日。

④ 访谈对象：段六一；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⑤ 访谈对象：洪卫；访谈时间：2021年8月3日。

⑥ 访谈对象：张建先；访谈时间：2021年7月28日。

⑦ 访谈对象：寸发标；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⑧ [英]厄尔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触到与自身文化相异的他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银匠不断进行着决策与取舍，寻找与自身文化最适宜融合的他文化。很多匠人说，新华村过去有自己创作的作品的人占少数，很多是仿制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过去穷，被生活所迫，一部分人明明会创作，但不愿意耽搁时间；其二，人与人之间的理念不同，有的人没有想法，设计不出来。匠人段六一说：“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同，设计理念都不同，这是匠人普遍的一个心态，是一种匠人精神。”“别人创作的这些壶体，你不能套用。你没办法没精力时你可以套用，但套完学会经验后，你要创造出你自己的东西，不能无限套用，套得再好，也不是你自己的。”^①匠人寸发标说：“工匠精神，很简单，几十年如一日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伟大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爱的情怀促使我完成这样的设计。”^②年轻匠人兼商人李小白非常重视产品的品牌意识，他严格把关产品质量，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其公司名下的十个部门，安排了三十多个质检员，严格把关产品的每一道工序，只要出现一道不合格，银器产品就不上市。这算是新一代的匠人精神，但李小白本人说：“其实真正驱动新华的并不是什么匠人精神，而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向往。”^③匠人精神本身就是银器匠人各自的技艺风格、技艺思想应有之义，其内涵丰富。匠人精神的产生也反映出白族匠人以及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从过去的求生存到现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匠人精神代表着更高层面的追求，它是当代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文化体现。

五、白族银匠技艺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白族银匠的技艺文化是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先以“华夏文明”为核心，而后各民族文化向这一核心聚拢，通过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石榴籽”模式，紧紧团结在一起。^④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地理、气候等因素使新华村白族银匠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茶马古道、“走夷方”等方式使得他们交往交流交融“他文化”。不同文化各有其特点，但都属于中华民族文化体系，正是多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各民族文化就是不同色彩的宝石，才使中华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在“走夷方”过程中，白族银匠边走边学习，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不断吸收学习当地的文化，制作出颇具美观性与实用性的银器产品，深受当地群众喜欢。白族银匠凭借各自的经历与理解，形成独具特色的技艺风格，在现代化道路上不仅促进文化传承，也促进了技艺文明的现代化交融发展。

白族银匠技艺的“变”与“不变”。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记忆也是生命本身，但是是另一种性质的生命。”^⑤白族银匠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他们将技艺与生命融为一体，在生产创造过程中不断书写和延伸记忆，即使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属于银匠的集体记忆仍在小锤敲打声中不断被“唤醒”。近年，白族银器在工艺制作、销售、生活方式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一切可被观察到的变化，正是文化变迁的表现，变迁过程中保留不变的是深植在白族银匠心中的“根”文化，是属于白族银匠世代传承下来的集体记忆。白族银匠的技艺文化生命内涵始终处于不断丰富阶段，但不管技艺形态如何变化，“中华文明”的技艺元素始终不变。随着科技发展，白族银匠制作银器的方式也有不同选择，但有些传统工艺流程是无法用机器去代替的。匠人寸彦同说：“传统工艺不能丢，机器制造只能代替部分，不能完全代替，一些重要的工艺依然要靠人工来制作。如果手工传统工艺不传承下来，非遗

① 访谈对象：段六一；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② 访谈对象：寸发标；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③ 访谈对象：李小白；访谈时间：2021年8月7日。

④ 谷家荣：《中华民族“石榴籽”模式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33—41页。

⑤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

文化就没灵魂。”“很多重要的工序机器是永远代替不了的，同时手工的融入代表匠人在作品上的匠心。”^① 机器比手工速度快，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机器只能照着模板制作一样的东西，缺少了人的匠心，是永远也不能替代人的。新华村很好地利用了这点，按照不同的制作步骤使得机器能够帮助手工制作节省时间与成本，通过平衡机器与手工，形成机器与手工共存的现象。对于新华银匠来说，手工象征着一种初心，象征着当年风餐露宿仍不归家在外讨生活的决心，代表着白族银匠的精神传承，只要小锤还能敲下去，世代相传的手艺便不会断，白族银匠也永远存在。

时代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原先单一的工艺制作方式，也改变了银器匠人的“想法”。一个方面，发达的网络使银匠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不同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创作灵感。网购、直播带货的兴起更是改变了传统销售方式，年轻人回乡创办淘宝网店，越来越多的匠人创办自主品牌。近年，白族银匠在外创业的人基本都回了新华村，曾经的小作坊落地家乡，做成了公司企业，曾经的行脚商人早已变成了企业家。这种变化不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也通过带动发展造福了更多家乡人。匠人寸发标说：“新华村这么多手艺人背井离乡，男人都是手艺人。我们这里是典型的白族村寨，这座山只长石头不长树木，地下水那么丰富，人有好本事，地方有好特色，要回来发展，不过啊，离开党和政府，我们寸步难行。”^② 匠人寸彦同说：“我不仅是一个品牌的创立者，我还是一名手艺人。”^③ 新一代的匠人明星人物李小白，在新华村尚没有人关注品牌创新的时候，他便瞄准了这个发展契机。理顺公司业务之后，他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产品。截至目前，银器品牌“李小白”已极具社会知名度。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新华村学手艺、做生意，有利于白族银匠的技艺生命绵亘发展。

当然，新华村银器技艺发展离不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政策支持，国家政策好，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起来。匠人寸彦同说：“国家层面给我们很多帮助，要推广我们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在清华美院学习完后又把我们带到日本考察学习，拜访东京艺术大学，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富士美术馆，还带我们到日本的民间艺人家中交流学习。”^④ 当地政府结合新华村白族文化特色大力发展文旅产业，筹资建文旅生态村，举办系列民族文化节。技艺文明的高质量发展使新华村“银都水乡”的美誉更加深入人心，以董中豪、寸发标等为代表，新华村向世人展示了高超的银匠技艺。总之，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以前的银匠讲生存，现在的银匠讲品牌和匠人精神，关注新华村乡村振兴发展，充分利用当地白族匠人的技艺资源优势，以更好的方式传承技艺。

六、结语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借助现代先进科技创新推进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鹤庆新华村白族银匠，基于本民族文化，在“走他乡”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融合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识探并走出一条依托传统银器技艺文明创新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成功路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多层次的多元一体共同体，传统文化丰富，白族银匠始终不忘中华民族文化这一共同的精神文化内核，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充分吸收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自在、自觉和自为发展，其技艺文化像一根无形的“线”，沿着白族银匠走过的路，编织出白族银器的技艺生命蓝图。总之，把技艺文明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资本要素以推进地域社会现代化，新华村白族银匠技艺给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化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新时代，只有有效结合区域社会资源优势，吸收好，利用好，发展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创新推进地方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访谈对象：寸彦同；访谈时间：2021年8月2日。

② 访谈对象：寸发标；访谈时间：2021年8月1日。

③ 访谈对象：寸彦同；访谈时间：2021年8月2日。

④ 访谈对象：寸彦同；访谈时间：2021年8月2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

薛昊

(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干部培训基地,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脉。”地处边疆民族大省的云南，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对于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做好这一点，就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深挖史料，展现历史上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揭示各族人民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始终保持团结交融的深层次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本文以云南省为例，在理论探索的同时，结合史实，对如何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民族团结交融史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3)03-0063-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①中华民族不断交融凝聚的进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相生相伴。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干部教育中，注重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讲好各族人民团结交融的历史，既是增进广大干部对于民族情况认知的重要环节，也是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这对于在边疆各族干部群众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而推动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促进边疆繁荣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民族历史发展的视角，探讨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现有研究注重从理论的高度，阐述民族历史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方向性问题，并为民族工作、思政教学、民族历史研究等领域提供全面系统且严谨的认知视角。学者们系统探讨了认识我国民族发展所应有的历史观问题，为正确审视、研究和阐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启示^②。本文即尝试在前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具体结合云南边

作者简介：薛昊，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西南联大干部培训基地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政策。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② 参见李国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需要大历史观》，《中国民族报》2022年1月11日，第5版；吴孝刚：《把握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三个维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10期，第63—66页；王文光、胡明、马宜果：《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7—23页。

疆的民族历史情况,详细探讨在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过程中所涉及的历史基调的导向性把握、古今历史维度与内容篇幅的平衡、研究视域与涉及领域,以及相关历史素材的使用等多个关键性问题,为在包括云南在内的各边疆民族地区的干部教育、思政教学中,讲好民族历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树立作初步探索。

一、把握团结统一、交融汇聚的历史基调

讲好民族历史,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牢牢把握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团结统一、交融汇聚的历史基调。这客观反映了中华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深层次规律,同时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性意义,也是讲好民族历史发展时所应牢牢把握和揭示的一条思想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相关重要论断便是对这一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概括,亦是指引我们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的根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团结融合、多元凝聚为一体,源自于各族人民在多维度上的深度交融和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①。团结统一、交融汇聚的基调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学术界的大量研究也充分印证了这一规律。作为当代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开创者,费孝通先生在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中即对我国民族历史作了精要概括,他梳理了我国古今民族的发展流变,指出历史上以汉族作为凝聚核心,各族人民相互交融汇聚的深层次历史规律^②。从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所显示出的强大内聚性,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中华民族交融汇聚过程的显著形塑效应。对此,亦有学者描述了中国国家历史与民族历史之间相生相伴的关系,并称其为“多元一统”。^③

因此,开展民族历史研究、讲好民族历史故事离不开对上述历史基调和主线的把握。笔者以为,在阐述民族历史发展过程时,要以上述思想主线审视和思考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通过对史料文献的挖掘,在历史叙事中全面、突出展现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经济文化生活上交融一体的史实。

二、平衡好古今历史维度

讲述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从纵向上看,就要把握好对各民族古今历史的阐述以及篇幅内容的平衡分配问题。从前述系列研究来看,团结统一、交融汇聚是我国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基调,并贯穿于古今各个历史时期。因此,在讲述民族团结交融史话的过程中,要秉持全时段的理念,将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史实都纳入到研究和探讨当中。这既是对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断融合汇聚的悠久历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且坚实的历史依据。

在秉持全历史时段观点的同时,还应注重详略得当,对不同历史时段内容的阐述应做到有所侧重。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对古代民族历史的阐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历史发展,特别是对其中各族人民团结交融的史实探讨相对较少。笔者以为,这部分内容恰恰是在当前民族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19页。

③ 王文光:《“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第23—30页。

团结进步教育、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时应当格外关注的部分。就整个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最为深刻的变化。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行，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理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确立，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融合进一步增强，这一变化也奠定了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是理解我国当代民族关系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依据。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愈加密切的时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凝聚发展的重要阶段。

具体从云南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早在19世纪中叶之前，各族人民便在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开拓了边疆、书写了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秦汉至清代前中期，中央王朝在云南地区的持续经略活动，内地汉族人民的不断南迁及其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以及各族人民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不断交融汇聚便是历史依据。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团结御侮便成为这一时期各族人民不断凝聚的重要推动力量，亦是这一时期各族团结凝聚的集中写照。20世纪前期，在滇西、滇西南边地爆发的片马抗英事件、班洪抗英事件，以及抗战时期沿边各族同胞团结一心、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便是最好的例证^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民族工作的开展、民族政策的落实，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愈发密切，各族人民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互之间互帮互助，共同保卫和建设边疆。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族工作中，人民政府组织工作队深入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以办实事、交朋友为宗旨，通过为山区少数民族群众发放粮食、无偿给予生产工具、提供巡回医疗服务等方式，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关系，也由此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团结、互助^②。随着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交往交融更加密切，除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同胞之间的团结合作愈发密切之外，各少数民族群众间也相互合作、交往密切，共同开展生产建设。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聚居于坝区的傣族群众便热心邀请山区的哈尼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一同在平坝地区开展生产活动，甚至向山区各族人民赠送各类生活物资^③。

上述史实，无疑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各族人民团结交融的写照，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因此，在研究和讲述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应当平衡好古今历史维度之间的关系，充分展现不同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团结交融的史实。

三、秉持多领域的视角

历史上各族人民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集中表现为政治上的团结统一，经济文化以及精神思想层面的交融一体，并由此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④因此，在审视和研究民族历史，讲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交融汇聚史话的过程中，一定要秉持多领域的全面化视角，综合梳理和阐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各族人民团结交融、休戚与共的史实。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笔者将具体结合云南边疆的民族历史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展开尝试性的探索。

① 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下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② 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下册）》，第428页。

③ 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下册）》，第430页。

④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就政治领域这一维度来看,各族人民保持团结统一,共同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但从不同历史时期来看,其内涵与表现特征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在古代王朝时代,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表现为边疆各族人民对大一统中央王朝政权的归附与认同;表现为边疆各少数民族同来自内地的汉族人民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抵御外敌入侵。而在近现代时期,上述问题在内涵方面又有新的变化。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中国恰好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变革阶段,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则集中表现为共同奋起反抗外来殖民侵略,以及国家意识的逐渐觉醒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逐步明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又有了与时俱进的新内涵,集中表现为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新生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表现为各族人民在政治上踊跃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以及共同保卫和建设边疆等一系列实际行动上。从历史上云南边疆的情况来看,上述事迹不胜枚举。在古代,随着历代中央王朝边疆经略活动的持续深入,云南边疆各民族或处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或以羁縻州县、土司制度等间接统治形式渐次纳入到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之中。这一历史发展趋势贯穿于历代王朝的经略史之中,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期,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和凝聚趋势愈发凸显。元代在云南设立行省,并以土官制度统辖境内诸族,这一制度架构所具有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使得大量少数民族群体在政治上归附于中央王朝,诸如当时的大理总管段兴智,以及滇边各族土官普遍接受了元王朝的册封与管辖^①。而此后明清王朝在云南边疆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等治理举措则使得上述政治上的统一趋势显著增强,明代景东傣族陶氏家族、丽江纳西族木氏家族等多次协助中央王朝平定叛乱的事迹便是写照^②。与此同时,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央王朝的领导下,共同抗击外来入侵,共同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迹亦是这一时期各族在政治上团结统一的表现。例如明清时期,滇西南沿边的傣族等各族民众,便在明清中央王朝的支持下,参与抗击缅甸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的进犯,捍卫了西南边疆的安定^③。共同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历史际遇也使得各族在政治上愈发凝聚,甚至在部分民族的历史记忆里,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也愈发清晰起来。例如明清时期,滇西南和滇南沿边的傣族便在上述历史互动中加深了对大一统国家的认知,从流传的《泐史》等傣族史籍的历史叙事来看,以中央王朝为集中象征的大一统国家认同也愈发凸显。《泐史》为傣文所纂车里地区的编年史,因当地民众呼其地为“勐泐”,其民亦称“傣泐”,故而以“泐史”名之。因其为抄本,故在传抄过程中曾有孟良、勐遮等多个版本,其中又以民国时期李拂一先生考订和编译的版本较具权威性。总体来看,《泐史》基于车里傣族的视角,以车里宣慰世系为主线,记述了上自宋元之交、下迄清代这段时期内今西双版纳、普洱等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正史之外研究当地傣族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看到,被称为“天朝”的大一统国家认同在当地傣族群体中渐次清晰和牢固^④。上述史实便是各族在古代,政治上团结统一的写照。步入近代之后,在边疆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背景下,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保卫边疆。清末之际边疆多事,滇边的今滇西德宏、怒江等地多次爆发各族群众抵御外国侵略的斗争。例如在干崖傣族土司刀安仁的率领下,当地傣族、汉族、景颇族等各族群众便曾多次击退英军的进攻。而在今怒江等地,因英军不断在中缅北段边界侵扰,当地的景颇族、傈僳族、汉族等民众亦曾多次在当地土守备、土千总等官佐的带领下奋起反击^⑤。进入民国时期以后,边疆危机仍此起彼伏,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亦不绝。例如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班洪抗英事件便是其中的典

① 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中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5、134—143页。

② 参见江应樑:《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272—275页;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中册)》,第163—164页。

③ 江应樑:《傣族史》,第377—390页。

④ 李拂一:《泐史·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台北:复仁书屋,1983年。

⑤ 李晓斌、龙晓燕:《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182页。

型，班洪王率领佤族群众英勇抵抗英国的武装开矿行动，并得到了国内各族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支持，云南当地的傣族、汉族、佤族、拉祜族、彝族、布朗族等群众甚至组织了2000余人的义军前往班洪，共同抗击英军，并成功收复了被侵占的佤族各村寨^①。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各族人民亦共同投身抗日斗争，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史诗。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应对日军对我国海上国际交通线的封锁，争取国际援助，云南各族人民在缺乏施工机械的条件下，不畏困难，依靠肩挑人扛，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开辟了保障抗战物资运输的滇缅公路，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筑路过程中，滇西沿线的傣族等各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群众一道，不辞辛苦，争分夺秒抢修道路。诸如刀京版、龚绶、方克光、多英培等傣族官佐也带头参与筑路，甚至自己垫支相关筑路费用，展现了各族人民在国家危亡之际不畏艰险、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以讲求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党深切牵挂云南边疆各族人民，于云南解放之初的1950年至1951年间派遣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全省各少数民族分布区，看望慰问各族人民。访问团的足迹遍布三迤大地，他们在访问过程中向少数民族群众赠送粮食、食盐、布匹等大量生活物资，并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族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了解和认识。在进军云南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亦认真做好民族团结工作，通过“做好事、交朋友”的形式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真诚信赖和拥护。在深入民族地区的同时，党和政府还组织边疆各族人民代表赴内地参观交流，并通过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等举措从政治、经济层面实现了各族的平等，巩固了民族团结。随着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各族人民愈发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识，并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衷心拥护，团结一致共同保卫边疆^③。例如曾参加过民族参观团并到北京观礼的云南澜沧佤族群众拉勳即表示，“毛主席很好，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④再如20世纪50年代初，西盟地区曾受到国民党败军李弥部的骚扰，而当地美国传教士永文生也曾煽动教民袭击西盟人民政府，解放军115团在深入该地区的过程中积极做好当地佤族群众的工作，以真诚赢得了佤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当地佤族群众即说：“一根藤上两个瓜，‘解放’阿佤是一家。”^⑤各族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衷心拥护成为这一时期各族在政治上团结统一的鲜明写照，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展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推动云南边疆发展的同时，亦使我国的民族关系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时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愈发团结统一，在共同的团结奋斗中不断树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了民族关系史上的新局面。

除去政治上的团结统一之外，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亦是讲述民族团结交融史话时需要把握的又一个重要维度。各族人民在文化生活上的兼收并蓄、经济生活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是我国民族历史发展根本趋势^⑥，而这在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亦有鲜明写照。历史上各族人民在经济领域共同开展生产活动，相互交往并开展贸易，共同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也在这一共同团结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进一步的交融汇聚。

① 李晓斌、龙晓燕：《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第265、266页。

② 李晓斌、龙晓燕：《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第267页。

③ 李晓斌、龙晓燕：《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第297、298页。

④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

⑤ 赵伟：《挺进阿佤山 边陲换新天》，《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91页。

⑥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就历史上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开展生产活动的长时段情况来看,具有如下特征,或者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阐述:一是随着内地人民大量迁居边疆,各族人民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愈发密切,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使之呈现出与内地渐次趋同的倾向。二是因云南地区山区和平坝交错分布的地理环境,历史上云南地区的山区和坝区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生产上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立体化民族经济关系,该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变迁与内地人民不断向边疆迁徙的移民活动有着密切关联。从深层次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内地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促进民族交融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就明清时期的情况来看,内地移民群体人数众多,且足迹遍布省内各地的山区和坝区之间^①,成为联结和接触各族的重要纽带。有学者便指出,明代大规模的汉族军事移民改变了云南原有的族群分布格局,在涌现出众多汉族移民区外亦促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分布,基本奠定了明清以后直到今天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交融的基础^②。

就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相互交往和开展贸易的情况来看,亦存在一些特征。一是就时间维度而言,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往交流开展贸易活动的历史十分久远,仅据文献来看,至少在秦汉时期,云南当地甚至已成为联结中原内地和东南亚、南亚等地的重要桥梁^③,而上述历史趋势也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成为当今云南边疆发展的独特区位优势。二是就族际关系来看,历史上云南各族人民均广泛参与了繁荣的商贸活动,部分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贸易活动诸如茶马贸易,其整个贸易链条中都有各族人民的身影。正因为如此,贸易活动也由此作为共性场域将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增进了各族人民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凝聚和发展。就历史上云南境内的茶马贸易来看,其贸易路线沟通连接云南南部直至今滇西北的丽江、迪庆等地,在茶叶等贸易物资的交互流动过程中,不仅是汉、藏人民,甚至遍布这一贸易链条上的各族人民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实现了经济上的紧密交流和联系。例如以地处茶叶重要产地的今云南南部西双版纳、普洱等地来看,在茶叶的收种、贩运过程中,居住在山区的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以及地处平坝的地区的傣族、汉族人民之间便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④。而在贸易链条的北端,即今滇西北的丽江等地,纳西族、白族、傈僳族各族人民亦参与其中,而茶马贸易亦成为汉、藏等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⑤。

从文化领域这一维度来看,历史上云南各族人民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中,各自在社会文化生活上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欣赏,形成了深度交融的格局。特别是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表现出多领域的深层次交融,尤其是在思想和文学方面,明清时期众多云南少数民族人士儒学素养深厚,在文学创作时显露出了相应的思想文化特征,甚至涌现出很多诗书世家。例如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云南大理地区的山川灵淑之气孕育出浪穹何氏家族、剑川赵氏家族、太和杨氏家族、赵州龚氏家族、太和赵氏家族、赵州师氏家族、赵州赵氏家族、剑川张氏家族、鹤庆李氏家族等九个对云南地方文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力的白族文学家族”^⑥。而就诗作内容和造诣来看,其创作水平也较高,折射出深厚的儒学思想和价值观。例如多洛肯在研究后指出,“清末民国白族诗人师源

① 陆韧:《明代云南的铺哨驿堡与汉族移民》,《思想战线》1999年第6期,第85—89页。

② 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第75—83页。

③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4—23页。

④ 肖坤冰:《从“高地”到“低地”——从“佐米亚”概念看清代云南边境的普洱茶贸易与族群互动》,《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第57—66页。

⑤ 参见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49—57页;杨慧、凌文峰:《滇藏线中转站茶马贸易在丽江的形成》,《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第57—61页;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34—40页。

⑥ 多洛肯:《明清白族文学家族诗歌创作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84—192页。

的诗学明显有对儒家诗学‘诗言志’传统的持守和清代中原‘诗以言性情’理念的接纳，有鲜明的复古倾向，表现在对陶渊明诗的追寻、唐诗的推崇和对宋诗的模拟。师源的创作受清代性灵派的影响，在新体白话诗风涌潮起之际，为古体诗的复兴作出了贡献。”^①除去白族人士之外，纳西族、彝族等诸多少数民族人士亦在元明清时期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文化上的交融一体，也涌现出不少文学世家，其文学作品颇有中土儒士之风。例如在明清时期的纳西族人士中，便有“丽江土司木氏、大研桑氏、大研牛氏、大研杨氏、石鼓周氏、黄山杨氏、束河和氏七个文学家族”^②。特别是木氏家族，其文学造诣颇高，其诗作中所述山川风物、心性修为均体现了鲜明的儒学价值观^③。而同时期的彝族人士中也有众多谙熟文墨者，据学者考，就云南一地来看便有宁州禄氏、蒙化左氏、姚安高氏、武定那氏、芒部陇氏等多个文学家族。在政治制度的推动、科举的兴起、彝汉人民交错杂居和频繁交往交流的宏观社会历史土壤环境中，彝族文学创作也迎来了高潮，在呈现出汉化共性的同时，亦各具特色，丰富了民族文学宝库^④。上述文化上的深度交融亦在同时期的全国各边疆民族地区呈现出普遍现象，多洛肯在深入研究后认为，“明代在重视兴办学校和‘教化为先’理念的影响下，各民族文化交融日益深入，少数民族诗文创作进入了繁荣期，各民族文学的交融进一步深化。……蒙古族、回族、白族、纳西族、彝族、土家族、苗族、侗族、壮族等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各自所在地域的文化特色，更共同建构起多元并包的中华文化版图，为我们科学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借鉴。”^⑤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共同奋斗，形成了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格局，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深层次历史规律，而这一规律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边疆便有着鲜明体现。历史上，云南边疆各族人民逐渐凝聚的进程，共同保卫和建设边疆的鲜活故事，以及各族人民在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领域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画卷，便是生动的历史写照，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形成发展历程，以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深刻史实。

对上述民族团结交融史话的阐述，有助于在边疆各族人民中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相关史料文献，以云南为例，对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展开了初步探索。笔者认为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需在把握好团结交融这一民族历史发展基调下，平衡好古今历史维度，全时段展现相关的史实，同时秉持多领域的视角，全方位呈现历史上各族人民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格局。在上述理念指引下，本文对历史上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团结统一、交融一体历史发展脉络和史实作了梳理和阐述，为在边疆民族大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些许探索。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多洛肯、张俊娅：《近代白族诗人师源的诗学实践与宗尚取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55—164页。

② 多洛肯：《论明清纳西族家族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第169—177页。

③ 多洛肯：《论明清纳西族家族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第169—177页。

④ 多洛肯、朱明霞：《明清彝族文学家族论》，《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5—27页。

⑤ 多洛肯：《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叙论——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历史缩影》，《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第143—155页。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现实困囿与纾解路径

王俊玮, 蒙 莉

(广西艺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2)

摘 要: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地区能否健康有序发展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近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但不可忽视的是仍面临多重“离心力”, 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严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够深入等。对此, 需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造以地缘为优势的民族经济发展格局; 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彰显以效能为导向的民族事务治理水平; 着力增强文化自信, 构筑以情感为纽带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三个维度出发, 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现实困囿; 纾解路径; 广西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3) 03-007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①广西位于中国华南地区, 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 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等 12 个世居民族。2021 年,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期间, 赋予广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崇高荣誉; 2022 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 称赞广西“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 八桂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②, 并提出新征程上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的殷殷重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作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工作安排, 并纳入建设壮美广西“1+1+4+3+N”目标任务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不断审视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现实困囿, 理性寻求攻坚克难的纾解路径, 对于广西在新征程上“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2022GXTZ031)。

作者简介: 王俊玮, 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蒙莉, 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②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18 日, 第 1 版。

一、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价值审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工作形势的深刻洞察和对民族工作的深邃思考，昭示了民心凝聚才是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结合广西实际，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践履“为了人民”与“不负人民”的重要保障；凝聚“情感共识”与“思想共识”的不竭动力；实现“壮美广西”与“复兴中国”的必然要求。

（一）践履“为了人民”与“不负人民”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①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蕴含着深厚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马克思主义理论寻诸人获得彻底解放的归因，科学诠释了“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② 在此马克思深刻阐明了“现实的人”在共同体中归属与自由两种价值张力的问题，鲜明指出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因此人只有渗透到生产与交往交织的社会结构中，认同并依靠其产生的共同体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换言之，“共同体”是每位成员尽情施展自身长处、充分释放内在潜能，社会达至高度文明形态的源泉动力，是全体人民追求理想生存样态和美好图景的前提所在，其实质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创造条件，彰显了人民至上的立场与底色。

（二）凝聚“情感共识”与“思想共识”的不竭动力

个体与共同体深度互嵌成为民族秩序得以维系的基本要求。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离心”浪潮致使民族团结航路波涛汹涌。广西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守门员”，一直处在反对民族分裂斗争的最前沿，“五个并存”阶段性特征带来的多维挑战和多元机遇贯穿广西现阶段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极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民族向心力的“黏合剂”和“助推器”，能够最大限度地汇聚民心、凝聚民力、积聚民智，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政治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双重属性，本质是通过对社会成员指向性“再教育”深化各族人民对“五个认同”“四个与共”“三个离不开”等理念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使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交流更加广泛、交融更加深入。立足广西实际，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既是八桂儿女情感寻根与正义肯认的生动折射，同时也能筑起有效抵御民族领域风险挑战的思想高地与精神基底，使广西各族儿女在“肯定和赞扬什么”“反对和否定什么”“继承和发扬什么”等关键性问题上，始终保持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将“个人梦”“民族梦”“国家梦”的逻辑指向能动地熔铸于魂、铭刻于心、付之于行。

（三）实现“壮美广西”与“复兴中国”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③ 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是整体与部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集合体中不可或缺的子集，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表现在

^①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99—300页。

经济、文化、情感等各个方面,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这个大家庭中,广西各族人民始终与党中央同鼓点、共脉搏,深刻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与中国大地的生动缩影。2018年12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题写“建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贺匾,将建设壮美广西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入考量。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既是实现“壮美广西”与“复兴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根本遵循,不仅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之计,同时也被赋予了远超治理场域本体的战略意义。唯有坚定不移守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生命线、发展线、幸福线,方能谱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生动画卷。

二、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现实困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一个团结进步、欣欣向荣的壮美广西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但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面对种种挑战,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严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够深入三个方面。

(一)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严峻,影响党的领导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处于深水期,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叠加,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多变、多样的态势,处理不当则会诱发社会成员模糊对共同价值的认同。广西沿海沿江沿边,地缘环境相对复杂、文化思潮汇聚活跃,一些国外敌对势力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以民族地区作为突破口,利用现代网络媒体、民族宗教问题等方式曲解民族政策,激化民族矛盾,宣扬“普世价值”,鼓动民族分裂,直接冲击着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妄图从根本上动摇广西人民的思想文化根基,进而削弱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二)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凸显,影响政府公信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深化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落实了一系列利民措施,给人民群众生活切实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但广西属边疆地区,受到自然环境禀赋差、市场经济起步晚、基础设施建设弱等因素的影响,对标全国总体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广西如若不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闯出新路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势必会导致人民群众出现心理上潜在的落差感,直接影响全区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奋斗信心。

(三)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够深入,影响民族凝聚力

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这一历史特殊性造就各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字百川汇流,形成了一个绚烂多彩的文化属地。目前,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一些地方还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仍有小部分人过于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刻意放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特殊性,其本质上都是孤立、片面、静止的错误思潮,隔绝了自身进步和民族发展的“阳光空气”。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碎片化,削弱了民族向心力。

三、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纾解路径

广西做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就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主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作出的“三大定位”“五个扎实”“四个新”“五个更大”等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使民族工作取得更大进步。

(一) 发展纾解: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以地缘为优势的民族经济发展格局

“清障”两极分化、弥合发展鸿沟是推进民族地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强力

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广西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发展航向，不断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是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映射在经济维度的重要方略。一是深度融入和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广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支点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建设门户，要深刻立足区内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持续深挖向海而兴与向海图强的开放潜力，做深做实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不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快构建“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一体推进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一并推进制度规则的“软联通”，不断探索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二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经济”与“生态”是并行不悖的一体化存在，寻绎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结合，是广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广西要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正确导向，将“双碳”目标要求全面融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用心呵护山水生态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切实打造以绿色空间为底色、山水田园为景观、历史人文为特质的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逐步铺就一条以“山清水秀生态美”为特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绿色发展模式。三是扎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相较于脱贫攻坚有增不减，广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保障政策的延续性和精准性，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不断强化动态监测，优化帮扶方式，深化帮扶领域。同时立足地区资源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使广大人民群众持续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力量，实现“富裕口袋”与“铸牢脑袋”同频共振。

（二）治理纾解：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彰显以效能为导向的民族事务治理水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隅，其既是化解社会矛盾、建构良好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亟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要扎实建设强有力的领导班子。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直接关系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政策安排是否能在民族地区得到扎实有效的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进步需要什么样的干部给予了清晰画像，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①。新形势下，要持续以推进清廉广西建设为抓手，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锻造一支堪当时代重任的干部队伍，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作为新时代好干部的评判标准，充分发挥各级党员干部在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二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上确保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平等政治权利，为各族人民提供了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立足新时代，要把国家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利益统一起来，充分认识到民族自治这个“帽子”担负的重大使命，坚持以法治观念引领、以法治思维谋划、以法治方式落实，不断夯实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法治基础。三要打造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持续打造各民族共居、

^①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共事、共学、共乐的包容性公共空间和普适性价值体系，因地制宜建设多民族共居社区，形成以“民汉搭配”的生活模式，促使各民族文化共生逻辑结构得到良好互动和充分调适，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搭建起深度互嵌的时空载体。

(三) 思想纾解：着力增强文化自信，构筑以情感为纽带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① 回眸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一种极具包容力的融合态势吸纳着不同民族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血脉，构成了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认同体系。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注重弥合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逻辑分野，重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秩序建构，全面推进壮美广西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一是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广西是革命老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要统筹利用好这些鲜活素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使广西各族人民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审视“一”和“多”的契合关系，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身发展的基点上。二是深入实施“文艺润桂”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会议上指出，文艺工作职责在于勇担成风化人的时代使命。新时代广西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深化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深入根植八桂沃土，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赋予立意，创作更多反映广西时代发展、民族风情、团结进步的精品力作。切实增强“壮族三月三”“刘三姐”等特色品牌影响力，大力弘扬黄大年、黄文秀等先进模范精神。不断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新风貌，形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良好风尚。三是全面普及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语言环境复杂，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丰富，素有“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之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在符号和工具载体，因此必须坚持正确的语言文字观。特别要注重提高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语言文字教育质量水平，充分发挥学校基础阵地作用，积极落实好教材应用普及、学习平台建设、专家理论培训、知识能力考核等举措，切实通过把好“语言文字关”守好“意识形态观”。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7页。

清朝石屏罗凤彩文学家族考说

陈友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石屏罗氏是云南历史上一个显赫的文学世家, 以罗凤彩、罗元琦、罗庆恩、罗颢恩为代表, 奕世克昌, “振扬文字, 于南中称最”。罗凤彩清操皎如, 诗古文超迈卓朗。罗元琦“语温柔敦厚, 粹然有德之言”。罗庆恩被钱南园称为“伟丈夫”, 诗风稳成。罗颢恩“名满人间世, 心空物外缘”。他们的诗各具风采, 而忠诚、孝悌、恭谨为其思想底色, 多温润可爱。罗氏文学家族之形成, 得益于石屏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文献名邦的文化积淀、科举制度的推动和追求精神高洁、诗书传家的家风。

关键词: 文学家族; 罗氏家族; 科宦—文学世家; 南中称最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3) 03-0075-12

家族文学研究自20世纪末兴起, 为观察文学现象提供了新视角, 故迅速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 经久不衰。我于1998年发表《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8年第4期)一文, 后来觉得还有可进一步抉发之意, 于是增补后刊发《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民族文学研究》, 2004年第3期), 它们是较早把家族文学研究引向边疆民族地区的论文, 是以引用率颇高。其后, 边疆及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研究渐次展开。云南家族文学研究, 大理大学周锦国教授致力最多, 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白族家族式作家群研究”, 并撰成百余万言之同名专著, 2018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印行, 我曾为序推重之。虽不无错失, 但对白族文学家族挖掘和讨论甚为全面。华世铤先生的《云南文化世家》(载张新民主编《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也是值得注意的成果, 他首次系统地梳理了沐英、杨一清、木公、担当、罗凤彩、李因培等15个云南文化世家, 大致呈现了各个家族的文化面貌。

明清时期, 随着教育文化之推行、科举制度在边疆之完善和滇文学之发展, 云南涌现出许多文学世家,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滇诗之盛。有些家族已引起关注, 但还有许多家族未进入研究视域。本人近年选编《美丽云南诗词》(云南教育出版社即出), 遍阅滇诗文献, 发现一些新的文学家族, 拟抽暇逐一考论, 以呈现滇诗成就, 拓展家族文学研究空间。

本文考说石屏罗凤彩家族。罗氏家族自罗万藻开其端, 罗凤彩大振家声, 罗凤彩子罗元琦, 孙罗庆恩、罗颢恩皆有盛名。清嘉庆临安知府江濬源《石屏罗孝廉南畝墓志铭》(方树梅纂辑, 李春龙等点校《滇南碑传集》卷二十六,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以下凡引用《滇南碑传集》, 皆据此版本)说: “国朝雍正间, 大父讳凤彩, 始由名诸生连捷癸卯乡会试, 累官至宗人府

作者简介: 陈友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中华文化学院)教授, 一级巡视员, 云南民族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丞。父讳元琦，以乾隆戊午科举人，知陇西县。南畊为陇西父第三子，领戊子乡荐，与兄五台令庆恩、黔阳令湛恩，暨弟江川教谕荫恩、征君岁贡生覲恩，振扬文字，于南中（云南）称最。”方树梅《李因培传》（《滇南碑传集》）说：“滇南门才，以保山张氏，蒙自尹氏，罗平窦氏，石屏罗氏、朱氏为著。”《新纂云南通志》（李春龙等点校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列传七《张汉、朱淳传》说：“罗凤彩奕世克昌，为屏望族。”足见罗氏家族之显赫。可惜当代著述，罕有提及。所喜者，华世銑先生注意及此，撰《石屏罗氏文学世家》，首次对罗氏家族作了介绍，功不可没，但他所据文献有限，介绍简略，还不乏错失。^①

本文在穷尽性搜索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呈现罗氏家族诸诗人生平和创作情况，举例说明代表性人物的诗歌特色和成就，并阐释其文学家家族形成之原因。

一、罗凤彩：清操皎如，诗古文超迈卓朗

罗凤彩字苞仪，号竹园，别号桐冈。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岁丧父，家徒四壁，母郑太夫人守节抚孤。凤彩发奋苦读，雍正元年（1723）乡试中举。鄂尔泰《罗母郑太君墓志铭》（《滇南碑传集》卷二十八）说，彼时他任主考，“得罗生卷，即击节叹赏，知其必能为国家戡大任”。同年雍正为庆祝登基开恩科，连捷进士。历官广东道监察御史、山东学政、户科和刑科掌印给事中、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宗人府府丞，晋封通议大夫。罗凤彩是干济之才，体恤百姓，办事尽心得当，以清、慎、勤、公，受知雍正，乾隆两朝，为清朝滇人在朝廷职位较高的官员之一，“为世名臣”。“久任台垣，历试中外，朝誉蔚蔼”（窦光鼐《宗人府府丞苞仪罗公墓志铭》）。

罗凤彩性格谨重，持身极严，“清操皎如”。为官20余年，严义利之辨，不义之财分毫不取。生活简朴，孤身宦京师，不蓄姬妾，与原配许淑人皓首齐眉，待人宽厚谦和。归林30余年，日以孝谨朴诚训子孙。“人世纷华及一切荣名虚誉，视等浮云。修髯伟貌，望若神仙。”（陈惠华《罗宗丞传》）大学士鄂尔泰对其赞赏有加。他去世后，礼部尚书陈惠华撰《罗宗丞传》，著名学者、吏部侍郎窦光鼐撰《宗人府府丞苞仪罗公墓志铭》，大理寺少卿周於礼撰《宗丞罗公墓表》（均见《滇南碑传集》卷十四），异口同声称赞其人品学行。钱澧（南园）也说：“吾乡夙望，惟竹园太年伯及吾观崖（苏霖渤）师耳。”（云南丛书本《钱南园遗集》卷六《手札》第三十四函）。

罗凤彩才学俱佳，但不愿以文学自显，故写作不多。周於礼《宗丞罗公墓表》说：“公早年力学，髦而不倦，诗古文超迈卓朗，然雅不欲以文藻传，盖划华就实，所性然也。”偶为诗，皆有为而作，不同凡响。凤彩现存诗，《滇南诗略》（云南丛书本）卷三〇收《二忠祠怀古》《登城有感》《石固驿用壁间韵》3首，管学宣修《乾隆石屏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1969年）卷七录《宿水月寺》《秀山寺》2首，吕缙先纂修、罗元琦编辑《续石屏州志》（版本同《乾隆石屏州志》）卷二收《避暑秀山，傅京兆嘉言偕杨若采、陈镜庵、张平侯诸公过访》2首。文现存《石屏州志序》（《滇南文略》卷二五）。

罗凤彩诗之“超迈卓朗”，表现为识见透，格调爽，境界高。《二忠祠怀古》可为代表。二忠

^① 如说罗凤彩“撰《兰陔集》一书”（《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道光《云南通志·艺文考》《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六》均著录罗凤彩有《兰陔集》，但考现存罗凤彩传记资料，没有著《兰陔集》的记载。罗元琦有《兰陔诗文集》，诸书显然把二者弄混了。又说罗覲恩“著有《卧游癯禅游》《燕游》《卧游草癯禅集》，晚年刊定为《琴山诗钞》（第34页）”，文献来源是光绪《云南通志·文苑传二》，但句读错误，不堪卒读。古人行文，往往省略，此处所列诸集名，皆承后省，完整的名称应为《卧游草》《癯禅集》（据《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七》）《游燕集》等，故应点为《卧游》《癯禅》《游燕》之类。又所谓《卧游草癯禅集》就是《卧游癯禅游》，颠三倒四，莫名其妙。

祠在异龙湖畔、乾阳山下。《乾隆石屏州志》卷四载：“二忠祠，北郊。元时，杨、李二都司戍石屏，战歿，志佚其名，历著灵异，州人立祠祀之。”罗凤彩前去拜谒，写了这首诗，有序：“按志，祠祀元阳（疑为‘杨’之误）、李二都尉，已逸其名，殆有功德于石屏者。”诗曰：

古祠傍蒿里，独谒青磷中。战迹不可稽，成仁心则同。
名亡像犹在，肃拜精诚通。灵旗降白日，古木号阴风。
盼响趋妇孺，昭明入颛蒙。想当授命时，浩气弥秋穹。
但尽分中事，安知身后功？留名比文豹，毋乃非纯忠？
烈士甘泯没，天壤如何穷？因嗟史笔直，那及民心公？

从英烈无名生发，指出纯粹的忠烈之士，只想如何尽职尽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根本不考虑身后功名。如果做事就是想弄出响动，显扬自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那就是妇孺之见，让自己进入愚蒙，“非纯忠”。而民心自有公论，真正的仁人志士，人们会永远纪念。史家的直笔不如民心公道。罗凤彩的见解非常透彻，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袁文揆曰：“二忠之逸其名，亦年远无可考耳，宗丞公直以忠臣不计名推勘，议论透辟，笔力精悍，真不朽之作也！覲恩述公遗囑，力辞里人暨守土者举乡贤，读此诗如见其心。”江濬源曰：“宗丞公一生笃行，此诗尤见卓识，非徒事丹铅朱墨者比。”（均见《滇南诗略》卷三〇）

《石固驿用壁间韵》是他离开京师回乡，经过石固驿时作的，为透露其心迹之作：

炊熟黄粱梦已阑，风波到处足平安。
弩骀弱质追随易，高厚深恩图报难。
扑面杨花三月暮，嘶风班马五更寒。
征轺计日家园近，楚水黔山一带看。

一是宦海风波使他已有所警觉，对当官意兴阑珊，于是以还乡求平安。二是觉得对君王有所歉疚。“高厚”句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大恩难报之意涵，又有具体所指，就是雍正、乾隆待他不薄，但他觉得自己是一匹劣马，没有能力回报。文华殿大学士朱轼《罗太夫人郑氏传》（《滇南碑传集》卷二十八）载，雍正己酉（1729），罗凤彩提学山东时，母亲告诫他，他释褐十来年就当学政，“圣恩厚矣，可不思所以报称乎？”要求他体恤士子，秉公选才。陈惠华《罗宗丞传》：“圣主早知公可大用，遂由太常少卿陟通政司副使，超晋宗人府府丞。旦晚且将枋用，而公以郑太恭人宅兆未安，请假迁葬归，引疾不起，年甫逾强盛。”他以忠孝立身，又得到雍正、乾隆的青睐，因此，对壮年引退，他感到不安。这体现了他的忠厚。

罗凤彩得到雍正、乾隆器重，但在40多岁就激流勇退，令人们感到不解和惋惜。《新纂云南通志》列传七《罗凤彩传》说：“罗凤彩以清慎勤公受知两朝，旦晚且大用，遽引疾不起，时年甫逾强壮耳，论者多惜其怀才早退，用之不尽。不知当时人主以苛察示英明，以喜怒为赏罚，边省人孤立无援，动辄得咎，是故以李因培受知之深，一得罪则赐死不恤；虽尹壮图、钱澧之忠直亦不免获罪。凤彩盖知之矣。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凤彩有焉。”“当时人主”即乾隆，他有雄才大略，又有翻云覆雨的权术，伴之如虎。这段话指出边省人立朝之不易，也深得罗凤彩退隐之用心，很好解释了石固驿诗中报恩与避险的矛盾。

罗凤彩“慕万石君之为人”，题其室曰“景石”（周於礼《宗丞罗公墓表》），其家有万石家风，德厚流光。石奋系西汉大臣，以忠诚、孝悌、恭谨传家，《史记》卷一〇三《万石张叔列传》说他“恭谨无与伦”，“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罗凤彩以万石家风寄望于子孙，子孙们尊奉唯谨，秉忠贞以立志，敦孝悌以事亲，故“忠诚、孝悌、恭谨”为罗氏家族为人准则，也是其家族文学的基调。

二、罗元琦：语语温柔敦厚，粹然有德之言

罗元琦，字用璞，号昆圃，凤彩子。肄业五华书院。乾隆戊午（1738）举人，先任罗次县（今属禄丰市）教谕，以卓异升宁夏中卫候补知县、甘肃陇西知县。凤彩告诫他：“竞才斗捷，非所尚也。必如何武，居官无赫赫之名，而去后常令人思，则可矣。”（《新纂云南通志·罗凤彩传》）何武为西汉名臣，不骛虚名，实心为民，故被百姓长久思念。罗元琦秉承家风，德行俱佳。据钱南园手札第二十二函（《钱南园遗集》卷六），南园应罗庆恩、会恩邀请为罗元琦诗集作序、撰墓志铭，均已脱稿，可惜不见于今本南园诗文集，大概失传了。在信札中，南园称元琦为“吾乡完人，仪型后进”。

罗元琦著有《兰陔诗文集》二卷。《滇南诗略》卷三收其诗27首（有2首实非其所作，见下）。此外，黄恩锡纂《乾隆中卫县志》卷八收《黄河泛舟》《青铜禹迹》《星渠柳翠》诸诗，咏中卫十二景。该志并有罗元琦跋。罗元琦词亦佳，《滇词丛录》收其词4首。文章今存《重修十公祠记》《吕公修城记》《声韵指南跋》（《续石屏州续志》卷二）及《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说》（袁嘉谷民国《石屏县志》卷二二）等。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应知州吕缙先请，编辑《续石屏州志》二卷。

罗元琦诗，写景优美，抒情温润，议论义理正大，格调高，情韵厚，受到普遍好评。《滇南诗略》卷三载刘如阜评语：“昆圃先生诗，原本忠孝，语语温柔敦厚，粹然有德之言，读之令人起敬。”忠是对国家和君王之忠诚，孝是对家庭之爱，这是罗元琦诗的根基。他现存诗有限，但多为精品。

罗元琦孝悌之心极深，写对父母的孺慕、敬爱之情动人。罗凤彩致仕不久，他也从县令任上归休，侍奉老父。表现对父母深情的诗有《秋思》：

孤城守静暮山围，落日霜寒木叶飞。
十纪浪游瞻岷岵，三秋回首恋庭帟。
问年虽喜鹤龄健，顾影还怜雁侣稀。
梦里承颜觉后远，归思不为鲋鱼肥。

此诗应作于陇西，秋天，他在众山围绕的孤城思念父母，说己宦游10年，远离父母，虽然听说父母已高年而身体健康令他欣喜，但想到身边无人陪伴又感到不安。做梦梦到父母，醒后相距又是那么遥远。他想回家，但不是为了家乡的美味，而是为了侍奉父母。彭槎评曰：“情真语挚，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挽宫保刘苏村先生》被翁元圻推为元琦“第一杰作”，徐世昌选编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卷七五选入，说明这首诗确实出色。刘苏村即刘藻，乾隆间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乾隆三十年（1765），缅甸侵扰云南，朝廷组织反击，刘藻调度无方，战事失利，乾隆震怒，部议夺职，留云南效力。“藻闻上怒，惶迫自杀。”（《清史稿·刘藻传》）罗元琦曾得到刘藻赏识，其《声韵指南跋》说：“大中丞刘苏村先生来抚吾滇，雅意作人课士之余，见书院诸生于试帖声律未娴，爰取唐宋人诗，标举眉目，别白古体之异于今体者，以为古体既悉，则试帖不待辨而自明矣。中丞授余是编，令诸生传抄。余恐不能编，乃请付剞劂。中丞欣然许可，并评点制艺准绳，以资诵习。学使叶毅庵（观国）先生属余印刷多本，分布学官。总以嘉惠来学，使风雅一道，駸駸乎蔚起也。”他敬佩刘藻为人及爱护滇人之用心，故刘藻自杀后，作《挽宫保刘苏村先生》悼念：

大星中夜陨边营，箕尾宵乘雷电声。
一死讵能酬圣主？九重早已谅书生。
鸿文久播推前辈，清德云亡痛老成。

祖奠遥闻滇父老，碧鸡坊外送行旌。

首联写刘藻之死。颌联写刘藻与乾隆之关系，说乾隆已原谅刘藻。《清史稿·刘藻传》载：诏言：“藻本书生，军行机宜，非其所习，朕不责以所不能。”杨应琚续任总督，复谕：“应琚未至，藻当实力经理。若自以为五日京兆，致误事机，必重治其罪！”可见清高宗确实并未苛责刘藻，为他留下余地。但刘藻惶恐自杀，故云“一死讵能酬圣主”。颈联赞扬刘藻的德行和文采及他培养滇士人之善行。尾联写云南父老送别刘藻灵柩，写得公允、深情，可为刘藻盖棺之论。

罗元琦谈人生哲理的诗有深度。唐沈既济作传奇《枕中记》，写卢生黄粱一梦故事，后人往往以黄粱一梦喻指宦场经历或人世间虚幻不实之事。邯郸有卢生祠，地当入京要路，往返京都者多往游，游则有诗。罗元琦《卢生祠》：

夙根未悟落尘因，一枕黄粱几十春。
世事须求觉后境，何人不是梦中身？
繁华固已成虚幻，踪迹谁能识假真？
我亦沉痾犹未醒，天涯不了走相循。

此诗就一枕黄粱故事抒发人生感悟，深刻处在于不是像世人一样嘲笑卢生，而是看到人人都有卢生一样的虚荣心，看不到人生真谛，奔走仕途，追求伪价值：“何人不是梦中身？”还把自己放进去，“我”还在为了功名不停奔走天涯，也是在大梦之中沉睡未醒。近人王国维《浣溪沙》“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写看透而无法超脱，此为人生大局限、大悲哀，备受赞誉。罗元琦本诗已有此意，不过他没有王静安悲凉，仍然追求“觉后境”。诗人勇于自省，这本身就是一种觉悟。觉悟后的心胸应该澄明，有所执着有所放弃，人生会从容坦然一些。诗有大觉悟大境界，比乃父《石固驿用壁间韵》更具哲学意味。

罗元琦在西北写的诗表现西北风光的壮观、苍凉和奇特，如《青龙山次国荔亭先生原韵》《卜池峪》《归途偶兴》《滴水崖》《黄河泛舟》《青铜禹迹》等。《卜池峪》：“崎嶇一线绕羊肠，石涧潺湲引路长。山到穷时开异境，地从幽处接天光。千崖蟠伏龙蛇蛰，万木阴森鹤鹤翔。方寸但教无险阻，任行险阻悉康庄。”颌联和尾联富含哲理。《青铜禹迹》：“河流九曲汇青铜，峭壁凝晖夕照红。疏凿传闻留禹迹，安澜千载庆朝宗。”说经过大禹的疏凿，青铜峡千年波澜不惊，黄河水顺利奔向大海，“朝宗”透露政治意涵，即对国家的忠贞。《黄河泛舟》写中卫一带黄河美景和泛舟游览之乐：“洪波舣楫泛中流，鳧淑鸥汀揽胜游。数点渔舟歌欸乃，诗情恍在白蘋洲。”此诗流传较广。

罗元琦表现乡关之思的作品有深情远致，如《归途偶兴》《戊戌除夕》。《入滇沿路梅开似雪，茶花斗艳，其间非复朔方景象矣》表达还乡的喜悦，歌颂云南之美，最有意味。诗云：

篱落溪头绽几枝，冰绡翦却斗胭脂。
茶花似火梅如雪，好是红儿对雪儿。

他从甘肃陇西县还乡，进入云南，就看到沿路梅花、茶花盛开，争奇斗艳，与西北地区（朔方）的荒凉景象形成强烈对比，于是写了这首诗。“冰绡”“雪儿”指白梅花，“胭脂”“红儿”指山茶花，比喻鲜灵、俏皮可爱。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上卷云：“山花四季皆有，五色备具，莫能名之，而皆可爱。霜雪中点缀尤佳。故滇省行路，颇不寂寞。”可与此诗印证。

三、罗庆恩：有亭伟丈夫

罗庆恩，字汝愚，号有亭^①，又号砚山，罗元琦长子。乾隆壬午（1762）与钱南园同年举人。历官南宁县（今曲靖市麒麟区）教谕、嵩明州学正、山西五台知县。徐继畲《光绪五台新志》卷三名宦说：“罗庆恩，云南石屏人，大挑举人，乾隆五十二年补五台县。廉静爱民，不尚威刑，而胥吏不敢为奸，民欢乐之。在任数年，引疾归。”山西巡抚蒋兆奎称其“才具明白，办事谨慎”。

罗庆恩著有《谥燕堂诗文钞》。《滇诗嗣音集》（云南丛书本）卷一收诗2首，《滇诗丛录》（云南丛书本）卷二三收45首，是罗氏家族中存诗较多者。其诗取法杜甫，风格稳成。《滇诗丛录》卷二三引李坤语：“有亭举乾隆壬午孝廉，公车入京，与钱南园侍御同寓龙泉寺，以诗文相切磋，取法杜陵，风格稳成，佳句时近后山（陈师道）、简斋（陈亮）间。”

罗庆恩交游甚广。《滇诗丛录》卷二三有《次郡守王梦楼先生异龙湖原韵》，王梦楼即王文治，著名诗人和书法家，时任临安知府。又有《都门元夕大鸿胪傅岩溪先生招灯看灯赋呈一律》，说明他与王文治、傅为訥亦有交集。广泛的交游，在互相切磋中，提高了诗艺，扩大了影响。其现存诗中，酬唱之作甚多。

他与钱南园尤为莫逆。南园《文西浦小传》（《钱南园遗集》卷五）说，乾隆辛卯年（1771），他与云南文泰运（西浦）、彭翥（南池）、王运昌（宜泉）、罗庆恩及其弟会恩六举人，“寓京师城南龙泉僧寺”，“昕夕砥砺”。同年冬天南园作《为罗有亭题照》，回忆他们交往的历史，称赞他“有亭有亭伟丈夫，明星如日戟如须。高才不使时命重，得意遂与风云俱”，并为书《中山松醪赋》，系南园名迹。现存南园信札，有多篇是写给罗氏兄弟的。南园经济拮据时，还向他们借钱，他们慷慨支持，借银数百两，南园说“昆季爱我如胞”（《手札》第二十七函，《钱南园遗集》卷六）。这也说明他们家的经济实力是颇为雄厚的。

《辛卯都门除夕时寓龙泉寺》即写罗庆恩与钱南园等的“同心欢聚”之美：

暖香围座话残更，寺静遥传夜漏声。
客比僧闲无俗事，岁同春至满神京。
一年旅食辛盘尽，明日东风彩燕生。
况有同心欢聚首，尊前多奈故乡情。

尾联自注云：“同寓为钱太史，文西浦、王宜泉、彭万里诸孝廉。”与钱南园《文西浦小传》一致。除夕他们一起守岁，围炉夜话，举杯畅饮。因为是春节，无公务牵绊，所以格外悠闲。他们志同道合，虽处清贫，而以品节学问相砥砺，意志坚强，对新的一年满怀希望。“岁同春至满神京”“明日东风彩燕生”情景交融，既写自然界之实景，又流露出乐观向上的情调。结句表现思乡之情。

罗庆恩的写景诗情景交融，表现自然美和游赏之乐。如《燕子洞》《响町石岩山三洞》《偕石乐山同学、王有南世讲游秀山寺抒怀》《朝天峡》《莲花池访刘锦亭、余兰田二博士和原唱韵》《次郡守王梦楼先生异龙湖原韵》《游大觉寺》《游半云庵和文学何廷生原韵》《潼关》等，状物写景，形象生动，情致深厚。

云南东南部遍布喀斯特地貌，地下溶洞很多，建水有云津、南明、万象三溶洞。明万历云南参政谢肇淛《滇略》卷二“胜略”云：“岩洞，在临安东二十里，一名云津洞，山形绵亘，林径

^① 《滇诗丛录》卷二三说罗庆恩“字有愚，号有亭”，《滇诗嗣音集》卷一说“号汝愚”。考庆恩弟覲恩字汝勤，则“有愚”误，似为《丛录》抄写时涉下文“有亭”而误。《嗣音集》则误字为号。《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六》《谥燕堂诗文钞》条即作“庆恩字汝愚，号有亭”。

萦纡，众水归宿伏流，会盘江，达于南海。洞口空洞，可容数百人，前阻深潭，无径可通。游者循山背行达中洞，结桥而度，列炬而入，石髓凝结倒垂，千态万状，盖西南第一洞天也。其后有小洞二：曰南明，曰万象。南明黝黑，中忽有天窗，豁然明朗。万象峻阔，岚霭层结，如云霞飞布其上，尤为奇绝云。”《响町石岩山三洞》是吟咏它们的佳作：

蒙山矗立何峻嶒？秀拔南天亘地絃。
全凭造化泄真宰，欲探奥窾藏幽精。
懋峰盘纡并奇特，薰郁草木连葱菁。
崖姿壑籁有神会，意气磅礴天风鸣。
水乳云根亘吞吐，溅珠跳水声鏦铮。
忽讶豁豁洞门坼，划然一窍开南明。
回光倒影叠空翠，因之欲叩阴崖扃。
直收万象入指掌，森列密布纷难名。
其下水由地中出，蛟龙夜吼鼉鼉惊。
峭石前横詎能阻？涛驱云涌时奔腾。
此际匪伊智者凿，犹疑鬼斧神工并。
我闻天台四万八千长丈，玉宵缥缈凌沧溟。
兹山久已伏榛莽，安得云蒸霞蔚侔赤城？
山灵显晦亦何定？会与金碧交峥嵘。

先写三洞所处环境，说石岩山拔地而起，崖石嶙峋，树木葱茏。山崖深壑大气磅礴。从盘旋的山路下到箐底，就是山洞。深箐之中，水冲击岩石，跳珠溅玉。在悬崖峭壁之间，一门突然洞开，即南明洞。然后写洞内景观，钟乳石森列密布，地下水奔腾，声音洪大。最后感叹石岩山及山洞景观鬼斧神工，可与浙江天台山相比，但石岩山及三洞被埋没荒野，为之惋惜。相信它最终能与昆明金马碧鸡山一样露其峥嵘。写景出色，呈现了石岩山和三洞之壮美。议论启人深思，边疆地区大自然造就的“奇特”景观比比皆是，由于人迹罕至，往往“伏榛莽”，随着社会发展，它们才逐渐显露。

四、罗觐恩：名满人间世，心空物外缘

就现存文本看，罗觐恩在罗氏家族中文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他与朱奕簪、陈履和并称“龙湖三子”。他的诗得到汪如洋、姚鼐、钱南园、师范、袁嘉谷等名家好评。钱南园说：“汝勤弟抗心希古，五言合者，直驾三唐而上之，体汉京之厚而不袭其朴；其少降抑者，厕诸王孟韦柳，正无愧色。……吾党中独彭南池、师荔扉真与汝勤鼎足也。”（《手札》第二十六函，《钱南园遗集》卷六）袁嘉谷《滇绎》（秦光玉《续云南备征志》卷四）“学派”把他和许贺来、张汉、朱履、许印芳、朱庭珍并称为石屏“诗雄”。

罗觐恩字汝勤，号琴山，罗元琦第五子。曾入国子监就读，嘉庆元年（1796）拔贡。丙辰（1796）举孝廉方正。《新纂云南通志·文苑传二·罗觐恩》说：“天性高旷，中年即绝意仕进，隐居著述，尤精于诗。所著有《卧游》《癯禅》《游燕》《游吴》诸集，晚年刊定为《琴山诗钞》。云南学政汪如洋为之序，称迤南风雅倡之觐恩。与朱奕簪、陈履和、廖椿龄齐名，安徽姚鼐极称之。”汪如洋乾隆四十五年（1780）状元，五十一年（1786）任云南学政。姚鼐乃桐城派宗匠，名重天下。师范《喜晤罗琴山并怀龚簪崖、文望山》（云南丛书本《师荔扉先生诗集》卷五）称赞他“名满人间世，心空物外缘”。善弹古琴，在当时负盛名。

罗觐恩是罗氏家族存诗最多的诗人。诗集今存《琴山卧游集》。《滇诗嗣音集》卷十三收其诗

79首,《滇诗丛录》卷三二收25首。《晚晴簃诗汇》卷一一五收3首。光绪《云南通志》卷二一八“艺文志”四之五收其诗亦多,有的未见于《嗣音集》《丛录》,如《游螺峰寺》《晚登西山古寺》《黑龙潭唐梅歌》等。其诗之特色,汪如洋说:“覲恩诗清妙微婉,殆宗法韦孟而浸淫于汉魏者(《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七》)。”“清妙微婉”是罗覲恩诗的基调。其诗写景婉妙,言情深微,而皆清爽超迈,令人爱赏。他还参订《滇南诗略》,其中时有其评语,表现出很高的诗学造诣。

罗覲恩的山水风物诗不少,有《夜泛滇池》《游螺峰寺》《再游螺峰寺》《太华山》《自美人峰渡罗汉壁登三清阁》《朱家洞吴道士凿石开路处》《过华亭寺》《泛舟五龙山游览九曲诸胜》《磨古河》《宿水月寺》《燕子洞歌》等,写山水之美,抒爱自然之情。《燕子洞歌》云:

我闻宇内洞天三十六,安得蜡屐遍踏青芙蓉?

俯瞰群山等培塿,峥嵘五岳排心胸。
兹山灵奇擅响叮,金华玉清将无同?
悬崖千仞立积铁,石磴百折盘虚空。
巨灵何年辟窈窕,砢然石扇开鸿蒙。
其下水由地中伏,惊雷激电相撞舂。
怪石磊落千万状,如踞虎豹驱黑熊。
丹灶石床纷罗列,金芝瑶草多玲珑。
杖策深入探奥窅,然犀惊起寒江龙。
白昼森沉藏神鬼,晴天惨荡生雷风。
游人到此皆却步,毛发直竖心神忡。
须臾阳光射一线,恍见璇闕金银宫。
羽盖云幢有无中,群真来往骖烟鸿。
采药归去无踪迹,洞口惟有白云封。
想当太古开凿日,巨仞耿耿摩苍穹。
元气淋漓尽分割,神斤鬼斧难为工。
混沌已死真宰立,上天无乃含愁容。
排云大叫闾阖启,我欲摇首穷元功。

建水燕子洞在云南溶洞中享有盛名。罗庆恩、罗覲恩兄弟曾同游燕子洞,均有诗作。这首歌行展开丰富的联想,纵横铺排,巧言切状,写出了燕子洞景观奇特,仿佛神仙世界,感叹燕子洞的神奇连鬼斧神工都做不到,上天为之含愁。辞藻瑰丽,描写生动,是歌咏燕子洞的佳作。与乃兄庆恩《响叮石岩山三洞》异曲同工。

罗覲恩写家乡风物的诗多而好。他对异龙湖尤为钟情,有《异龙湖春泛》《异龙湖》《湖上秋兴》《自白浪归绕湖行九曲山路》等。《异龙湖春泛》云:“谁信仙源路不通?桃花春水入空濛。三山楼阁浮天半,九曲烟霞落镜中。家宅泛随张叟月,渔樵归及郑公风。何知人海风波险?旦夕清安卧短篷。”说异龙湖美如仙境,湖上人家渔樵为生,清静安详,自由自在,根本不知道人间还有凶险之事。《异龙湖》尤美:

环湖烟火野人居,绿浪黄云百里余。
一夜香风吹瓮牖,水田初上谷花鱼。

写出异龙湖区秋季的美丽景象和农民丰收的喜悦,以及作者对家乡的热爱。“绿浪”指湖中碧波。“黄云”指金黄色的稻田。色彩对比强烈,风景如画。袁嘉谷《卧雪诗话》卷三说:“石屏秋收之后,谷落水田,鱼食而肥,号曰‘谷花鱼’。月槎先生(张汉)诗云:‘我亦怀归梦烟水,钓船十里谷花风。’又云:‘日归曷月予旋归,谷有落花鱼正肥。’可谓佳作。余有诗云:‘异水花鱼

秀山韭，难忘风味是滇南。’”可见谷花鱼之美。只是袁屏山（嘉谷）对谷花鱼的解释不确。秋天是谷花鱼收获的季节，不是“秋收之后，谷落水田，鱼食而肥”，应是水稻开花后“花落水田，鱼食而肥”。此诗中谷花鱼的“香风”不仅吹出农家窗户弥漫村庄，也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确属“清妙”之作。

罗颯恩写亲情的诗真挚温暖，有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述哀》五言古诗5首，叙写母亲的慈爱，抒发对母亲去世的悲哀和思念。《纪梦》写父亲出现在梦中，继续关心教诲他，“慈蔼逾生平”。《寒夜怀兄》《送家兄有亭、南畊之京》，表现兄弟深情，后者云：

朔风送归雁，中夜望乡飞。何事连枝树，偏多万里违？
雪声过楚急，春色渡滇稀。京洛缁尘地，知难染素衣。

罗庆恩、罗会恩赴京会试，颯恩作诗送别。首联既写兄长进京的时间在秋天，也通过归雁南飞反衬兄长北上之难堪。颌联说兄弟是连理枝，本应在一起，偏偏离别的时候多，现在又要相隔万里，更加难受。“雪声过楚急”设想兄长冬天大雪纷飞时过湖湘，寄予关切。“春色渡滇稀”说春天到云南，因为兄弟离别，似乎春色也少了。尾联表达对兄长高洁品格之信任。融情于景，耐人寻味。

五、罗氏家族其他才学之士

除罗凤彩、罗元琦、罗庆恩、罗颯恩外，罗氏家族还有多人才德俱佳。

罗凤彩的传记资料，都把其家族历史追溯到其曾祖父罗万藻。万藻，岁贡生，教书为业，成就人才甚众，以文学享誉乡里。陈惠华《罗宗丞传》说：“曾祖万藻，以明经教授里中，游从甚众，文学载州志。”《续石屏州志》卷二收其诗《设帐尊经阁口占示及门诸子》七律一首：“杰阁今为翰墨林，亲入黄卷日披寻。登峰诣比华颠峻，汲古功同瀚海深。寸管能参天地秘，一编常晤圣贤心。休教白首伤迟暮，早向窗前惜寸阴。”此诗教诲弟子读书，境界高远，言之谆谆。

凤彩祖父罗人文、父罗绣锦皆秀才。鄂尔泰《罗母郑太君墓志铭》说，罗绣锦“少负异质，工制举，尤邃于《易》，究心理数之学，性崖岸，不苟同于人，而数多奇”。“数奇”即命不好，意为在科场上屡不得志。

罗元琦第三子湛恩，字镜湖，举人。李毓兰《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七“学正”载：“罗湛恩，石屏人，举人，五十年任。”知其乾隆五十年（1785）任镇南州（今楚雄南华县）学正。后升湖南黔阳知县。曾国荃监修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黔阳县：“罗湛恩，云南石屏人，九年任。”黄东旭《黔阳县乡土志》“国朝嘉庆、道光间之政绩”载：“罗湛恩……嘉庆九年（1804）知黔阳县。清廉勤慎，导民以崇俭、黜华为先。因公至乡，止仆从数人。虽巨案不株连一人，到辄审结。”其诗文似无传。

罗元琦第四子会恩（1744—1804），字际叔，号南畊。姚鼐《石屏罗君墓表》（《滇南碑传集》卷二十六）说：“有文学，数不第，退居修行于家。君乾隆戊子（1768）科举人也，吏部选为安宁州学正，君不忍离母，竟不就官。”“数不第”是指他三次参加会试，皆报罢。进京应考期间，“与乡先达周立厓廷尉、钱南园侍御，师事友处，砥砺文行无虚日”（江濬源《石屏罗孝廉南畊墓志铭》）。周於礼号立崖，峨山人，乾隆辛未（1751）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会恩虽不任官，但对家乡公益，热心办理，“必利众而后已”。“南畊生平耽卷轴，勤考课，阐述先德，荟录古今格言成帙，以示学者。复辑法帖数十种，临卒，一一分给予姓。其自著有《过庭彝训》《南畊文集》《诗集》藏于家（《石屏罗孝廉南畊墓志铭》）。”酷嗜书法，李放、叶眉纂辑《皇清书史》卷十三说：“尝集法帖数十种，临摹考证，孜孜不倦。”他的诗文似亦无传。嘉庆《临安府志》二十卷，署名江濬源修、罗会恩（或作惠恩）等纂，说明他是该志的主要纂辑

者。该志是建水历史上的重要方志。

罗元琦六子罗荫恩，岁贡，任江川教谕，关于他的信息很少。方树梅《钱南园先生年谱》（余嘉华主编《钱南园诗文集校注》附录，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乾隆五十七年（1792）载：“先生往石屏视次女。女适罗孝廉荫恩樾庵之子廷圭。”知他与钱南园联姻，号樾庵。是年南园在石屏女儿家住数月，“日以挥毫为事”，书名胜榜联不少，“石屏士人至今每引以为重”。南园手札中多篇提及樾庵。师范亦与之友善，《师荔扉先生诗集》卷二六有《石屏罗樾庵教谕》：“群季一家皆俊秀，樾庵诘肯作蜂腰？红绶不抵青毡贵，兄弟相承兴自超。”题下自注“昆季四人皆先后广文”，指庆恩、湛恩、会恩及荫恩都曾任教职。诗说兄弟一门俊秀，荫恩和诸兄比不逊色。

六、罗氏家族诗作辨误

罗氏家族现存作品有串乱的情况。《滇南诗略》卷三一收罗元琦二诗，论者推尊之不遗余力，其实非元琦作，兹考辨之。

一首是《家大人避暑秀山，傅京兆偕诸前辈过访》：

纳凉依静院，连辔喜经过。飞盖思京国，寻踪到薜萝。
梦回青琐远，地迥白云多。坐隐追仙躅，何人烂斧柯？

《滇南诗略》卷三一有翁元圻评曰：“《避暑秀山》《挽苏村宫保》二诗，自是昆圃明府第一杰作。”湘潭彭槎评曰：“中丞公以名卿退居林下，先生亦解组归养，此诗俱有无穷忠爱，却无一腐浅语。”《晚晴簃诗汇》卷七五亦作为罗元琦诗选录，可见其影响甚大。

但此诗与《续石屏州志》卷二所载罗凤彩《避暑秀山，傅京兆嘉言偕杨若采、陈镜庵、张平侯诸公过访》第一首，只首联略有差异，《续志》作“纳凉栖鹿苑，并辔客经过”，其他全同，应是同一首。傅京兆是建水人傅为訢，字嘉言，号岩溪，曾任奉天府府丞，故称。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鸿胪寺卿，为清季云南大佬之一，称“直谏名臣”，著有《藏密诗钞》。傅为訢在京中与罗凤彩同朝，致仕回乡，罗凤彩在秀山避暑，他与其他人前去探望，谈论京中往事。诗中所写切合罗凤彩经历。《续志》为罗元琦实际纂辑，成书时间比《滇南诗略》早，据辨伪学原则，越早的文献可信度越高，再说自家父亲的诗更不会出错，故此诗应为凤彩作，《诗略》父冠子戴了。《晚晴簃诗汇》应是据《诗略》采录，故仍其误。

另一首是七言古诗《二忠祠纪事和江竹岑韵》：

豕突当年弄兵符，闻敌敛甲非丈夫。
直前格斗兢披靡，重围裹血振臂呼。
力殄妖氛冒白刃，青燐夜夜埋荒芜。
邑人立庙北山下，背枕乾阳面带湖。
想见先登同饮恨，遗像凛凛何魁梧！
多君摘词揭日月，踪迹不与岁月徂。
二公能将大义扶，纷纷肉食胡为乎？
人生仗此七尺躯，要令名与天壤俱。

赞扬二忠的英雄气概，说他们的美名与天地同在。翁元圻评曰：“二忠祠诗，中丞公以识见胜，昆圃明府以气魄胜，不减西堂（尤侗）之后有沧湄（尤侗子尤珍）也。”赞扬父子并美。傅应台评曰：“激昂慷慨，杰作。”诗是好诗，但不是罗元琦所作。考《续石屏州志》卷二，此诗署名“学博，高理，玉采。”《续志》并有高理《恒产说》，可见应为石屏州学正高理（字玉采）作。《续志》为罗元琦纂辑，他是当事人，断不会错，则此诗是《滇南诗略》编者舛入罗元琦名下者。

令人费解的是，《滇南诗略》“参订诸家姓氏”有罗靛恩，说明他参与了《诗略》的纂辑，涉

及自己的祖父、父亲，本应格外小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或许是他根据父亲手稿选诗，手稿中有罗元琦抄录罗凤彩、高理之作，未加甄别，也未细考父亲相关著述，以为诗好，就选入父亲名下。如果不是他本人操作，而是袁文揆遴选，也可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串乱。

七、罗氏文学家族形成之原因

文学家族或文学世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政治文化机制和家族传统等。罗氏家族也不例外。

石屏有异龙湖、西湖、乾阳山、秀山等名胜，钟灵毓秀，石屏文学“得江山之助”，相当发达。“山林皋壤，乃文思之奥府。”（《文心雕龙·物色》）明石屏名诗人杨忠亮《石屏名胜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在历数石屏山水美景后说：“夫宇内不乏名山胜水，求湖岛之峙秀、洞壑之开朗，恐不可兼，即兼之未必俱美。石屏越在南省，山水曾不得拟于岷山、镜湖之胜，限于地僻也。倘遇骚人墨客，安知不身隐而文著乎？”意思是石屏兼有湖岛洞壑之胜，国内不多见，能触发骚人墨客的情思而创作出色的诗文。石屏人对乡邦湖山之美津津乐道。明嘉靖甲辰（1544）进士、湖广布政司参议杨廷相《善觉寺》（李坤《滇诗拾遗补》卷二）说“风景无边堪入画”。嘉靖乙丑（1565）进士、江西按察副使许鎡《乾阳古洞》（陈荣昌《滇诗拾遗》卷六）说“山川胜概应称最”。石屏诗人几乎都有写家乡风光的作品，足证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大。万历庚辰（1580）进士、光禄寺少卿涂时相《化龙桥》（《滇诗拾遗补》卷二）说：“屏湖地阔水溶溶，多少神龙化此中！”石屏的无数“神龙”——杰出人才，就从美丽山水中孕育而成。傅为訥《泛舟湖上罗孝廉昆圃惠诗裁答》（《续石屏州志》卷二）说：“湖山无限好，可助玉溪生。”玉溪生为李商隐，此借指罗元琦，表示石屏山水给诗人助力。罗氏家族诗中，写石屏山水风物的极多，也显示了地理环境的作用。

宋代以后，科举制度高度成熟，它是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政治文化机制。在其影响下，中国形成大量“科宦—文学世家”。^①通过科举能够博取功名，成就人生，光宗耀祖，故诗书传家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虽山陬海澨之士，莫不争相濯磨，骧首云路”（罗元琦《续石屏州志》卷一选举志）。罗氏家族就属于典型的“科宦—文学世家”。罗凤彩进士出身，官至正三品，为朝廷大佬。上推祖、父辈，下延儿孙辈，均有科举身份，多出任公职。在准备科考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读书积累知识，锻炼写作技巧，以利于文学才能之发展。罗元琦《声韵指南跋》就说，诸生为应试作试帖诗，“使风雅一道，駉駉乎蔚起”。获得功名后，行走天下，丰富生活经历，一是参与国家治理，诗文的社会内容得到充实，思想分量加重；二是得睹宇内名胜，开阔视野，拓展诗文内容；三是与各地豪杰交游，互相砥砺，提高为人境界和诗文境界。大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王士禛说：“为诗须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识见。”（何世基《燃灯纪闻》）上述诸方面即在他说的范围内。这就促进了“科宦—文学世家”的兴盛。科宦之家普遍追求“德言功”三不朽，“德”“功”体现于“言”，就使诗更加丰满厚重。

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石屏高度重视文教，使其成为滇南文献名邦，人文炳蔚，俊杰辈出。罗元琦说：“石屏湖山佳丽，夙号人物渊藪。自元明来，贤哲挺生，后先相望。或树廊庙羽仪，或为乡国楷模（《续石屏州志》卷一人物志）。”云南布政使徐铎《许若兰澹园诗序》（《续石屏州志》卷二）说：“飞云绚彩，天开六诏之文明；列玉为屏，地号两迤之才藪。”石屏无论贫富之家，皆以教子读书为荣，文风之盛，甲于南滇，媲美内地。罗凤彩《石屏州志序》说：“屏处滇隅，而华峰西峙，异水东环，文物衣冠，与中州等。”御史王夔龙《石屏州志序》（《乾隆石屏州志》卷

^① 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223—224页。

六)说:“屏在滇,则教化翔洽,声名文物,彬彬与中土埒。”浙江海宁人、文华殿大学士陈元龙《许秀山传》(《滇南碑传集》卷十三)也说:“益部(云南)东西,石屏实甲千里之内,迩年科甲文物,雁行中土。”据统计,明清两代,石屏共出翰林16人、进士76人、举人640人。^①不仅数量多,而且名次好。全省乡试解元(第一名)指不胜数。云南会试最好的名次多出自石屏,张汉应康熙、乾隆博学鸿词科,皆中式,“两隽特科,世论以为荣(孙灏《石屏张月槎公墓志铭》,《滇南碑传集》卷二十四)”;朱淳道光己丑(1829)传胪;袁嘉谷为经济特科状元。此种情形,在云南绝无仅有。雍正石屏知州龙为霖题化龙桥联“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绝非夸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名流蔚起,著述成风,“屏自明迄今,人文炳蔚,不少大雅,其间著作记载,实繁且博”(《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于是文学世家层见迭出,有涂时相家族、许贺来家族、张汉家族、何其伟家族、朱履家族、丁应奎家族、袁嘉谷家族等。就一个县而论,不止在云南罕有其比,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出类拔萃的。罗氏家族之出现,也就顺理成章。

石屏重视文教,还与移民大量进入有关。谢肇淛《滇略》卷四“俗略”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俗,大率类建业(今南京)。二百年来,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云南(今昆明)、大理、临安、鹤庆、永昌(今保山)诸郡,四民乐业,守法度,子弟颖秀,士大夫多才能,尚节义。”石屏就在临安范围内,其世家大族,祖先几乎都是移民。如杨廷相,“始祖裕,以京口(今镇江)著姓戍滇之临安,而侨寓石屏,则自公之大父始。”(包见捷《参议杨台峰墓志铭》,《滇南碑传集》卷四)许镛,“其先本蜀之巴县,始祖讳维普,仕为丽江郡丞,卒于官,遂家于屏之五亩。”(涂时相《石屏许金使墓志铭》,《滇南碑传集》卷四)张汉,“上世籍四川巴县,元明威将军讳均德,始家于屏。”(孙灏《石屏张月槎公墓志铭》,《滇南碑传集》卷二十四)罗氏亦然。窦光鼐《罗公墓志铭》说,罗凤彩“其先江西庐陵人,明嘉靖中徙云南之石屏”“维滇著望,系分庐陵”。内地文化处于高位,他们来到边地,继承了原有文化传统,重视文教,对边地文化有显著拉升作用。

罗氏家族家风极好,具备深厚的家学传统和文化积淀。一是重视精神生活。诗是体现精神价值和人生乐趣的重要载体,故喜为之。罗元琦《六十生朝自述》说“风霜坚志节,岁月耗篇章”,反映诗文写作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性。罗元琦有《玉蝴蝶》《满庭芳》《百字令》等4首词,以“四时读书乐”为主题,写一年到头读书的乐趣,以及读书与作诗的互动。二是诗书传家。罗凤彩为后辈作出表率,“诗书泽其子孙,德义化于乡人”(窦光鼐《罗公墓志铭》),为罗氏家族文运兴隆奠定基础。其子孙“皆恂谨嗜学,能世其家”(陈惠华《罗宗丞传》),致力于心性涵养、意志提升和精神创造,德行高尚,有为有守,淡泊名利,而以读书写诗为乐。家族成员之间还有品行和诗艺的砥砺切磋,罗庆恩《送舍弟北上集工部句》说“礼乐攻吾短,文章敢自诬”透露其中消息。江瀚源说:“崑圃明府,石屏望族,厥子覲恩兄弟皆能文,然则师友、父子、兄弟间,熏陶岂可少哉?”(《滇南诗略》卷三五)故家族写诗之风绵亘不绝。陈惠华《罗宗丞传》感叹说:“(凤彩)躬膺五福,庆诞苗裔,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共同作用,使处于边疆民族地区一个角落(罗凤彩所谓“滇隅”)的石屏人文云蒸霞蔚。罗氏家族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数代品行超卓,文采风流,名著于滇,他们的成就令人敬仰,他们的成功经验至今给人启迪。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郭蕴秋:《石屏文庙:云南唯一的状元袁嘉谷从这里走出》,《春城晚报》2011年7月18日,第B14版。

保甲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在民国时期的重建

杨明辉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 保甲制度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扮演着统治阶级管理基层民众的重要角色, 它位于政权层级架构的最底部, 也是国家政权与民众接触最为密切的环节。其雏形可追溯到西周的“乡里制度”, 而在秦朝商鞅变法时期, 已经拥有了近代保甲制度的实质。北宋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 使保甲制度正式确立并得到广泛实施。然而, 历朝历代在推行保甲制度过程中, 时常受到诸如战乱、社会动荡、民族纷争、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导致该制度时断时续, 而其功能也各有侧重。国民政府时期, “保甲”成为了“反共剿共”的手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保甲制度被正式废止。制度的产生与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意志紧密相连, 而作为政治制度的保甲制度更是如此, 进一步梳理保甲制度的产生、演变过程, 对于研究中国基层政治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保甲制度; 历史沿革; 民国; 重建

中图分类号: D6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3-0087-08

中国封建王朝时期, 保甲制度作为一种由官方自上而下推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制度, 是统治阶级力图通过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与民众发生直接联系并用于加强对基层管理的一种手段。保甲制度一般以“户”(家庭)为编制, 通过严格的编制(户籍)管理与连坐法, 在收取赋税、管教地方民众、维持社会治安等方面对基层民众加以管理, 使得中央行政权力的触手“筑到每家的门前”^①, 故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 然因“有时势之不同……而保甲运用亦遂有所侧重。或重在教, 或重在刑, 或重捕盗, 或重查户, 或重农桑, 或重兵役, 或偏于作用, 或偏于编制……王安石始正其名, 初重警察, 终重杂役, 至元则用以施教, 明用以役民, 清用以制民”^②。

一、保甲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 起源与演化: 保甲制度的萌生

“保甲”一词最早见于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户籍保甲法”, 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的“乡里制度”。《周礼》载: “令五家为比, 使之相保; 五比为闾, 使之相受; 四闾为族, 使之相葬; 五族为党, 使之相救; 五党为州, 使之相调; 五州为乡, 使之相宾。”^③此外, 西周还实行“什伍之

基金项目: 云南省2019年度社科基金项目《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保甲制度与基层政权演变研究》(YB2019042)。

作者简介: 杨明辉,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① 费孝通:《乡土重建》, 上海: 观察社, 1948年, 第46—50页。

② 崔丽霞、柳德军:《从自治到保甲: 民国保甲制度复兴之路》, 《求索》2016年第7期, 第7页。

③ 郑玄、周公彦:《十三经注疏之四黄侃经文句读周礼注疏附校勘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第158页。

法”，《周礼·地官》载：“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爱，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①可见，西周已开始在基层推行编组体制，其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姻、相宾^②，已具保甲制度的基本功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沿袭西周的“乡里制度”和“什伍之法”并有所完善和健全，如秦国的“什伍连坐制”^③、齐国的“参国伍鄙制”^④，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出现了社会安定、国家日渐强大的态势。

秦朝统一六国后，其基层政权组织已具备保甲制度的功能。秦将全国划分为郡、县、乡三级行政区域，乡作为基层行政区域，通过编组，对民众进行层叠式管理、教化，并收取赋税，加强治安。汉朝时期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基本沿袭秦朝，但是在内容、设置、职责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一，进一步确立“什伍组织”为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其二，明确基层官吏的设置及其职责。《后汉书》载“乡置有秩、三老、游徼”，其中又设乡佐与亭长，各司其责，对行政、教化、治安、赋税等方面详细分工；其三，乡民的组织化程度更为系统和严密。汉代的乡官为“三老”，并规定其职责为户口调查，这表明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实行，体现了组织的系统性，是秦汉时期保甲制的雏形。在统治者力求稳定统治的情势下，这些措施适应其政治要求，成为管理基层民众、维护地方内部团结的重要手段。

此后的王朝更替中，基层政权组织的演变纷繁复杂、起伏不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采取的是西周“邻、里、闾、党制”^⑤和秦汉“乡、亭、里制”并举，加强地方管理。北魏初期实行的则是“宗主督护制”^⑥，其本质是利用地方宗族、豪强来管理基层民众。由于受战乱、社会动荡、民族纷争等影响，这一时期的保甲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地沉浮与磨砺着。这一时期的基层组织制度，一方面受到政治时局的影响，不断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也体现和证明了该时期基层政权组织制度在稳定社会，最大化基层政治、经济优势方面的重要性，为以后保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重建与固化：保甲制度的确立

隋唐时期，乡里组织的地位有所下降，地方基层组织中出现了“保”和“团”的设置，基层政权中乡一级的功能也随之弱化。隋朝初年在基层设立保、闾、族三级制，确立了“保”为最基层的一级，从此“保”替代了“乡”。公元595年（开皇十五年），隋文帝将乡官全部罢免，从而简化了基层管理级别，完备了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责。唐中期以后，乡里制度已经开始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保甲制度进一步定型。应该说基层政权中此次变化是保甲制度作为中央政权集权的一个象征，是中央政权国家组织吞噬旧贵族、地方豪强的势力的体现，也是社会机体进行

①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81页。

② 指以十家为一甲，每家之间互相担保，称为“相保”，如果其中一家有违法行为，所有的甲户都会受到牵连。这种制度旨在通过社区的监督和连坐制度来控制 and 规范个人的行为。“相受”指在生产 and 生活上相互扶持、接济。“相葬”则是指在一家有丧事时，社区会协助其办理丧事，这也是中国传统的“邻里互助”思想的体现。“相救”是指当有人遭遇危险或犯罪行为时，社区有义务进行救援或协助。“相姻”是指社区成员之间在经济上互相帮助，类似于现代的“社区基金”或“紧急救援基金”。“相宾”是指在社区中，人们彼此尊重，将对方视为客人，这是一种强调和谐共处的理念。

③ 指人们被组织成“什”和“伍”两个基本单位，而一家有罪，其余各家均应告发，否则将连同受罚。

④ 指在国都郊外的地方设立士乡和工商之乡，同时建立轨、里、连、乡等行政机构和伍、卒、旅、军等军事组织，而在野鄙则设立五属，建立邑、卒、乡、县、属等基层组织，由五属大夫分别治理。

⑤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⑥ 宗主督护制是北魏前期地方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式。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未南逃的大地主多筑堡自守，聚族而居，拥有很多的依附农民及一定的武装力量。北魏自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无力改变这一现状，于是承认这些宗主的既有利益为合法，任命他们为宗主，以督护百姓。

自我膨胀与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宋朝是保甲制度正式确立和实施的时期。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宋神宗为缩减兵员，节省国家财政开支，采纳了王安石建议，实施“保甲法”（又称保甲制度）。“保甲法”从开封府界开始实行，颁布相关诏令，包括编制、抽丁习武、巡警保安、伍保连坐、置牌户籍等内容，确立了保甲制度比较完整的体系，并且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实行之初，在结保防奸、维护地方秩序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南宋后期，因战事不断，保甲制度的职能根据需要进一步调整，保甲制度的功能有了新的体现，最终产生了保甲制度中最受统治者青睐的“寓兵于民”的功能。“寓兵于民”在封建社会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有利于组织分散的民众，形成自卫力量，在平时防御盗匪、维护地方治安上已初见成效，同时乡里百姓通过练兵习武，强身健体，在战时，这些经过训练的乡勇、保丁、民兵也可以为保卫国家出力奉献。特别是在北宋末期、南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日趋强大，不断侵扰中原这一大背景下，保甲制度这一功能的衍生更为实用。“寓兵于民”这一功能不仅使保家卫国的力量得到加强，而且在节约军费上起着主要的作用。同时，宋朝还产生了以教化为主要职能的乡里组织——“乡约”。乡约的出现，其目的也是维护基层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教化民众。宋朝的保甲法在基层政权中的确立是政治体制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一定职能与作用上来讲，发挥了稳定社会、管理民众的效果。保甲制度也随之从名称到职能正式地在中国的历史中得以确立。但是，由于宋朝以保甲制度为主体的乡村社会其自身治理职能的空缺状态，单纯地由上至下地执行赋税、捕盗、征丁等方面的职能，使其反而处于社会无序、役法败坏的局面。

（三）发展与流变：保甲制度的演进

元朝在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上存在有别于其他朝代的方面，但是在基层管理上，基本是继承和沿用了宋朝的保甲制度，并且使之有了一定的发展。元朝基层政权组织设立了严密的地方基层组织——“社”，其主要功能包括设立社和社长，奖劝农作，社众合作，奖恤良民、惩罚惰恶，设立社学等。可以看出，“社”的建立是针对宋朝保甲制度在自治方面的不足所引发的社会无序、执法败坏等问题所采取的积极尝试，是保甲制度的变体。应该说“社”的建立，再次丰富了保甲制度的内容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基层的自治色彩，是政治制度上的一种进步。但是，归其根本，元朝的统治还是具有局限性，统治者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更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基层政权的治理根本上没有做到自治，并且出现了社长职权增大、职责主次不明等情况，并没有达到元朝统治者最初的目的。正如杨讷先生所说“元代的‘社’制，与同时负责征调赋役的‘里’制，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已经混而为一”。

明朝的基层政权组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明初期与明中后期。明初期，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对人口的管理，更好地完成征发徭役、征收赋税的任务，基层政权所采取的是“里甲制度”和“黄册制度”。明初县以下单位为乡、里、甲三级，以110户为一里、10户为一甲的里甲，是最基层乡里组织，并且因地制宜，北方地区多为乡（坊）、里（社）、甲三级，南方地区多为都、图、甲三级或乡、都、图、甲四级，间或有乡、都、图、里、甲五级者。^①此时以“里甲制度”为主体的基层政权组织，对于建立在明朝初期相对稳定的以土地占有关系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形式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到了明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逐渐频繁、阶级矛盾激化、外敌入侵，“里甲制度”与“黄册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基层政权的政治要求，趋于崩溃。明政府被迫进行赋役制度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

^①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9页。

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微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①以编制黄册、征收赋税为主要职能的“里甲制度”逐渐被以维护地方秩序、治安为主要职能的保甲制度代替，对人口管理更为严密的保甲制度成为明中后期主要的地方基层组织。

“清朝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设置，多沿明朝之旧。县之下，一般是‘乡、都、图’三级制，但各地名称极不划一。”^②清代的基层政权制度出于其不同时期统治的需要，经历了保甲制度到里甲制度，又从里甲制度到保甲制度的过程。由此可见，清朝中央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要求所做出的调整，时而需要以征收赋税为主要目的而采取里甲制度，时而侧重以社区治安为主要目的而采取保甲制度。由于清朝保甲制度推行的规模、力度和政府的重视程度都超过前几朝，所以保甲制度在清朝成为最深入民心的基层政权制度。更有甚者，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很多地方豪强以其特点，大力发展自卫职能，兴办团练。此时，保甲制度在职能上再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传统中国，国家与基层社会总是在相互隔离、相互斗争。中央政权希望自上而下地伸展国家的权力，而基层社会各方面的势力的合力又相对自立与自治。

可以说在统治者的努力下，清朝的保甲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发展最完备、统治最深入的基层政权。但是，历史的潮流使中国不可阻挡地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和发展起来，人口的流动日益增大，保甲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及其作用开始减弱，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清王朝的推翻，保甲制度也被废止了。

二、保甲制度在民国时期的重建

辛亥革命不仅仅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加速了中国旧的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旧的政治结构的分化，这导致中国乡村基层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改造与管理：保甲制度的复兴

从北洋政府统治到南京民国政府成立，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基层政权的转变可以说是从颠沛流离中走过的，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不稳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政府急需寻找一条改造之路。

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乡自治法令后，政府主导下的“保甲”逐渐消失。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进行社会改革需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1928年，国民党的第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行“训政”。“训政”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地方自治，为此，1929年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县自治法》《县组织法》《县自治法实施条例》《区自治施行法》《乡镇自治施行法》《县参议会组织法》《县参议员选举法》等一系列法规，涵盖政权、选举、教育、卫生、交通、水利、农业、商务、慈善等各方面事务，并特别规定了县级以上机构：

县—区— $\left[\begin{array}{l} \text{村（乡村机构）} \\ \text{里（城镇机构）—闾—邻} \end{array} \right]$

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当时是希望以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模式作为当时政府管理基层的主要模式的。但是，在地方自治具体推行过程中，虽然从文本制度上否定了中国历史上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保甲制度，但这种自治层面仅限于县，县以下的“区”级机构并没有触及，政令到县为止，向下就难以推行。同时由于民国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一些地方实力派，在其管理的地区内实行的仍然是与保甲制相似的制度，如龙云在云南举办的“团、甲制”，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实行

① 张廷玉等编：《明史·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2页。

② 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的“村、甲制”等。所以从政权组织体系上来看，保甲编制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权中，地方自治的推行成效不大，民国政府的政治要求无法得以体现。故1928年民国政府把“保甲运动”作为全国性七项运动之一加以推广，其目的在于由“增进幸福”的“自治”转变为维持地方安宁之“自卫”。

当然，众多历史学者也认为，“消灭”中国共产党是民国政府推行保甲制度最直接的动因。1928年到1929年期间，蒋介石就在极力推行保甲，但由于民国政府内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使其腾不出手来全力“剿共”和复苏保甲，所以前期的保甲法规比较零乱，加上各地势力实际上阳奉阴违，并没有大力推行，致使保甲制度没有真正得到实施。1930年，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发生了一场新军阀混战，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宣告结束，自此蒋介石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机会着手整治基层政权。

民国政府开始实行以保甲制度为主体的基层政权改革，其目的是强化行政管理职能，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消灭”中国共产党。从宏观上来讲，改造与管理基层民众才是其最为主要的目的。从政治、经济、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从政治历史的延续性出发，保甲制度被民国政府所选择，说明其已具备了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和作为政治制度转变过渡环节的特性，基于以下两点：其一，中国传统并长期延续的保甲制度根深蒂固，对于新生基层政治体制具有排斥性；其二，民国初期中国基层社会族权被进一步强化，各种地方势力、宗族组织的兴起。孙中山曾提到“中国国民和国家的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地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的用个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中国人对……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①。因此，对于中国基层民众的团结与组织，在许多方面要借助于宗族的组织系统来开展。

可见，虽然在民国初期中国基层社会的“族权”^②与明清时期的“族权”在性质与形式都由于经济、法律的变化出现了一定区别，但是它依然是中国基层社会构成政治稳定和组织安全力量的最有效资源。在社会力量表现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保甲制度无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强的政治管理力。

（二）被动与冲突：保甲制度的推行

1931年，民国政府基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施的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失败，促使其不得不对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同年5月12日，民国政府国民会议四次会议提出《剿灭赤匪报告案》，称：“中国目前最大之祸患，厥为赤匪。政府与全国人民当前最急要之工作，亦莫过于扑灭赤匪……然匪徒善于辗转趋避，出没无常，或凭恃天险相与抵抗，或化装农民扰我视线，加之匪区辽阔，山岭深邃，绝不能以正式作战之方略，施之星罗棋布之赤匪。故决定妥善布置，严密搜索，然后匪无所逞，自可聚而歼之……匪区克复以后，恢复秩序，安抚流亡，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不致再为赤匪所乘，则政府固有待于全国国民之协作矣。”^③由上可见，民国政府认为“剿匪”的关键是如何加强政府与民众的联系，即“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所谓‘政治剿匪’纲领，而整顿保甲、训练民兵，即为‘政治剿匪’的重要内容之一”。^④于是1931年，民国

^① 于建嵘：《岳村政治》，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1页。

^② “族权”指的是中国基层社会中家族或宗族的权力，即家族或宗族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在明清时期和民国初期都存在，并且在其基础上构建的保甲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强的政治控制力。“族权”在基层社会政治稳定和组织安全力量构成的最有效资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③ 高素兰编注：《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28—129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86—87页。

政府在江西修水等43县试行保甲，随后开始在河南、湖北等地推行保甲。1932年，民国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制定《“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并颁行于各县，经过一段时间的施行，国民党政府认为成效显著，随即在全国多个省市仿行。针对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的情况，1935年民国政府又对条例进行了修正。为扩大保甲实施的效果，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32次会议决议：“地方保甲工作，关系地方警卫，为地方自治之基础，应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提前切实办理。”根据上述决议，民国政府要求“行政院”通令各省市一律提前办理保甲。至1937年，全国各省除新疆、山东及天津、青岛两市还未举办保甲外，其余各省市均程度不一地办理了保甲。

全国抗战爆发后，民国政府为“抗战建国之需要”，开始推进地方自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县制”建设运动。1939年9月，民国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为县、区、乡镇、保、甲各级地方基层组织。其中，区署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保甲为乡镇基础构架。在“新县制”与保甲制度的关系上，正如胡次威认为的：“敝部前为地方行政统一起见，旧时保甲遗意，于编制县组织法时，详定村里闾邻规则，暗寓保甲之法，以为自治基础。盖昔日一切皆重官治，保甲仅取防卫之意，而与自治事业全体无关。今则注重民治，关于地方设施，皆由人们自理，故村里制包括保甲事务以外，仍有其他工作。是以今日之村里制，即无异改进之保甲，而且县组织法颁行已久，村里制正在克期举办之中，此时万难中途变更。”^①由此可见，虽然“新县制”与保甲制度在功能上各有异同，但是“新县制”的核心仍是保甲制度，只是“新县制”侧重于“唤起民众发动民力加强地方组织以配合长期抗战之需要……促进地方自治事业以奠定革命建国的基础”^②，而保甲制度则侧重于“地方保卫”，但两者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因此在实行“新县制”的同时，民国政府在基层继续大力推进保甲制度，以期促进保甲组织的健全，以便于“新县制”的顺利推行。此时的“保甲”主要是执行“管教养卫”的任务。所谓“管”，即清查户口，实行联保连坐，管理民众；所谓“教”，即文化教育、抗日教育，主要的措施为“党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所谓“养”，即开辟财源，主要采取整理财政、规定地价、土地等形式；所谓“卫”，即地方保卫，主要是训练壮丁以靖地方，防止中国共产党“渗入”。其中“管”是其根本精神所在。应该说，“民国政府此时的县政改革是对基层政权的一次最重大的改革，是将行政、教育、军事相统一的改革，对于地方治安、征兵、税收等工作来说，具有积极的一面，为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集权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③截至1943年底，全国已有21个省实施了“新县制”，其中“设立县政府1119个，区署1853个；乡（镇）公所30470个，保办公处379681个，甲4118413个”^④。保甲制度作为“新县制”的基础，在推行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复出是“彻头彻尾的官治”的开始，这与先前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自治思想相悖，因此在社会领域遭到了广泛的争议和抵触。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土地政策，组织农民工会等符合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具有进步性，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保甲制度在该地区的推行规模与速度上具有很大的难度。

① 胡次威：《民国县制史》，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48年，第107—108页。

② 国民政府内政部：《新县制实施成绩总检讨·县政》，成都：四川省民政厅主编，1943年，第2卷1期，第69页。

③ 国民政府：《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

④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抗日战争·第3卷·政治（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1页。

第三，中国地域辽阔，中央政权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和措施，对于很多偏远地区的管理可以说是鞭长莫及，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改革推行情况，由于地方势力、民俗文化的阻碍，得不到同步和深入发展。

三、保甲制度作用及其最终的衰落和废止

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重建，其最直接的动因是“消灭”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目的还是在于通过户籍管理和人口普查，维持社会秩序，以加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不可否认，保甲制度在民国时期作为基层管理制度，客观上在提高地方治理成效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一，保甲制度在管理和治理基层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基层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管理和监督。这使得民国政府能够更好地掌握不同地区的人口流动情况和社会动态，有利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同时，保甲制度还规定了居民的义务和责任，激励居民积极参与保甲工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有序。

第二，保甲制度对于农业生产和税收征收有一定的帮助。通过户籍管理和土地调查，民国政府能够较为准确地掌握农民的生产情况和税收基础，有利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农业生产的稳定。此外，保甲制度也提供了一种税收征收的方式，即按照户籍进行税收征收，这客观上也有利于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三，保甲制度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推行保甲制度，民国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管理力，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此外，保甲制度还提供了一种国民服役和国防动员的方式，即按照户籍进行征兵和动员，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力量。

第四，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在教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政府通过设立学校、修建寺庙、举办祭祀仪式等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和忠君思想，加强了对于居民的思想管理和教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基层社会更加稳定和有序。

但国民党最终并没能依靠保甲制度挽救其政权，相反保甲制度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而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保甲制度的衰落和最终废止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保甲制度过度强调对社会进行管理，忽视了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在保甲制度下，民众的生活受到过多的限制和干预，这使得他们对保甲制度产生强烈的反感。同时，保甲制度的管理方式也存在着落后和不合理的问题。保甲长权力过大，民众生活受到影响，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感。

第二，新县制的推行和地方自治的深化也对保甲制度的衰落和废止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县制的推行使得原有的保甲制度逐渐被新的基层组织体系所替代，地方自治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保甲制度的作用逐渐减弱。随着地方自治的深化，其他制度逐渐替代保甲制度，进一步推动了保甲制度的衰落和废止。

第三，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是导致保甲制度衰落和废止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民众对自由和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加速了保甲制度的废止。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也使得城市管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同时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使得政府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应对人口管理的问题。

第四，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的推进也加速了保甲制度的废止。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推行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加速了

保甲制度的解体和废止。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快速发展,这使得保甲制度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保甲制度最终被废止,许多城市参照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建立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道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但是,这种三级行政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与城市“集中化”特征不相适应。不久,街道政府撤销,城市基层管理模式也在各地进一步探索。195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管理体制。《条例》对公民的户口登记、迁移、注销等事项进行了规定,使户口登记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此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户籍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

保甲制度的废止给新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保甲制度下,基层社会的管理和秩序主要由当地的乡绅和家族势力所掌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和稳定性。保甲制度的废止打破了这种局面,使基层社会的管理和秩序逐渐回归到政府和法律的主导下,从而增强了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和稳定性。这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有利于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在保甲制度下,地方治理的方式比较落后,往往以家族和乡绅的意志为主。保甲制度的废止使得地方治理逐渐引入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如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提高了地方治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从而推动了地方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这使得地方治理更加高效、透明、公正,为地方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三,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保甲制度下,土地和人口资源主要由当地的乡绅所掌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保甲制度的废止打破了这种局面,使土地和人口资源得以更加合理地分配和利用,从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保甲制度的废止使得土地流转更加自由,人口流动更加便捷,这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第四,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保甲制度下,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城市和农村的管理模式通常是分割的,导致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保甲制度的废止使得人口流动得以更加自由和便捷,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具体来说,保甲制度的废止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五,有利于丰富民众文化和社会生活。在保甲制度下,家族和乡绅的意志对民众的文化和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民众的文化和生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导致了社会氛围的封闭和保守。保甲制度的废止使得民众的文化和生活逐渐摆脱了家族和乡绅的控制,民众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交流思想,各种文化和社会活动也变得丰富多样起来。这种多元化和开放化的社会氛围,为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化和生活的变革也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总之,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复出与推行,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西方政治思想的进入、底层民众的经济状况、各种政治势力的碰撞等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是政治结构所选择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当然,保甲制度在基层政权的确立也为国民党政府中央政权进入基层社会、偏远地区提供了便利,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基层政权的管理。然而,随着“新县制”的推行和地方自治的深化,保甲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和废止。保甲制度的衰落和废止是多方面的原因所致,其中包括保甲制度自身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在今天看来,保甲制度的废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后来的社会管理和地方自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责任编辑:李亚强

发展问题研究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困难挑战及其解决场域研究

——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谈起

刘大程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与路径选择。本文从分析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发现,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受制于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 必然遇到主体冲突、利益错位、共识缺乏等问题。因此, 必须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场域中进行解答, 通过指明奋斗目标、提供价值基础、建构实践平台等方式, 促使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发生变革、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互信逐渐增强, 从而为更好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鉴。

关键词: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困难挑战; 解决场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Q9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3-0095-08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累积、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困境的背景下提出的全球倡议, 意在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形成符合生态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① 自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公开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至今已八年有余, 但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为代表的阻碍事件层出不穷。^② 为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将其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场域中进行解答, 旨在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中, 变革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这是中国针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困境提出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越是遇到阻挠和障碍, 就越能彰显加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变革的重要意义。

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2011年4月, 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在日本地震一月之后发表公告, 参照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简称“INES”),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此次发生的福岛核电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基础、传承与贡献研究”(2022JZDZ007)。

作者简介: 刘大程,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 第256页。

^② 核污染水是在核事故发生后, 核反应堆的保护外壳破裂, 冷却水直接接触反应堆中放射性物质产生的, 其含有数十种放射性物质, 对人体和环境危害严重。核废水则不会直接接触核反应堆芯内的核燃料及核废物, 经处理后可以通过管道安全排出。参见余惠敏:《核污染水不同于核废水》,《经济日报》2023年8月27日, 第5版。

站事故等级为核事故最高等级——七级。在地震等级公布前，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同意日本东电公司作为“应急措施”共排放核污染水约1.4万吨，放射性物质总量为1500亿贝克勒尔。^①2021年4月，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忘却20世纪50年代因排放污水导致的水俣病、骨痛病等公害事件，宣称基于“现实判断”，将继续以核污染水排海的方式来解决福岛核事故的遗留问题。^②回望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主办和参加了大量会议，签署了诸多环境保护条约和协议（其中就包括日本持赞成立场并予以签署的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浓度放射性核素的《伦敦倾废公约》）。这些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并促进了相关领域的进步发展。但会议的召开与协议的签署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基于此，我们必须明确其中的困难与挑战并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破解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办法。

（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冲突

当前，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在工业文明模式鼓动或裹挟下受现代性思维所操控的短期性行为”。^③因此，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个人、企业、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等社会主体都应该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参与其中。但主权国家因其具有的政策话语权和行动能力占据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地位，在建设过程中所显现的冲突更多地表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主体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为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和有界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性和超边界性之间的矛盾。主权国家可以依据本国边境线对所管辖区域内领土、领水、领空和底土享有自主管理和处置的权利，可以依据本国国情制定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制定本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和体制机制，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国际法的规定使各国享有对本国事务自主决定的权利。日本在建设福岛核电站时，不顾核电站设计规划，为节省散热、吊装和安装设备等成本，人为将山坡削低至15米，并将地址选择在靠近海水且有大量地下水流过的砂砾层之上。这一选择是日本政府的自主决定，但这一决定使得核电站在地震中遭受地震和海啸的双重打击，并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受到常态性的地下水困扰。同时，承担这一决定所带来后果的主体并不仅仅是日本一国。在日本依据其政府出台的《多核素处理系统处理水（ALPS处理水）处置基本方针》决定排放之日十年内，核污染水将影响整个海洋，并将以生态系统内部循环的方式对内陆产生影响。^④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国因滥用对本国事务的自主处置权利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往往会随河流、空气、海洋等生态系统要素的运动超越一国边界形成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灾难，由此致使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和有界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性和超边界性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

（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错位

主权国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出现的主体冲突，源于主权国家之间责任和利益划分之间的错位。首先，在空间尺度上，主权国家将本国自身作为政策的制定中心，在生态领域中侧重于本国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而将整体的生态系统分割为局部的本土管控区域，置他国或公共区域的生态系统于不顾。另外，在“修昔底德陷阱”和零和博弈思维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上出现“搭便车”的心理困境，认为自己应当承担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损害了本国的发展利益，或认为本国可以搭乘他国治理的便车，以减少自身责任的承担。因此，各国发展的本土中心与生态环境治理全球视野的缺乏导致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错位。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过程就是强迫人类社会分担风险和治理责任的行为，在过去的十年间，日本政府并未因对核污染

① 金赢：《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生成、发展与深层动因分析》，《日本学刊》2023年第2期，第34—55页。

② 《日本东京：抗议者反对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光明日报》2021年4月14日，第12版。

③ 邮庆治等：《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④ 金赢：《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生成、发展与深层动因分析》，《日本学刊》2023年第2期，第34—55页。

水处理消耗太多成本，环境安全威胁不降反增，其所推出的海水净化程序也只是罔顾舆论的障眼法。其次，在时间尺度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把持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并通过舆论宣传等手段将责任推卸、嫁祸于他国，试图以此种手段逃避自身的责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并未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的专家意见，也因授权所限，“没有审查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合法性，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日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相关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和片面性。”^①但这一报告却成为日本政府核污染水排海“正当性、安全性”的依据。与此同时，为消除核污染水排海所引发的本国民众、全球环保团体、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反对与质疑，日本计划花费700亿日元处理所谓的“负面消息”。^②由此可见，仅仅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而不顾他国和国际社会合理关切，必然诱使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利益错位之中。

（三）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共识

共识理念是合作行动的先导。在当下，世界各国政府及其学者虽然已经认识到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认识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受制于主体冲突与利益错位下的共识水平，难以转化为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取得全局性、根本性变革的行动合力。更高水平共识的形成与现实急难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长期的协调和沟通，需要各国与国际组织共同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事实却与此相反，一些国家交流沟通流于表面，实质不愿合作，在问题的处理上推行单边主义，仅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话语解读，并逃避或退出自身签署的有关全球环境治理公约。日本仅就本国核电经济产业政策进行考量，将事故的处理成本逐渐压缩，并未真正分析本国和他国专家所提出的新建储罐长期储存、水泥固化等其他处置方案，而是顽固地选择短期内经济代价最小的排海方案。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伊万·塔纳纳耶夫认为：“对于如何处理核污染水，日本政府不能单方面作出决定，而应当以理性、科学态度，同各有关方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后，再作出妥善、负责任的决定，真正做到对本国民众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负责。”^③由此，即便日本已经与他国在20世纪就对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浓度放射性核素具有基本共识之后，当倾倒主体转变为本国之后，其所持立场、观点就立马转换，并未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综上所述，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来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受制于主体冲突、利益错位、共识缺乏等问题。但究其根本，所有问题都源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④，才能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困境挑战的解决场域

为共同应对全球各种风险挑战、变革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行动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场域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契合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也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包括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在内的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追求。

^① 《外交部发言人就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23年7月5日，第15版。

^② 《言行相诡，信誉亏空只会越来越大（钟声）》，《人民日报》2023年8月28日，第17版。

^③ [俄]伊万·塔纳纳耶夫：《日本必须以科学安全的方式处理核污染水（国际论坛）》，《人民日报》2023年7月24日，第15版。

^④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83页。

(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承继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将“现实的个人”作为研究的现实前提,并关注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于“真正的共同体”的意义。“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由于这里所考察的“人”不是过往哲学家所臆想建构出来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是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获取如何对待自然知识的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看到了自然对于人存在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②马克思这段话展现出自然对于人的根源性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绝不是简单地征服和利用的单方面关系,而是良好的动态平衡即和谐共生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能够长久地运行下去。因此,自然界提供给人类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与生产场所以维持其生存,同时人类也必须采取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措施去保护自然,一旦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失衡,将导致生态的衰落与种族的灭亡。作为对“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21世纪的创新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将生态建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③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建设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进而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论断,这些论断不仅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还将进一步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指引。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治理原则

世界各国在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在建设过程中保证国家之间的主权平等、维护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因此,要想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有合理、正确的义利观念作为基本的治理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最初目的就是打破过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在全球治理中所导致的困境,解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等问题,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使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④。要真正做到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贯彻具有真正符合各国人民的义利观,需要正确看待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处在不同地域与国家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了正确的义利观,并将其作为我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我国在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将世界人民的福祉作为中心,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促进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方面工作的多面共赢,切实满足各国人民的现实需求。在我国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初始阶段,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并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1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⑤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00页。

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①在对核废物的处理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嫁祸于海，一点儿也不行。”^②新时代，我国又提出核安全观，致力于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可见，只有以正确的义利观去对待自然、对待他国人民，才能真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场域下进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日本核污染水的排海行为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代际的影响，其仅从本国经济成本进行考虑，而不顾海洋环境、民众健康以及子孙后代的利益，明显缺乏正确的义利观，并且这一行为可能构成人为故意向海洋排放核废物的国际先例，进而影响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正是我国一直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真正关注世界人民的切实需要，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以实际行动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凸显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担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回答

一花独放不是春，仅凭一国倡议并积极推动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其蕴含的重要意义，汇聚各国共同参与的力量。对此，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等方式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回答。经过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余年的发展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目标追求、价值基础、平台建设等层面科学回答了如何进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统性问题。

（一）明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奋斗目标

过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共识往往集中于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或者对某一数据指标的要求，但对未来工作没有进行系统谋划与顶层设计，因而不能真正形成指引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世界”的问题。具体到生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③这一措施目标的提出，指明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和解决办法，为解决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和有界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性和超边界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主权国家之间共识缺乏的问题指明了行动方向，最大程度地构建起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同心圆。并且，这一措施目标的提出能够解决共识流于表面、没有具体道路与方式的问题，促成更广泛的主体参与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行动中来。同时，面对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对清洁美丽世界的追求与需要，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对当前世界各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坚持什么样的安全观作出了中国回答，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在发展中，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④。在维护安全中，“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⑤。奋斗目标的揭示和有关倡议的提出，不仅符合现阶段发达国家的战略抉择，也兼顾到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解决贫困等基本问题的需要。因此，对于日本核污染水的排放，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将清洁美丽世界的追求向更多注重环境保护的日本国民和世界人民进行宣传。

（二）夯实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价值基础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需要正确的价值观予以引导。过去，在处理国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59页。

② 曹前发：《毛泽东生态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21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14页。

⑤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页。

问题时,一些国家总是竭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并没有真正地关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国家,只是一种干涉他国内政、推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武器。因此,在面对日本核污染水排入海时,这些宣扬“普世价值”的国家集体噤声,暴露了“人权、平等”等价值的抽象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①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对人类共同价值进行总结,不同于将西方抽象的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的“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各国人民和各国发展的现实状况,包含着对各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关注。正是在这一价值观念指引下,我们形成了处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国际问题的正确义利观,真正做到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并指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②。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代表着我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取向。反观日本,其不仅违背自身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当我国主管部门依据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世贸组织相关规定对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采取完全正当、合理、必要的紧急措施时,其反而指责中国逆行潮流。这不仅是日方完全不顾事情前因后果、是非曲直的态度,还是将本国价值强加于人的做法。因此,在进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使公平和正义成为基本原则。对那种表面上宣扬“普世价值”,实质上仍从本国私利出发去侵犯他国正当权益的行径给予揭露和批判。

(三) 打造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平台

为了实现“清洁美丽世界”的奋斗目标,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了交流与实践平台。自2013年提出倡议以来的十年间,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③同时,“一带一路”致力于打造的是绿色的“一带一路”,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各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平台,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④正是坚持以绿色为合作底色,中国在参与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仅注重共建国家居民的实际发展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着力避免、合理规避可能带来的生态负面影响。另外,这一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坚持多边主义,使各国能够在“一带一路”平台进行稳定长期的政策沟通和交流,有效解决分歧和矛盾,凝聚共识,促进沿线各国之间的利益交融,推动各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层面的务实合作,最终达成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案和框架。可以说,“一带一路”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发展平台,也是进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交流与实践平台,这一平台能够有效凝聚绿色共识,解决因发展困境而导致的生态意识落后的现状,能够使参与各国在共建绿色丝路的过程中,共享绿色成果,增强沿线各国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日本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长年处于观望态度,致力于拼凑日美韩的小圈子,试图以七国集团展示自身的与众不同和其在亚洲的实力和能力。但在应该承担与本国地位相符的历史和国际责任时,其选择置之不理,不仅没有做到对他国的帮扶,反而给他国增添了生态环境的危机。因此,面对这种行为,我们更应坚持打造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绿色实践平台,使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正面力量。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53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84页。

③ 《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和音)》,《人民日报》2023年3月14日,第6版。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94页。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场域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价值

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倡议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认可，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所接受，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业已获得了巨大成果。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并增进国际社会的了解和理解，将必然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大价值。

（一）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发生变革

近现代国际关系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前后，以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为标志，自此之后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以及治理体系，始终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治理领域中，西方不断输出所谓的“民主”“人权”等理念，借机标榜、巩固自己的主导权力，进而干预他国内政。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一些国家致力于打造大国、富国俱乐部，往往利用威胁等方式不愿沟通协商，强行推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决议与草案。正因为如此，随着时代发展与国际力量的逐渐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逐渐为各国所抵制，国际秩序和格局开始发生全球性变革。全球性变革的发生使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不确定性成为当今世界形势的最大特点。这种不确定性在全球生态治理领域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逐渐丧失，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缺乏，但又妄图以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各国发展指手画脚，严重影响其他国家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在此全球背景之下，中国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不确定性注入了行动力和稳定极。中国在处理包括全球生态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①。正因为如此，中国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寻求最大公约数，促进各国增进理解，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保护其他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拥有公平正义。“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②这些治理观念的提出，不仅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其切身利益和需求得到关注，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变革指明了变革方向，推动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挑战的意愿和动力获得巩固和提升。中国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作出回应，不仅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任的表现，更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海洋岛国实现话语权的表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利益有关方的声音不为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舆论基调所控制，从而真正为世界所关注。

（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推动

由于我国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行动之中，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得到持续推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基本遵循、行动指南得以确立。近年来，我国以自身行动促进全球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国内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任务。在国际上，中国引领推动《巴黎协定》签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发展；积极参与海洋污染治理等领域工作。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中国引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而此时的西式选举正陷入党派利益之争所导致的乱象之中。随着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92页。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问题的愈益暴露，西方领导人分身乏术，不愿或不能参加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而召开的峰会。中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促进生态环境等领域改善的同时，注重保障他国生态安全，作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等承诺，积极构建国际合作机制和研究平台帮助他国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贯穿着系统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政治、安全等各方面发展统筹起来，推动各方面共同发展，互相促进。同时，其将阶段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考虑，致力于帮助他国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明确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总纲领，真正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三）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互信增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建构，推动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互信增强和行动开展。在面临因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导致的主体冲突、利益错位、共识缺乏等问题时，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以自身参与破除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挑战，以自身引领改变西方“搭便车”思想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深化同各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友好互信，倡导更为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适应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趋势，使之更大程度地满足各国的共同诉求。同时，过去十余年，中国高度重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参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各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增进与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协商各项具体事项的展开，与西方一些国家相关工作流于表面或不能从始至终坚持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引领未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已经在国际社会凝聚起广泛共识，形成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强大合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正确看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与意义而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又因其所蕴含的胸怀天下思想而具有深刻的人民性，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其必将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作出与时俱进的深刻回答。在该理念指导下，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生态文明领域外交活动和国际合作，通过自身参与带动其他国家发展，以发展促治理，以援助缓危机；其他国家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和中国的实际行动，看到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合作能够获得共同利益，共享合作成果，必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中来。

致知力行，踵事增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日臻成熟及其践行的深入开展，将继续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现实的理论参鉴与实践场域。未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后果将会显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仍会面临一些困难，但只要世界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坚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场域下开展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清洁美丽世界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李亚强

再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基于“民主”的视角

王付欣, 郭笑笑

(中国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西方“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虽都包含民主等内容,但在多方面存在差异。从内涵方面看,“普世价值”是一种虚假的、抽象的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真实的、实践的价值观念;从理论支撑方面看,“普世价值”以“历史终结论”这一落后的理论为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支撑;从本质目标方面看,“普世价值”以维护西方中心地位、实施霸权为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为目标;从发展前景方面看,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今天,含有霸权和强权色彩的“普世价值”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所淘汰,被倡导合作共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超越。

关键词: “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民主;超越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3-0103-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愈发激烈,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性问题加剧,人类发展出现阻碍。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胸怀天下的情怀,立足国际发展大势,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②为主要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观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有力回应,打破了西方话语霸权,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扬弃与超越。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西方“普世价值”都有包含“民主”,但二者并非指向同一种民主,而是有所区别。因此,以“民主”为切入点对两种价值观念进行比较,以尝鼎一脔,有利于用一种较为直观的方式彰显二者的不同,澄清“民主”的含义,进而阐发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一、理论内涵的超越: 虚假与真实

西方“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西方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22VSZ145);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7JDSZK097)。

作者简介: 王付欣,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郭笑笑,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522页。

“普世价值”对内为资产阶级服务，对外则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发展前途，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目标。因此，“民主”虽为二者所共有，但其内涵有所不同。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民主，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民主所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真实的民主。

（一）“普世价值”暴露西方民主赤字

西方“普世价值”伴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彰显优越性的工具。它宣扬民主、人权、博爱等价值观念，被鼓吹为“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①。“普遍适用”指不论国家和民族间的差异，能够适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永恒存在”指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历史如何演进，能够依然存在且不会改变。仅从这两点来看，西方“普世价值”就已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一种虚伪、虚假的价值。

西方“普世价值”宣扬的民主是“西式民主”，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它对内是欺骗民众的谎言，即统治者资产阶级将自身的利益泛化为全体成员的利益，借用民主愚弄、欺骗、安抚国内民众，以达到为自身谋利的目的；对外是掩饰霸权的幌子，即以民主为由，大肆污蔑、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以维护自身国际地位。近年来，美国高喊所谓“平等”口号、高举所谓“民主”大旗召开“民主峰会”，将中国等国家排除在外，其心昭然若揭。因此，西方“普世价值”的“民主”，既是迷惑民众的工具，也是划分阵营的标准。

第一，西方民主是金钱的民主。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来以“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为傲，尽管每人皆有一票，但究其根本还是金钱掌握着选举命脉。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拉票是必要的环节，竞选者通过互联网、媒体“打广告”，也会进行巡回演讲，给自己造势，拉近与选民之间的距离，而这些都是需要花费金钱，因此，大量的金钱都花费在政客的自我宣传上。2016年美国大选总共花费66亿美元，^②2020年花费将近140亿美元。^③选举花费陡然升高，这表明在美国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是进入白宫的敲门砖。高额的选举费用提高了参选的门槛，将绝大多数人排除在选举队伍之外。所谓的“选举民主”深受金钱摆布，没有金钱的加持，再具有政治才能的人也难以当选。这表明，美国的民主是金钱的民主，是赤裸裸的“钱主”。

第二，西方民主是资本家谋利和博弈的手段。选举所需的巨额花费仅靠竞选者一人难以承担，其中大多是来自于利益集团的捐助。逐利是资本家的天性，这些利益集团并非无条件对政客进行支持，而是为了谋取私利。通过捐赠高额的政治献金，竞选者与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一旦“投资成功”，这些利益集团在国家事务上更具发言权，话语更具分量，看似公平的选举民主，实际上受到了利益集团的操控。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必然相互勾连。富人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权力，政客借助金钱进行选举。不难看出，在美国“选举民主沦为精英把持的‘选主’游戏”^④，“‘民有、民治、民享’变成了‘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⑤。因此，美式民主是“精英民主”“被操控的民主”。

第三，西方民主是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美国大肆宣扬“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将其神化为民主的唯一形式，自我标榜为“民主的灯塔”，常以他国不民主为由予以制裁，以“传播民主”

① 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第8—10页。

② 中国人权研究会：《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人权》2020年第2期，第188—194页。

③ 人民网：《美国大选背后：“金”主还是民主？》，2020年11月10日，<http://usa.people.com.cn/n1/2020/1110/c241376-31925686.html>，2023年5月14日。

④ 李海青：《论中国民主话语对西方民主话语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第101—114页。

⑤ 中国政府网：《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2023年3月2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8/content_5748721.htm，2023年5月14日。

为由挑起战争，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际人权与政治问题工作组”撰写的《美国干涉阴云下的世界人权困局》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以捍卫民主为名干涉侵犯他国主权”的种种行径，包括干涉安哥拉独立、格林纳达内政、尼加拉瓜内政等行径，表明了美国民主的实质。^①此外，美国还将“民主和平论”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借口，作为拉帮结派的理由。在所谓“建立在共和制原则之上的国家互相之间不太容易交战”^②这一论断下产生的“和平”并非民主所致，而是基于美国的霸权与压制——但凡不接受美式民主的国家都会受到美国制裁和打压。在2021年美国“民主峰会”上，美国以自己的民主标准将世界划分为所谓“民主阵营”和“不民主阵营”，故意“安排畏罪潜逃的反中乱港分子登台抹黑香港、抹黑中国”。^③这种将“民主”标签化、符号化的行为，是“民主的异化”^④，充分表明西方民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打压别国的工具。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展现社会主义民主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国内外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携手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后，在多个重要场合、重要讲话中强调，并正式写入党章，使其成为全党的行动遵循，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情怀。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科学的价值观念。

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民主”是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彰显了中国的民主态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主张“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来办”^⑤，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⑥将人民民主置于各项工作的高位，表明中国所秉持的民主，是一种平等的民主，不带有任何霸权色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始终将人民置于国家主人的位置，与西方“普世价值”所讲的“民主”具有明显不同。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是广泛的民主。这一点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的广泛性。西方“普世价值”所包含的民主将精英阶层作为主体，而社会主义民主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主体，从过去的“数豆豆”到如今的投票选举都深刻表明中国式民主主体的广泛性。二是过程的广泛性。与美国单纯强调选举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注重全过程人民民主，即在政治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贯穿、体现民主，让人民参与全过程，既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也为各项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⑦。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本就是民主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在我国，各项制度安排都是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所制定

①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美国干涉阴云下的世界人权困局〉报告（全文）》，2022年3月4日，<http://hrc.jlu.edu.cn/info/1014/1099.htm>，2023年5月14日。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8页。

③ 关国平：《剥去美国民主的“皇帝新衣”》，《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4日，第16版。

④ 李海青：《论中国民主话语对西方民主话语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第101—114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7页。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7页。

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和“专政”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这表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民主”是以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权利为目标。

第三，社会主义民主是具体的现实的民主实践。“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①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实践民主，是通过各种实践举措切实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民主。在中国，“民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一方面国家为人民提供参与政治生活的多种途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主动建言献策、参与各项事务的管理、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确保选举投票的公平、公正，实现民主选举；利用政党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方式，在决策前和施策中进行商讨，实现民主协商；在重大决策之前开门问询，广泛征集意见，将人民的声音转化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实现民主决策；通过政务公开、设置相关组织等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实现民主管理；利用信访举报等方式，实现民主监督等一系列的具体举措保证了民主的可行性、实践性。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有为上，也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中。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是一种切实的、实践的民主。

二、理念支撑的超越：守旧与创新

西方“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不同，在理念支撑方面也存在差异。西方“普世价值”的力量“主要来自某一时段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②，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良好态势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言论甚嚣尘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奉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最后一种制度，企图将“普世价值”的传播提供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共通点，两者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中不断发生碰撞，不断融合创新、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从而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坚实且具有创新性的理念支撑。

（一）以“历史终结论”为支撑的普世价值

20世纪末，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原来的两极格局变为美国“一家独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资本主义制度当时被看作人类历史上最优的社会制度，“历史终结论”逐渐盛行。“历史终结论”意为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社会制度，旨在提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以及攻击其他社会制度的依据。但是事实证明“历史终结论”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破产，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经济危机无法避免，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了大踏步的发展，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信心，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因此，随着“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根基也出现了动摇。

第一，“历史终结论”追求“普遍认可”，具有鲜明的抽象性，企图将西方“普世价值”的普世性做支撑。“历史终结论”的抽象性在于将“抽象的人”，而非“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福山将获得认可的欲望视为历史发展机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获得“普遍承认”。这种“普遍承认”是指类的层面上的全人类的认同，忽略了具体的现实的人，使“历史终结论”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人类的理念，因此呈现出抽象性。西方“普世价值”也存在这一缺陷，即盲目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民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

^② 侯惠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第5—12页。

求“同”，忽略各国的特殊情况，从抽象的人出发，片面强调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从而表现出普世性和抽象性。

第二，“历史终结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高度赞扬，企图为西方“普世价值”进行政治输出提供支撑。西方推行“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推行自身的政治制度作掩护，以文化优越鼓吹制度优越，以思想灌输实现制度推行，以打压其他国家，加强对他国政治的干预，维护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历史终结论”强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想制度并且应加以推行，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传统的道德标准，以及它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关注，都是完全正确的”^①。这些话语加速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传播进程，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借口。

第三，“历史终结论”企图为西方“普世价值”进行强制性传播提供支撑。福山认为“一个人是地主还是农民，而是根据一个人对暴力死亡的态度来决定的”^②。依据“主奴辩证法”，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级，是因为自身克服了怕死的本性，换言之，福山把阶级看作是人自己的选择，只要克服怕死的本性，就能获得较好的生活，成为统治阶级，充分暴露了其中的暴力思想。当前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采取单边制裁等强制性的手段传播西方“普世价值”，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多次煽动“颜色革命”，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沮丧的美国总统们手中的箭越来越少，于是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简单、可用的工具——制裁”^③。

（二）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长久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之精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时俱进，不断彰显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哲学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辩证的，只有本土化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除了根据中国实际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必须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种文化之间具有融通性，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思想支撑。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我国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哲学家们脱离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去研究人，将“抽象的人”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抽象的人”的过程中，将人置于现实社会中并且联系实践，使人回归现实。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由于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不同，每个人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由此呈现。此外，马克思主义抛弃唯心史观、英雄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自古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人民的作用，将人民作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主体。《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祥和。“民本”思想始终活跃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要想社会能够安定、政权能够稳固、国家得以发展就必须重视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继承并转化、发展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提出的，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理论，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中国主张“把全人类共同价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7页。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66页。

^③ 《美国“制裁学”：与霸权共生的“毒瘤”》，《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12月22日，第10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①，倡导各国根据实际情况去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本国人民利益为重，绝不以强制的统一的标准去要求，也不以强制的暴力手段去推行，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具体需要。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我国“仁爱”思想相结合的体现。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国际主义精神，在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并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彰显。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忽略国籍等方面的差别，通过斗争与革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从而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从自我到群体再到全人类，这一过程正是“仁爱”思想的展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学思想核心便是“仁”，“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仁者不仅爱自己，而且能够“推己及人”。《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世界的景象，其中包括了“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一仁爱的要求，表明“仁爱”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前提，而“大同世界”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要实现的目标。

当前世界发展并不平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②。西方国家仍以“普世价值”为武器，为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而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殖民，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面对当前局势，中国共产党以胸怀天下情怀，发挥国际主义精神，继承“仁爱”思想，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在多个重要场合表明，“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③，表明中国愿以实际行动助推世界发展，彰显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情怀。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兼顾包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我国“和而不同”思想相结合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看待问题要全面，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兼顾相同点和不同点，表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与我国古代“和而不同”思想是一致的。所谓“和而不同”是指在保护事物独特性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的目的，体现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礼记·中庸》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皆有不同，但是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之道。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包含各国人民的共同需要，同时也顾及了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是一种有差异的同。中国共产党没有忽略各国的发展差异，而是观察到由于国情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于同一价值观念的认识和实现程度以及方式等方面所有差异。“民主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彩的。”^④各国都有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寻求各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寻求各国共同点的同时，也兼顾各国的特殊性。

三、本质目标的超越：霸权与共赢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⑤ 意

①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3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第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服务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西方“普世价值”作为一种西方的价值观念,服务于资产阶级,对内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目的;对外以维护西方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为目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服务于无产阶级,对内以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对外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目的。因此,两者在本质目标方面具有明显不同。

(一) 普世价值以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继续实行霸权政治为目标

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一种优越心理”^①,认为世界应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西方标准应该成为唯一的标准。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维护自身地位,“普世价值”就是西方国家维护自身地位的武器。这一价值观的目的是维护提出者的利益,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西方国家利用“普世价值”进行文化霸权、文化殖民;设置话语陷阱,争夺国际话语权。过去,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打开别国国门,以此来达到殖民的目的;现在,西方国家通过文化殖民这一方式来维护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强迫他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以一种同质的价值观念来实施霸凌,最终目的就是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通过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宣扬,美国妄图垄断“民主”“自由”等词语的界定权,主张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那就是美式民主,世界上只有一种自由,那就是美式自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普世价值”包装成外交手段,以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推行霸权主义,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对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大搞“颜色革命”,此类行为所创造的“价值”仅仅是对于美国而言的,对于遭受战争的国家 and 地区的人民而言只有苦难;在国际事务中,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进行长臂管辖,不断拱火递刀,在俄乌冲突中不断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致使这场冲突久久未能解决。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以“普世价值”为幌子挑起战争、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还以此为由遏制别国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的打压力度,采取贸易战、意识形态分化等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妄图通过宣传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来抨击我国的价值观,以“普遍”消解“特色”,掩盖其背后的霸权实质,否定中国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以确保美国的中心地位和国际话语霸权。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大肆污蔑中国。一方面,将新冠疫情的出现归结于中国,甚至将病毒称为“武汉病毒”,污名化中国;另一方面,高喊“人权”“民主”,大肆批判中国的抗疫政策。这些行为都是美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煽动舆论,将疫情政治化,进而打压中国所为。这也表明西方想要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一直没有改变。因此,西方“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为了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

(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为目标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内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解决的难题。首先,和平、发展表现为人民对于和平安定与生活水平提高的期盼。当前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地区冲突、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成为阻碍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拦路石。其次,公平、正义表现为各国民众为对国际社会公正、平等的向往。当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行为仍然存在,严重破坏国际秩序,扰乱他国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最后,民主、自由主要体现在国家交往和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各国的事情由各国的人民作主。但是在国际交往中,一些国家仍然实行霸权,企图操控别国政治,影响别国的发展。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诸多阻碍因素,中国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寻求价值观念上的共识,促使各国协作,共同推进认识向实践的转化,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目标,有了价值观的认同才会有行动上的一致。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价值观的形式将不同地域和国家聚集到一起,成为“各个民族、国家、

^① 李建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第80—82页。

地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黏合剂”^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以现实实践为支撑的认识才能够立住脚。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结合历史与当前国际局势所提出的，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与此同时，实践是认识的根本目的与归宿，仅在价值观上达成共识还不够，必须在价值共识的引领下，实现实践上的突破，推动实践向前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能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因为二者存在共同点。一是“全人类”这个大主体，即以世界各国人民为主体，不搞种族主义；二是“共同”这一实现路径，即倡导各国共同努力，不搞单边主义；三是“共赢”这一最终目的，即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获益，不搞霸权主义。总的来说，二者都主张全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以实现国家间的共赢，促进全人类的发展。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为目标。

四、发展趋势的超越：黄昏与曙光

发展是历史的总趋势，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新事物定会战胜旧事物。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逆历史潮流而为，吹捧“普世价值”，主张单边主义，肆意进行西方意识形态输出，但“普世价值”正逐渐失去人心，走向黄昏。中国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多边合作，为实现“大同世界”不断努力，符合当前发展大势和世界人民人心所向，正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一）逐渐步入黄昏的西方“普世价值”

在西方“普世价值”等霸权价值观的影响下，某些西方国家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国际斗争，激化矛盾，给本国民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带来伤害，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尤其是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期间，面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未能展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不仅未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疫情的传播，反而妄图利用新冠疫情进行政治打压。这一系列的行为导致美国民众生命受到威胁，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当前美国自身的发展现状证明“普世价值”早已失去吸引力和可信度，正逐渐走向黄昏。

从美国国内来看，西方“普世价值”给中下层的美国民众带来诸多痛苦。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倡议美国民众不要戴口罩、拒绝接种疫苗，甚至拿疫情开玩笑，丝毫不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种“自由、民主、人权”的煽动之下，美国因新冠死亡人数超百万。《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戈德堡指出“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本不应该接近100万，但是我们做到了”^②，深刻表明美国政府的无为与无能以及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此外，在疫情期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种族歧视”问题频频出现，“跪死弗洛伊德”^③等问题引起美国民众的愤怒。高喊“普世价值”的美国社会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所谓的“平等”“民主”仅是口号，西方“普世价值”不过是统治阶级来蒙蔽民众的“遮羞布”。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为幌子，以“人权”“民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严重破坏世界秩序，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国依然坚持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坚持“美国优先”的政策，无视别国发展利益。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美国仍坚持退出WHO组织，不承担大国该有的责任，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运行。新一届的美国“民主峰会”不仅引起了非西方国家的批判，同时也招致西方媒体和美国民众诟病。美国投票权组织“黑人选民重要”的创始人表示：“当拜登总统正在

^① 孙伟平：《“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4期，第6—9页。

^② 李志伟：《新冠肺炎连续两年位列美国人第三大死因》，《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8版。

^③ 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美国公民乔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一起杂货店物品造假案，被美国警察按倒在地，在未进行暴力反抗的情况下，被警察用膝盖压住脖子，导致死亡。

主持‘民主峰会’时，我们自己的民主就在这里崩溃。”^①所谓的“民主”“自由”已然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西方“普世价值”早已成为美国维护自己政治霸权以及侵略他国的利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丧失人心。从“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从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兵到美国的“民主峰会”备受诟病，再到美国抗疫政策受到国内外人民的不满，这些都表明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逆历史潮流的，其中所蕴含价值观念也必然会被淘汰。在当今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普世价值论不是变革的武器，而只是辩护的工具；依靠它不可能改造世界，而只能粉饰现存统治秩序。”^②现实表明，西方“普世价值”正逐渐失去吸引力，逐步走向黄昏。

（二）日益展现曙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当前的国际局势所提出的，具有鲜明的人类情怀和深刻的实践意义。中国始终倡导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解决各种世界性问题提出了诸多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众多共建国家的发展，增进“邻里”情感；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创造机遇，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为世界各国提供物资援助和经验分享，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做出中国贡献。

中国顺历史潮流，积极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③这既告诫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时也提醒企图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国家：继续实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将自取灭亡。中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好感，也提高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世界范围的认同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民主实践与治理效能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23个国家近万个样本中，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平均认同度高达96.7%。^④

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当今世界危与机并存。中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更复杂，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增强国际话语权，防止外来不良思潮侵入显得十分重要。面对西方“普世价值”等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中国要加强国家间的交流，提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度，明晰西方“普世价值”的目的与本质；守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消除西方“普世价值”对我国各方面工作的冲击。

结语

作为两种价值观念，西方“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涵等多个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我们所批判的并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普世价值”给这些词所赋予的单边政治色彩和霸权霸道意味。世界是多彩的，发展是多样的，文化是多元的，民主也应该是多种形式的。“普世价值”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延伸，极具迷惑性；全人类共同价值符合发展的潮流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之所向，具有包容性。通过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理论与实践多方面比较，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深刻认识这种“超越”，有利于跳脱出西方的话语体系，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世界大同。我们要警惕西方国家的“话语陷阱”和意识形态的输出，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王振民、李正辉：《西方一些国家选举投票率观察》，《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4日，第3版。

②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第20—25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74页。

④ 《〈中国民主实践与治理效能全球调查报告〉在京发布》，《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2日，第3版。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

陈毓铝¹, 赖昕铖²

(1. 中共三明市委党校, 福建 三明 365000; 2. 河北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 新时代新乡贤已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当前学界进行广泛讨论, 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 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研究甚少。在嵌入性理论视域下, 新乡贤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具有耦合性, 通过组织嵌入、文化嵌入、资源嵌入,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支撑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凝聚力、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推动发展力, 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同时需要健全组织制度、形成价值认同、激发内生动力, 促进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关键词: 新乡贤; 农村基层党组织; 组织振兴;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3-0112-09

2020年9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①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在乡村振兴的“五个振兴”中, 组织振兴是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支撑力、组织凝聚力和推动发展力等党建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 影响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引领力。

新时代新乡贤治村已成为农村治理方式创新的重要路径, 既为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能力弱化提供了新契机, 也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乡贤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桥梁”“智库”“榜样”等角色, 在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一些具有党员身份的新乡贤通过加入农村基层党组织, 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一些德才兼备、勇于担当的非党员新乡贤通过干事创业反哺桑梓, 带领村“两委”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为农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一、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文献回顾

自2016年中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来, 各地开始重视回引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 同时新乡贤也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通过梳理与选題相关的文献资料, 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围绕新乡贤时代内涵、乡村振兴价值、乡村治理路径等进

作者简介: 陈毓铝, 中共三明市委党校科研与决策咨询处助教, 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和基层治理; 赖昕铖,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基层治理。

^① 《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符合人民所思所盼》, 《人民日报》2020年9月20日, 第1版。

行广泛讨论, 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 新时代背景下新乡贤内涵的研究

乡贤最早见于东汉时期, 主要是指当时有作为的官员, 或造福一方、具有崇高威望的社会贤达, 亦称为“乡绅”“士绅”。古代乡贤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和“皇权不下县”的国家治理体制密切相关。乡贤作为乡民和地方官员间的纽带, 在征兵赋税、维护社会治安、处理乡村事务和涵育文明乡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 他们扎根于乡土社会, 对上保障国家政权稳定, 对下使乡民受益。

新时代, 我国农村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变促使新的社会力量加入农村治理队伍, 加之中央层面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引导, 新乡贤应运而生。关于新乡贤的内涵, 学界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周静、陈建平认为新乡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新乡贤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来自社会各界的有才能、品行好、声望佳且有意愿服务乡村振兴的各类贤能人士; 狭义的新乡贤特指生于本土并愿意留在本土参与乡村建设的在地型乡贤。^① 该观点强调新乡贤根据地缘属性可以分为“在地型”和“不在地型”两类, 同时强调新乡贤要能够服务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谭星驰、李瑶认为新乡贤相较于传统乡贤, “新”在于时代背景新、治理主体新、权威来源新、治村身份新。^② 因此, 新乡贤不仅要具备学识才华、名声、威望、个人魅力等, 还要打破地域、血缘、宗族的局限性, 公平公正地发挥其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界定, 这里不做详述。

综上所述, 新乡贤的内涵大致包含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具备一定的威望, 尤其是在农村生活中能够得到他人的广泛认可和尊重; 二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或社会地位; 三是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四是具备浓厚的家国情怀、乡土情怀, 愿意到农村地区助力乡村振兴。从新乡贤的类型看, 不论是在乡乡贤, 还是离乡乡贤; 不论是本乡乡贤, 还是外乡乡贤, 只要对乡村建设起到推动作用的人, 都可以将其视为或纳入新乡贤的行列。因此, 笔者认为, 新时代新乡贤内涵可以界定为: 掌握一定社会资源, 才能兼备, 德高望重, 为人处世公平公正, 愿意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的人。

(二) 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价值的研究

新乡贤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 在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尹延君通过实地调研着重分析新乡贤在化解乡村矛盾、加强乡民凝聚力、创建乡风文明、推动乡村发展方面的独特价值;^③ 康东伟、韩英等认为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助力党委政府政策落地、培育文明乡风、发挥监督作用、提升自治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④ 刘敏岚、邱莲花则分别阐述了新乡贤对于提升产业、组织、文化、生态、人才这“五大振兴”具体价值的体现。^⑤ 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从新乡贤在治村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进行论述, 且侧重于其政治、经济、文化或社会价值, 围绕乡村振兴“五个振兴”的某一个具体领域展开研究的较少。

(三) 新乡贤参与治村实现路径的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治村的实现路径研究, 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 一是针对新乡贤治村

① 周静、陈建平:《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以福建省大田县为例》,《台湾农业探索》2023年第1期,第49—56页。

② 谭星驰、李瑶:《完善新乡贤治村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安徽农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216—222页。

③ 尹延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及路径》,《智慧农业导刊》2023年第2期,第153—156页。

④ 康东伟、韩英、于雪斗:《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困境与完善路径》,《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0卷第1期,第36—40页。

⑤ 刘敏岚、邱莲花:《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困境及优化路径》,《乡村振兴》2023年第1期,第42—49页。

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路径,这也是学者集中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李俊、郭振宽针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认识不足、渠道单一、意识不强的现实困境,从坚持和加强民主监督、党的领导、自我革命等方面提出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对策,从而发挥新乡贤的作用。^①二是关于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新模式研究,如李白以株洲市S镇作为研究样本,提出“党建+新乡贤”的乡村治理新模式。^②三是从成功案例的实践经验与启示阐述新乡贤参与治村的实现路径,如宋书豪、张敏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福建省晋江市S村,概括出新乡贤参与治村的地方启示。^③这三个方面虽然研究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都从制度建设、待遇保障、素质提升等方面强调新乡贤参与治村的实现路径。

(四) 以新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伴随着“新乡贤”一词的出现,新乡贤文化也随之形成,当前学界关于新乡贤文化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时代价值和培育路径两个方面展开。如杨帅丰富了新乡贤文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时代价值,并从需要做到健全新乡贤的培育机制、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价值功能、强化新乡贤文化的服务导向三个方面强调如何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④张艳玲则以乡村振兴为背景,通过对新乡贤文化在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乡村善治的价值阐述,针对性地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的实现路径。^⑤新乡贤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性、鲜明的时代性、显著的公益性、独特的示范性,它伴随着新乡贤产生,有其特殊性。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关于新乡贤文化的研究与新乡贤的研究有殊途同归之意,未凸显文化价值禀赋。

综上所述,当前学者围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展开了广泛讨论,为本研究开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大多研究选取宏观视角探讨新乡贤、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或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建设、经济发展、乡风文明、协同共治等方面的作用,研究较全面、深入,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乡村振兴中“五大振兴”的某一方面作用与价值进行专门研究的相对较少,且研究较宽泛,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际困境的措施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思想指引,运用嵌入性理论分析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耦合性,阐述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价值意蕴和实现路径。

二、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新乡贤加入乡村治理队伍,不仅是新乡贤出于桑梓情怀的考虑,更是因为有新时代良好政策的出台。从理论层面上看,新乡贤能够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也有其耦合性。

(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是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振兴的问题,成为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直接思想来源,为新乡贤更好发挥作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① 李俊、郭振宽:《统战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决策科学》2023年第2期,第78—87页。

② 李白:《“党建+新乡贤”引领乡村治理新模式探究》,《三农论坛》2022年第12期,第31—33页。

③ 宋书豪、张敏:《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与启示——以福建省晋江市S村为例》,《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22卷第5期,第6—10页。

④ 杨帅:《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2卷第2期,第23—32页。

⑤ 张艳玲:《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培育路径》,《农村实用技术》2023年第5期,第41—43页。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①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当前乡村振兴的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农村基层党组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需要吸引广大优秀人才向农村基层党组织靠拢，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才能提高其引领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

2022年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②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推动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与新乡贤的时代内涵不谋而合。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就要把人才资源的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吸引一批讲政治、有能力、敢担当的人补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短板。当前农村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需要一大批有志之士投身农村建设，新乡贤自身独特的优势已然成为最佳人选。

（二）嵌入性理论分析新乡贤赋能农村组织振兴的耦合性

嵌入性作为一种关系性概念，最早由匈牙利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用于分析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关系。1985年，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使嵌入性从一个制度经济学概念转变为社会学概念。嵌入性理论在被引介到我国之后，在社会治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协同共治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关系性理论模式，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支撑力、组织凝聚力、推动发展力的提升需要新乡贤嵌入，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促进乡村振兴各场域联动平衡。

一是人才支撑力需要组织嵌入。组织嵌入是指新乡贤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新乡贤以何种身份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决定着其发挥的人才支撑力作用的大小。组织嵌入性越好，说明新乡贤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清楚、越融洽，这能够保证新乡贤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取得合法性地位，从而便于更好地参与或开展各项工作。

二是组织凝聚力需要文化嵌入。文化嵌入是宏观上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嵌入，是新乡贤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间的情感纽带。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初期新乡贤文化与党建文化是互相嵌入、互相影响的过程，但最终形成的乡村文化是二者共同认同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班子的凝聚力，同时也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三是推动发展力需要资源嵌入。资源嵌入是指新乡贤运用自身资源优势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力的作用，就新乡贤赋能而言，是由新乡贤所处的环境资源所决定的，新乡贤身处的资源环境状况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力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即新乡贤身处的资源环境状况越好，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力就越强，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新乡贤的回馈也越多。

综上所述，新乡贤通过组织嵌入、文化嵌入、资源嵌入深度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场域之中，实现新乡贤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联动平衡。新乡贤嵌入性越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成效就越明显。

^① 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人民日报》2022年4月14日，第1版。

三、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价值意蕴

新乡贤有着较好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新乡贤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人才支撑力、增强组织凝聚力、强化推动发展力,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

(一)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支撑力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需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吸引一批有能力、敢担当、愿奉献的人才加入农村基层党组织。新乡贤才能兼备、能力出众、有公益心,在农村社会德高望重,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优秀人才。

一是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新乡贤由于其特殊的生活阅历,大多见多识广,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以其前瞻性的视野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提供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并且能够将优质的人力资源带入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时代性、战斗力。如福建省尤溪县半山村实施人才回引,通过组织领航,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首要抓手,持续引进退伍军人、大学生、企业家等乡贤回村任职,建设“好班子”。在村党组织的带领下,进行乡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林下经济、文旅经济等,半山村由原先的“赌博村”“垃圾村”“落后村”摇身变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二是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力。首先,“体制内退休乡贤”讲政治、善创新、重实干、严纪律,其加入农村基层党组织,既能壮大人才队伍,又能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积聚人脉、政策等资源要素。其次,“技能型新乡贤”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对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发挥他们的技术、经验优势,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三农”工作队伍。

三是新乡贤通过产业发展,吸引青壮年返乡务工创业,成为党员队伍和村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新乡贤还能发挥统一战线功能,动员优秀人才参与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

(二)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凝聚力

党的组织凝聚力来自党组织成员先进、结构合理、规则科学。^①新乡贤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后,由于其自身的先进性,能够增强党员干部凝聚力,促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形成强大合力,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群众基础。

一是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形成强大合力。个人力量有限,组织力量无穷,新乡贤个人好比一滴水,放到组织的大海里,才能激起澎湃的浪花。新乡贤社会基础好,党员、群众认可度高,在竞选村“两委”干部时支持率高,能够顺利实现村“两委”一肩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将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融合,形成强大的组织合力,提高村“两委”决策效率、执行效率,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二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感召力。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具有强制性,权威不同于权力在于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也是建构有序社会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存续的基本条件。^②本土型新乡贤在农村社会中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权威性,其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能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主要表现有二:一方面新乡贤运用其社会资源搭建良好的平台,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搭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与村民共同参与的治村机制,激发村民参与基层自治的自觉性,增进二者之间的联系。如福建省尤溪县半山村通过成立半月岛生态发展专业合作

① 刘炳香:《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第14页。

② [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社，村民以资金、产权等形式入股，村“两委”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既做大了集体经济，又扩大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将党的建设嵌入农村治理与建设之中，以党建为引领，在推动农村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提高村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认同感，在为民服务中改变农民“各自为政”的局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召集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感召力。

（三）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推动发展力

农村的向好发展是调动村民积极性的中心环节，只有村子发展了，才能改善村民生活，调动广大村民投入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新乡贤的嵌入及其在从政、经商、工作等的阅历，为推动农村发展，引领农村产业布局、风险防控等积累了有益经验。

一是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决策科学化水平。新乡贤素质高、能力强，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过程中能够对各方面因素进行较为科学的分析研判，能够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多一些全局思维、系统观念、辩证思维，努力使每项决策都能科学务实；能够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多抓有利于改善民生的事，从村子长远发展考量，努力使各项决策都能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能够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和发扬好传统、好作风，推动各项目落地落实。如福建省大田县前坪乡上地村引进退休军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发挥新乡贤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领头羊”作用，积极向上级要政策、争资金，加强村基础设施建设，带领村“两委”班子认真谋划产业发展，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公司+村民”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村财增收、村民致富的长效之路。

二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风险防控的能力。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重大责任，这就要求配强“两委”班子，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新乡贤嵌入农村党组织后，可以有效提升班子成员整体素质，提高抗风险能力，为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公益事业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其次，新乡贤具有较强的公益心和奉献精神，尤其是本土乡贤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办事过程中相对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能够想村民所想、急村民所急，通常能够得到村民的普遍信任和认可，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良好的干群关系。再次，新乡贤的嵌入可以有效避免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不足的风险。农村广阔天地为新乡贤发挥余热提供了平台，具有党员身份的新乡贤的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党建的“带头人”，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提高引领农村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动能。

综上所述，新乡贤在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方面表现出强劲的动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如何构建新乡贤回引和保障机制，发挥新乡贤的能量，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四、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

新乡贤作为现代农村社会具有一定威望的特定群体，在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支撑力提升、组织凝聚力增强、推动发展力强化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价值意蕴。新时代应激发广大新乡贤报效桑梓的热情，让新乡贤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因子，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

（一）健全组织制度，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支撑力

健全组织制度，让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有动力”。各级各部门要齐力共推，完善新乡贤回引机制和保障机制，创新新乡贤激励机制，不断吸引新乡贤回归故乡，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一是回引机制。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

才下乡”。^①近年来,福建省尤溪县、大田县积极探索“乡贤回引”,形成县、乡镇、村以及新乡贤工作单位多方联动的人才回引工作机制,确保精准回引、优质回引,让新乡贤“回得来”。首先,由乡镇党委牵头,组织村干部对本村在外的党政干部、经济能人、专家学者等进行全面摸底,深入了解在外乡贤的德、能、勤、绩、廉,建立新乡贤信息库。其次,村级组织利用春节新乡贤返村省亲契机召开座谈会,通过电话联系、登门拜访等方式,介绍家乡发展情况,了解新乡贤返村任职意愿。再次,对有意愿返村任职的新乡贤,在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基础上,向新乡贤发出回村任职邀请,并由有关部门同新乡贤所在单位进行回引协调。最后,对于党员新乡贤由县委组织部审批备案,乡镇党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任职手续,同时县委组织部定期跟进联系服务,了解新乡贤思想动态、工作情况、存在困难,并会同有关部门协同解决,推进工作。

二是保障机制。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②要让新乡贤“留得住”“留得安心”,需要强有力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新乡贤多生于故乡成长于他乡,虽然对村情有一定了解,但对农村组织建设和农村治理工作相对陌生,要健全新乡贤长效培育机制,不仅要把新乡贤“引进来”,更要让其“走出去”,到乡村振兴典型村学习先进经验,鼓励年轻新乡贤加入农村治理队伍,形成“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机制。另一方面,新乡贤工作过程中住房、医疗等问题亟待解决,在政策层面可以适当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对于体制内返乡任职的新乡贤,可以通过村集体出资翻修房屋并免费供其居住,对于体制外新乡贤允许他们将户口迁回村里,从而获得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实现“落叶归根”。

三是激励机制。新乡贤返村任职多出于家乡情结、无私奉献的公益性质,但要让新乡贤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还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让新乡贤“有动力”。一方面给予新乡贤荣誉激励,组织部门定期对县域内新乡贤工作进行星级评定,对于为民办事、口碑极好的新乡贤进行表彰,并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其先进事迹进行报道,发挥新乡贤的引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给予新乡贤物质奖励,由组织部门主导筹措资金设立新乡贤奖励基金会,用于鼓励、肯定优秀新乡贤的付出,形成社会效应,让新乡贤有更多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二) 形成价值认同,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凝聚力

党组织成员达成共识,村民与村党组织形成价值认同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重要一环。形成价值认同就需要加强思想建设,充分利用文化滋养,发挥新乡贤的榜样示范作用,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凝心铸魂。

一是思想建设。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从思想上整顿”^③。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党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基础,只有思想统一、达成共识,党内行动才会统一。一方面,要加大理论宣传力度,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利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一契机,发挥新乡贤文化水平高、理论解读能力强的优势,运用群众喜听爱听的语言,通过鲜活的案例故事,把党的创新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引向深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带领党员干部、广大村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另一方面,要增强理论转化的效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2021年2月23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2023年10月10日。

^② 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5页。

目的全在于运用, 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① 新乡贤要打开思路、广开言路, 更好的把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积极开展“我为村民办实事”实践活动, 解决村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准。

二是文化滋养。2023年9月22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修订《“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 “创新活动形式”“用好各种平台、载体”“做好村情文化的整理”。^② 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 能够融入时代因子, 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为乡风文明建设、形成价值认同、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供新动能。首先, 要打好乡愁牌。乡愁是维系新乡贤和家乡的纽带, 充分挖掘优秀乡土文化, 讲好农村故事, 做好乡愁文章, 将乡愁烙印在每一个村民的精神血脉中, 增进村民认同感, 在打造乡愁特色中吸引新乡贤, 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其次, 弘扬文明乡风。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浸润作用, 积极培育村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美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 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 重视法治建设,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③ 发挥文化在农村治理和基层党组织振兴中树正气、聚人心、促发展的作用, 通过强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三是榜样示范。新乡贤大多有着较高的名声威望, 受到村民的敬仰和爱戴。新乡贤自愿发挥余热, 将自己的才能、学识反哺农村, 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种行为值得每一位村民学习。一些非党员新乡贤虽不能直接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但其在村里干事创业的能人属性, 在广大党员干部和村民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带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壮大集体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福建省明溪县狮窠村通过人才回引创业干事能人, 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合作模式, 采用“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 将明溪的优质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此外, 新乡贤大多道德高尚, 不乏受到各级政府表彰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他们在引导村民“讲公德、守道德、扬美德”, 汇聚正能量,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乡村振兴的凝聚力。

(三) 激发内生力量,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推动发展力

焦裕禄有句名言: “干部不领, 水牛掉井。”意思是虽然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但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 力量就发挥不出来。新乡贤因其特征属性与作用价值, 通过资源动员、群众路线和创新载体, 激发内生力量, 从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推动发展力。

一是资源动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④ 农村发展要充分调动内外部资源的综合利用, 畅通城乡要素流通,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这就需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一方面, 党员新乡贤凭借其在外打拼的社会阅历以及对村情的了解, 能够较为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2023年4月1日, 第1版。

^② 国家乡村振兴局: 《关于修订〈“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3年09月22日,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XCZXJ/202310/t20231024_6438921.htm, 2023年10月25日。

^③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 《人民日报》2022年3月7日, 第1版。

^④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年, 第31页。

准确地识别村子优势资源，其嵌入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从理性视角出发，找准村庄发展方向，合理规划产业项目，规避一般项目或资本落户带来的潜在风险，更好的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新乡贤自身积累的人脉资源，使得村子发展引入外部资源更为便捷、精准、可靠，新乡贤除了招商引资外，还能够向上级有关部门要政策，实现外部资源与村庄之间的良好互动，这对强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群众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规定：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社会参与是居民主体性的核心体现，区域内居民在新乡贤的动员和激励下深度融入本村产业发展进程，民主参与乡村治理决策，这是乡村内生式发展的重要内涵。^①一方面，新乡贤干事创业的成功经历，能够增强党员干部和广大村民创业信心，通过探索“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股份合作经营方式，形成村民、村集体共享收益的良性循环，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为党在农村执政形成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农村的发展不是新乡贤一个人的事，事关每一位村民，党员新乡贤嵌入农村党组织后，能够帮助农村基层党组织建立更好的议事制度和治理机制，打开村民表达愿望与诉求的渠道，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三是创新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实践，创新乡村治理抓手载体，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②新乡贤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更具创新性，能够充分挖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传统优势，运用先进的理念、不断创新载体，通过“党建品牌建设+农村事业发展”，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推动发展力，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以乡村事业促党建”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如福建省尤溪县创立“跨村联建”党建品牌，以发展较好的半山村为龙头，整合发展一般的通演村、汶潭村，成立通汶联村党委，实行组织联合、基础联办、产业联营、民生联管，半山村带领通演村、汶潭村，实现从“头雁”领跑到“雁阵”齐飞。在做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由强带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组织共振兴、经济共富裕的目标。

五、结语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发展的领导核心，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新使命，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直接关系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既有耦合性更有时代价值，要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人才优势，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促使新乡贤嵌入农村治理肌理，发挥其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推动发展力，发挥新乡贤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和乡村振兴中的应有作用，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通过强党建助力农村高质量发展愿景的实现。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刘晓君、孟博远：《“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以浙江省义乌市H村为例》，《经济论坛》2023年第3期，第44—57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5日，第1版。

云贵两省社院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助力民族地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月13日，由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共安顺市委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文化建设——“弄染结盟”的时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召开，贵州省政协、贵州省民族宗教委、云南社院、贵州社院、安顺市及贵州省各市州社院的专家学者、会议论文作者等共5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挖掘各民族共同的革命历史文化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云南和贵州民族工作实践和民族文化研究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助力云南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和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

会议指出，将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云贵两省社院在教学、科研、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促进两省统一战线事业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借力，共同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经济人类学、云南各民族的统一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边疆经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与经验、“弄染结盟”的三个重要史实考证等作主旨发言。

据悉，此次研讨会是云南社院与贵州社院签订合作协议后联合举办的首场学术活动，也是云南社院与兄弟社院首次跨省举办的学术活动。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3年9月 第3期(总第99期) 第25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联系电话:0871-68091598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3年9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Sept. 2023 No.3 (Sum.99) Vol.25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Tel:(0871)68091598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Sept. 20, 2023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34

定价:9.00元